

卡翁达自传

赞比亚必将获得自由

译者的话

本书是现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的自传，写于1962年。当时，赞比亚尚未独立，仍是英国的“保护地”北罗得西亚，为英国于1953年9月强行拼凑而成的“中非联邦”的一部分。由于北罗得西亚、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现称马拉维共和国）三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英国殖民者被迫于1963年12月31日宣布解散“中非联邦”。北罗得西亚于1964年10月24日宣告独立，更名为赞比亚共和国，卡翁达任总统。作者在本书中叙述了自己的家庭、童年生活、所受的教育以及与殖民主义作斗争、争取赞比亚独立的政治活动的经历，并阐述了自己的一些思想政治观点。

由于译者水平的限制，译文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指正。

1975年3月

目 录

前言	1
一 在卢布瓦的童年	1
二 在穆纳利的学校生活	8
三 教师	14
四 我的流浪时期	19
五 种族隔离	26
六 我决定回家	31
七 哈里·恩坎布拉作为领导人	40
八 北方省的组织书记	46
九 非洲人国民大会总书记	49
一〇 挫折时期	53
一一 非洲人的意见	63
一二 访问联合王国	72
一三 我和哈里·恩坎布拉决裂	80
一四 被捕和监禁	95
一五 狱中	112
一六 联合民族独立党和教会	128
一七 决定胜利的一年	142
附录一 历史的简述	151
附录二 关于在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以及 在北罗得西亚选举非洲人和其他种族	

	代表的方法的备忘录(1952 年).....	157
附录三	对修改北罗得西亚宪法建议的评论 (1958 年)	167
附录四	关于格温贝山谷骚乱的报告, 1953 年 12 月 14 日送交非洲人国民大会	178

一 在卢布瓦的童年

我的父母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布希兹亚，意思是“不速之客”，因为我是在他们结婚二十年时生的，在儿女中排行第八，其中三个在幼小的时候就死了。我于1924年生于卢布瓦，在卢安瓜河和钱贝西河这两条大河的流域间的山区。我的父亲戴维·卡翁达是1904年由尼亚萨兰的利文斯敦尼亚教会派到北罗得西亚说班巴语的钦萨利区的第一个非洲人牧师。他和我的母亲在班巴人中作信仰上帝的见证有好多年，获得酋长和人民的信任。卢布瓦传教站距钦萨利八哩，直到传教先驱者麦克明先生来和他一起传教时才建立。

我八岁时，父亲死了。当我听到他的死讯时，我哭得很厉害，因为我爱他，对他的回忆全都是美好的。他是一个严肃的人，总是指望别人无条件服从。他在家中管教我们很严格，但是只打过我一次。我相信，直到我死，我也不会忘记父亲这次打我的情况。我挨打后痛了好几天，他只得给我敷一些镇痛药。对于一个非暴力主义的鼓吹者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有启发意义的值得谈的故事；但也许正是父亲早年给我的这个教训，使我懂得了不要以武力对待同胞兄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我现在已记不得那次争吵是怎么回事。我只记得，有件事情使我对卢布瓦一个教师的小儿子很生气。他和我年龄一样大，这是我

生平第一次去找他，我一下子就把他打翻在地，骑在他身上，拳头象雨点般落在他头上。幸好我的父亲走过，看见我在痛打他同事的儿子。这就是这场打架的结束，也就是我挨打的原因。父亲每次给我敷药时，他就反复地往我这个幼稚的头脑中灌输打架是罪恶的思想。在我一生中，另外还只有两次我采用了暴力的手段，但我必须把这些故事留在我传记的后面几章来叙述。

我的父亲当了好多年校长，但到晚年，他被任命为教会的牧师。这个职责就是要他经常在农村中巡回，访问人民。我对他最亲切的回忆，就是关于他出发巡回前全家团聚的情景。他把母亲和我的哥哥姐姐们叫到一起，我们唱几首赞美诗，他和我们一起祈祷。我是多么喜欢和他一起唱啊！说真的，母亲经常告诉我，说我很小的时候，在这种场合，我会站起来模仿他打拍子。用我的本族语——柔和的班巴语唱的、曲调优美的赞美诗，使我开始爱上了唱歌，而且以后一直喜欢唱。

我的父亲是一个很好的传道者，虽然我记不得他的布道内容，因为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在布道开始之前，我们就总是从教堂里出来了。我想，有时候他的讲道一定使那些传教士们不高兴，因为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个星期日做完早礼拜后，我在父亲屋外的沙地上玩，发觉父亲同麦克明先生、马克斯韦尔·罗伯逊牧师和布朗医生一起坐在走廊里的桌旁讨论什么事情。突然，我被砰的一响吓了一跳，往四面一望，看见正是我父亲在拍桌子；他已经跳起身来，正在和传教士们热烈地争论。

卢布瓦座落在北罗得西亚北方省内钦萨利美丽的群

山中，是一个很好的居住地。年老的麦克明先生（我们管他叫希库卢——“爷爷”）、我的父亲和其他传教士，从头建立起一个有秩序的、和平的繁忙社会，我回顾起来怀着深厚的感激之情，体会到我该多么感谢我早年在那个地方受到的培养。虽然我们家里只有五个孩子，可是我记得，坐在一起吃饭的从来不只是我们这几个人。我们家里总是有许许多多客人和来访者。在学期期间，总有许多孩子——我父亲朋友们的儿子，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们付不出学费，我父母出于仁慈收容了他们。现在，童年的一个情景又出现在我眼前，我看见桌上已摆好了几碗饭菜，准备吃饭，当客人们聚集拢来时，他们被附近森林中的咆哮声吓了一跳。有人笑着说，这是一个出名恶作剧的人敲出一种鼓音模仿狮子的吼声，但是，突然，这吼叫声越来越近，没有人会再把它误会作别的什么声音了，这的确的确是狮子的吼叫。每个人都惊慌起来。我的哥哥一把抓住我的手，我被拖着走，简直脚不着地飞奔着，我的哥哥是多么急切地要把我带到邻居屋里的安全地方。

假若我的父母不开辟出一些大园子种吃的东西，单靠我父亲当牧师的微薄薪水，是决不能在我们家里款待这么多客人和来访者的。我母亲自己做肥皂，送给那些帮我们垦地锄草的人。在十哩外的河床里，他们种了水稻；离卢布瓦不远，他们耕种了大片土地。他们的殷勤好客出了名，人们普遍地把他们的家叫做加利利——和平和休息的地方。北方省的土地是非常贫瘠的，任何农作物要获得收成，只有用火耕法。在旱季，人们拿了斧头跑

到森林中去，爬上树去砍树枝。他们把这些树枝堆成一个个大堆，在雨季前烧掉。在北罗得西亚，班巴族人爬树是最内行的，把这些树枝在烧前堆积起来的方法也要有很高的技术，如果这些树枝不是慢慢地烧，并且完全烧光，那么火底下的土地里杂草仍然没有根除，当种子播种在木灰里，杂草就会丛生，使玉米枯萎。人们发现，只有用这个办法才有可能从土地上获得收成。北方省并不缺少可耕种的土地，因此我们只是修剪树枝而不是把树砍死。过几年，未开垦的土地经过改造后，又可以耕种了。我国人民经过长期的不断摸索，懂得了怎样在自然界中生活，如何在贫瘠的土地上生存下去。

父亲死后，母亲指望她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一起帮助她治家。虽然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我不得不在屋里和园中干各种活儿。我学会了到两哩路外的井中去运水——决不准许我们因为缺水的缘故而用任何借口不洗澡——母亲坚持要我们天天脱去衣服洗澡。我学会了跪在石磨旁推磨，为每天的晚餐磨玉米。我学会了刷洗锅子，洗烫自己的衣服。我们要到树林中去拾柴，老是要去搬木材回来做粮食箱，搭鸡棚。

父亲曾打算要我受到尽可能最好的教育，这在当时只有到南非去才能办到。他计划当我一受完基础教育，就把我送去和Z·K·马修斯一起生活，但是，当然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教小孩子的办法是，把他们聚集在树下，树上挂一块布，上面画着字母。我记得很清楚，坐在树荫下好几个小时，单调地念着“a-e-i-o-u”，然后用手指在沙地上写字。我们在坐着的地方

近旁弄平一小块地，教师在我们孩子中间来回走着，纠正我们所写的字。每一块布都叫作“纳萨卢”，当我们念完“纳萨卢”一、二和三时，就升到一年级，就获准用石板了。当时普及教育还不是免费的，每个孩子的父母必须每年付费半克朗。恰在我父亲死前，我得了流行性感冒，因此不能在开学时上学。当我终于到学校去报到时，教师向我索取两先令六便士，我告诉他我没钱，他就叫我回去向母亲要必须付的半克朗。我哭着跑到母亲那里，但是家里没有钱，她和我一起哭。幸好一个好心的邻居帮了我们，借给我们钱，以后我们在适当时候还了他。在那时，因为这样一件小事，就可使一个孩子永远丧失他一生中受教育的权利。

当我终于升到中学读三、四、五、六年级时，我每年必须付学费三十先令。母亲把园里种出来的东西供给我吃，还要设法一点一滴地凑钱给我买衣服。但是为了要付学费，每逢假期我就得去找工作做。承蒙教会雇用我给学校花园挖排水沟，并在那里附近干些杂活，每月给我十先令。每年有三个月我用这样的方法得到了学费。这使我后来当教师时，看到一些学生不得不为了学费而奋斗，心中就非常同情。这使我在小时候就懂得了自助非常重要；这也导致我在木富利腊学生中组织自助会，这我将在另外一章中叙述。

我九岁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使我开始走上爱好器乐的道路，它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乐趣之一。我哥哥的一个欧非混血种朋友，从利文斯敦尼亚来探望我们。他随身带来了一架有二十一根弦、三小节的古琴。他教我哥哥

弹奏古琴，当他离去时就把它卖给了我哥哥。没多久，我就说服了哥哥教我如何弹奏这乐器，它是我闲暇时的忠实伴侣。我们演奏矿工们从镇上带回来的乐曲；这些都是西方舞曲，但我们给它配上了自己的节奏，当然，不久我就开始创作我自己的咏叹调和小歌曲。我想，在一天辛苦工作之后，悠闲地在星星和月光下弹琴，朋友和伴侣们尽情地跳着舞，这真是再好也没有的休息了。我当教师后，就买了一只吉他。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得了非常厉害的腿痛和头痛病。我还经常害疟疾。我是医院中出名的病人之一，每天要到那里去治疗两次。如果没有教会里的布朗医生和护士悉心看护，我今天是不能在这里写这本书的。就在这个医院里，我初次遇见了一个叫西蒙·卡普韦普韦的男孩，他后来成为我忠诚可靠的朋友，现在跟我在一起，是联合民族独立党的总司库。虽然我有腿痛毛病，但我热爱踢足球。我们的校长马克斯韦尔·罗伯逊牧师把整个学校按不同村子组成各个球队，我当然参加加利利队。我们很小就开始踢球，先踢网球，没多久就允许我们踢真正的足球了。

正是这样的一次足球赛引起我第二次卷入了打架。我们在一次足球比赛中，赢了另一个村的足球队，但他们不服输，赛后他们向我们挑战要打架。那个足球队里的男孩比我们加利利队任何一个队员都大得多，他们选派了一个最大的人，就象从非利士来的巨人歌利亚^①

① 《旧约·撒母耳记》中记载的歌利亚，是个巨人。——译者

一样，向我们球队中的一个人挑战。我们球队中最大的一个男孩赛后身体很不舒服，不能迎战；我们指派的下一个人，他又不肯面对这严峻的考验，于是这个命运就落到了我的头上。除了我早先和教师的儿子打架以外，我从来没在打架上下过什么功夫，但是我感到我必须尽全力去干。没多久，那个孩子就把我打翻在地上。我朝天躺在地上，他象一头水牛那样向我猛扑过来，但是我向他的胃部猛踢一脚，使他向后跌倒，我马上爬起来，终于得胜地骑在他身上。我一点也不知道他口袋里有一把小刀，他拔出小刀在我的头皮上到处乱划。观众们一看见鲜血就吓跑了，我便设法脱身。我对自己所受的区区皮毛之伤一点也不在乎，但是我不知道该怎样去见我的母亲，因为我的白衬衫上染满了鲜血。我脱下衬衫，把它用泥擦过，直擦得它脏得看不出血迹。当母亲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时，我大概对她撒了谎，说这是一次非常粗野而肮脏的球赛。我相信，直到今天她还不知道我曾为了维护自己球队的荣誉，奋不顾身地打过架。

二 在穆纳利的学校生活

我们很幸运的是，能有象马克斯韦尔·罗伯逊这样充满着活力和魄力的人当校长，他做一切事情，都能够得到最大的实效。纪律是严格的，不准任何孩子偷懒。他是北罗得西亚童子军运动的创建者，虽然那时我们自称为“开路人”。学校中大多数孩子都参加了这个或那个童子军队伍，马克斯韦尔·罗伯逊有意识地培养童子军精神和对队伍的忠诚，以打破我们的种族对抗思想。不论在智力、体力或精神方面，我们所受的教育都没有被忽视。那时，我脑子里想的是，决心要继承父业，做一个教会牧师。我感到母亲老早就在我面前坚持这个理想。要当牧师，正规的道路就是首先当教师为教会服务。因此当我读完六年级时，几乎理所当然地，就被卢布瓦教师正规训练班接纳进去了。

我在教师正规训练班受了两年多教育，那里的生活和我的学生生活没有什么区别。由于生活在教会中，我很小就上学了，所以我是培训的教师中最年青者之一。在那段时期，我没有什么突出的回忆，除了有一次我们中间有许多人罢课。前一批学生在一年内完成了训练，而我们的课程却预定要学两年。为了某些理由，我们头脑里就产生了一种思想，认为对待我们不公平，我们就罢课抗议。我记得，并没把这事看得很严重，因为我们卷起铺盖

跑回家去三、四天后，又一个个地溜回学校，而我们又被收为学生，甚至不用我们赔不是。

1940年8月，第一所中学在卢萨卡的穆纳利开办了。1941年，我和其他二十九个学生一起，从全地区范围各学校中挑选出来，到穆纳利读一年级。我有生以来，几乎没有踏出过自己的家乡钦萨利区，而现在我要长途跋涉到城里去了。这是我第一次乘卡车长途旅行，我们差一点发生严重事故。在离开卢布瓦的第二天，卡车司机由于前一天整日狂饮，对卡车失去了控制。在我们这地区有许多大蚁丘，我们通过从一个大蚁丘中挖出来的一条路，路很狭，两边都有很高的土堆，幸好我们的卡车刚好穿得过。卡车撞在一边土堆上，又转变方向，横过道路，撞上另一边土堆，于是在尘土弥漫中停住了。我们全都吓得发抖，但这次撞车使司机神志清醒了，我们继续赶路。到了姆皮卡，我们发觉和另一辆往南去的卡车失去了联系，因此我们不得不空等四天，无事可做。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到达卡皮里姆波希的情景。我那时只有十七岁，从来没见过火车。我不知道自己在期望什么，可是当我们跑到铁路上，我的确是在观望有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我旅行了好几天，一直没有机会好好地洗个澡，我渴望着能洗一次澡。我自幼起，早已养成了每天独自洗澡的习惯。现在，我被带到一个公共澡堂，脏得难以形容。我徘徊了几个小时，试图鼓起勇气进去，我抱着一线希望，总会有我可以单独洗澡的时候。厕所也是那么令人作呕，我简直走不进去使用。我初次到达卡皮里所受到的震惊，使我好几天才恢复过来，而现在每当

想起它时，我仍不寒而栗。

经过八天令人厌倦的旅程后，一到达穆纳利，我发觉自己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我第一次看到实验室，我们开始学习一些真正的科学。开始，我上生物课时完全感到莫明其妙，但不久我对这门学科着迷了。我一直学不好数学，可是在穆纳利有一个好教师，不久我就不怕这门学科了，因此期终考试时，我在班级中名列第二。历史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学科，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我没有学好，也许是因为我们要读的全是南非史。英国文学这门学科，我终于爱上了，但是期终语法考卷上，我的成绩很差。

我们在穆纳利的的生活是丰富多采而饶有趣味的。决不是整天只关在教室内工作和学习。我马上参加了足球队，我们和当地球队作了许多次紧张的和有几次是很粗野的比赛。我的脚上至今还留着一个大伤疤，是被卢萨卡一个“老虎”踢伤的。校方非常重视体育，我代表我的宿舍参加一哩和半哩赛跑。在我二年级时，我率领我宿舍的人在宿舍与宿舍之间的运动竞赛中获胜，虽然由于我在一哩赛跑中的成绩几乎使我的宿舍失去了得奖杯的机会。我在第一、第二圈中是领先的，但是我一定起步太快，因为不久我就远远落在后面了。虽然我跑在最后，但是我顽强地坚持跑下去，因此当我从约翰·沃丁顿爵士手中获得宿舍奖品时，他称赞我一直跑到终点。我感到很高兴，我第一次与英王在我国的最高代表相见是非常愉快的。但并不是我与总督们所有的相见都是如此幸运的，这将在我的经历中证明。

学校里有许多低年级同学被高年级同学欺侮的事

情,这使我非常气恼。我自己没被欺侮过,但是我们同年级中只有两个人与虐待者展开过激烈的争论,要使我们不被一桶桶冷水时常倒在我们头上。我二年级时,担任我们宿舍的室长,在宿舍的尽头我有一间供个人使用的小房间。当欺侮在进行时,许多一年级的小同学都会躲到我的房间里来,我尽我所能保护他们,而且在我自己的宿舍内阻止用任何方式欺侮人。我从父母和马克斯韦尔·罗伯逊那里,懂得了严格纪律的意义,因此在我值勤的一星期中,我决心在学校中也执行同样的纪律。我的朋友们告诉我,在那个星期里,我满脸是坚决而严肃的表情,经常在校中兜圈子。我常把头发在右面分梳开来,我的额发几乎掠到眼睛上。这种发式,再配上我值勤时令人难以亲近的容貌,使我获得了“希特勒”的称号。但是,我发觉这个称号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因为孩子们很快就发现,在我值勤的那个星期,星期六没有人该关禁闭。由于在我值勤期间,几乎很难得去请求教师们惩罚任何一个学生,因此我也很受教师们的欢迎。

在穆纳利的那些日子里,给我影响最大的教师,是丹尼尔·桑奎希。他是从南非来的,在黑尔堡得过学位。星期六上午,全校同学被分派去打扫整个校园,我们有一些学生到教师家中去帮助打扫。丹尼尔·桑奎希是单身汉,我经常在星期六上午去帮他打扫屋子。当我打扫完毕后,他常请我坐下,和我谈谈他在南非的生活。我第一次懂得了“种族隔离”这个词的意义。我听到许许多多关于我的非洲同胞在南非联邦白人统治下受到侮辱的故事。有时桑奎希会对我说:“肯尼思,现在我们要在南非干出

点什么几乎已经太晚了，我们已失去了机会，但在这里，我们并不太晚。象你这样的青年人一定要深信：我们在南非的遭遇，决不会在这里重演。现在是要由你们来搞了。”我们大家对桑奎希都非常尊敬。我们知道他要供养他的残废的父亲，从自己每月的低薪十三英镑中，经常要汇十英镑给家里。

也许是由于我们共同的兴趣都是喜爱吉他，使我们俩建立起最亲密的关系。他和我组织了一个歌舞团，在我读完二年级的假期内，我们出发到铜带区举行巡回音乐会。我们在铜带区的大多数城镇上演出，听众很多。但是由于大部分收入被人偷去，因此这次巡回演出，并没得到我们所希望的经济上的好结果。我自己也处于困境，因为在去铜带区的路上，我丢失了我的旅行袋，袋中有我回家必需的政府旅行执照。当我到布罗肯希尔时，我就去见公署的首席秘书（他是我的朋友），请他带我去见区专员，说明我的窘境，请求发一个新执照。当我走进办公室时，我说“早安”。区专员却转向首席秘书说：“用班巴话告诉这个人，要说‘早安，先生’。”在整个会见中，那个区专员一定要首席秘书把他所说的一切译成班巴语，而我却用英语讲话。我上学以后，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努力学好英语，而且还学习了英国文学，但是这个区专员要把我拉回到他认为我应该处的地位——“区区一个普普通通的土著”。

在穆纳利，我们有一个非常活跃的辩论会，我也参加了。当然是不允许我们讨论任何政治题目的，我已记不起当时我们讨论的许多内容了，虽然有一个意外事件现

在还清晰地印在我脑海中。有人要我提出“老鼠只有在脏屋里才能找到”这一议题。对于这个我并不真正同意的题目,我尽了最大努力去讲。正当我讲完坐下时,一只大老鼠穿过房间,个个人都迸发出嘲笑声。不用说,当这个议题付诸表决时,我的附议人是我的唯一支持者。

三 教 师

我通过了中学二年级的考试，是被挑选升入三、四年级的八个男孩中的一个，但是我家乡卢布瓦迫切需要教师，为此教会叫我回家乡去，我被任命为卢布瓦男童小学的舍监。回到老家我是乐意的，但要我担任的工作却十分艰难，因为尽管我的学历较高，但其余的老师都比我的资格老得多。过去虽然我读完两年的教师训练班，并在教师指导下做过一些教学实习工作，但我从来没有担负过任何重大的职责。

我想，人们是把我看作一个严格执行纪律的人的，可是由于我非常喜欢踢足球和弹吉他，我同时又和学生们关系很好。那个时候，我很讲究衣着。我的衣服，甚至短裤，都是由钦萨利的缝衣工特别裁制的，学生们在服装上开始学我的式样。

钦萨利非洲人福利协会设立在离卢布瓦五哩的政府公署所在地钦萨利。大多数会员是公署的职员和当地的教师。我参加了这个组织。我们讨论了这个地区有关非洲人福利的一切事宜。我们如果有什么申诉，就把决议送给区专员或者送给教会。我所关心的，主要是协会的社交活动。我们组织舞会和足球赛。我把那些会议的记录保存好多年，但在很久以前，那些记录给白蚁蛀蚀了，我只记得一件事，就是关于向区通讯员们发靴子的问题。

我想不起究竟为什么我们对这件事这样反感，但我们为这个问题连年向区专员申诉，没有得到满足。

福利会看来具有初期非洲人城市团体的特点。爱泼斯坦教授在他的《一个城市非洲人社会的政治》一书里，对福利会作了如下的介绍：

福利会是 1936 年举行的区专员会议上的议题。布罗肯希尔区专员把福利会称作“受过教育的土著舆论的代表团体”。在布罗肯希尔，福利协会好象是被当作咨询会之类对待的，区专员在提出新税率建议之前和福利协会磋商，新税率公布之后，区专员又商请协会帮助向公众解释这种变更。这个区专员还说，由于协会无疑地代表“有思想和政治头脑的非洲人士”，他把协会看作是“土著舆论的最好的晴雨表”。其他发言者对福利协会持较少赞许的见解。有一个人称协会为“给受过教育的土著在同伴面前亮相和炫耀他的英语的机会的辩论团体”。普遍的意见似乎是：由于这些团体的会员来自受过教育的阶级，大多数是职员和工头，他们不能被看作整个非洲人居民的代表。会议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应该容许协会沿着辩论团体性质的方向发展，但它们不得讨论政治问题。

早在 1945 年，我的老朋友中校斯图尔特·戈尔-布朗爵士，拿官方的城市咨询委员会作对比，指出福利会的价值。在致 1945 年召开的省专员会议的备忘录里，他说：福利会之所以具有卓越的活力，其原因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当区专员任命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时，他们不得不从社会的主要各界里挑选代表，而福利会通常没有正式

的组织，它仅仅对当地社会上最进步和精力最充沛的个人具有吸引力。

这种见解不为这次会议所普遍接受，省专员们说：他们认为，福利会主要包含更进步和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他们除代表自己外不代表任何人”。这个怪论，特别突出了我们长期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一个方面的情况。我们认为，我们是在白人移民统治的社会里无法表达自己受挫折心情的大众的喉舌，但我们却被污蔑为追求个人野心和贪图权力的政治煽动者。直到1960年3月2日，北罗得西亚立法会议内统一联邦党的领导人约翰·罗伯茨先生，还警告公众，提防“拚命想夺取权力的政客们”。他当然是指我本人和我在联合民族独立党里的同事们。

我在卢布瓦当了四年教师，不但在学校里忙，为钦萨利福利协会的工作而忙，而且为我的一伙“牛车旅行者”而忙碌。我们不能称这伙人为“幼年童子军”，因为那是为几伙欧洲人保留的称号。现在太好了，非洲人的“开路人”和“牛车旅行者”已经和欧洲人在童子军协会里联合起来。

当时我毫不知情，我的母亲正伤透脑筋在为我物色妻子。在大北路上姆皮卡那里，住有一家姓班达的，他们是我父母亲的多年朋友。班达先生是一个出名的商人，他在姆皮卡公署附近开设了一家商店，他有一个女儿，她和当时大多数女孩子不一样，在小学里一直念到四年级。她是一个勤劳的女孩子，课余时间她为区专员的妻子当“小保姆”，挣得了一些零用钱。她是学校最高一级里仅有的两个女孩之一，学业不逊于男孩。1944年，她到姆

贝累希一所著名的女子寄宿学校受两年师资训练，在那里，她接受初步的烹饪、缝纫和其他家政学科的训练。

母亲以正确无误的判断，从这一带所有的女孩子中选中了她作为我的未来妻子，而且双方父母已把婚事安排定当了。1946年6月，我旅行到木富利腊去参加在F·J·贝德福德牧师（现任伦敦的英国和外国圣经会干事）率领下的童子军训练营，路过姆皮卡的时候，我的堂兄弟为我安排和贝蒂·班达会了面。我初见到她，就确信我的母亲作了聪明的选择，以后我未曾有过意见。贝蒂已为我生了六个强壮的儿子和最后一个女儿穆萨塔，当我们这个小宝贝醒着的时候，她可以听到我写这本书稿时轻叩打字机的声音。我的妻子在许多年之后才安于我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流浪生活。我想，她现在也还是巴不得我当一个值得尊敬的教师。贝蒂一直忙于抚育孩子，我不常在家帮助她。有一次，国民大会在卢萨卡开会期间，她参加“妇女队”，和其他几百名妇女一起，在区专员办公厅外面示威。警察用催泪毒气驱散群众。在那次事件中，泰特斯·穆库普（现在《非洲邮报》社工作）在旁观示威时被捕并受到十八个月的监禁，虽然他和组织示威队伍毫无关系。

虽然我在卢布瓦在约翰·纳尔逊下面担任教学工作很有效率，而且我以为也还愉快，但我是心安的。我的一个哥哥是在陆军部队里，我先后两次申请担任陆军教导团的教职。第一次我的母亲劝阻了我，第二次教会说服我应当留在家乡工作。回顾我这一阶段的生涯，我问自己为什么不满足于当一个教师？我有一个好的职位，而且幸福地结了婚。虽然薪金不高，但我可以从园子里

取得大部分的食物，我的大多数的钱都花在衣着上。经过反复思考，我想我是为了摆脱母亲长期的支配以及对教会权力的厌倦。过去我的生活全是按别人替我计划的办，现在我要打破这种情况，就是这一次由自己独自来主宰。我开始东寻西找别的教学工作。

四 我的流浪时期

我们三个卢布瓦的教师是亲密的朋友；西蒙·卡普韦普韦，从当年我们坐在卢布瓦医院的走廊里等待包扎伤口时起就相识，另一个是约翰·索科尼。西蒙和约翰接受了坦噶尼喀一所中学里的教职。他们到达那里时，听了有关他们前途的令人鼓舞的描述，于是西蒙拍电报叫我去那里和他们一起干。我立即赶坐卡车去姆贝亚，但是我到达时，来迎接我的却是两个大失所望的朋友。他们的工作报酬是达累斯萨拉姆资助的，他们的希望破灭了。我们三个人决定回家去。我们在穿过坦噶尼喀的旅途上，看到一个非常茂盛的橡胶园，这些橡胶树只栽培了六年，已经产胶，正在卖得厚利。这个橡胶园是一个非洲人和他的一个欧洲朋友经营的。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个人坐在姆贝亚的山坡上，展望美丽的群山，议论我们的前途。我们说，倘若橡胶树能在坦噶尼喀成长，它们也可能在北罗得西亚成长。我们不是在席瓦看到过大种植园吗？我们体会到，没有资本就无法开办农场，因此我们决定到城市里去找工作，为开办农场积聚足够的资本。我还记得，当时陆军里需要合格的教师，因此西蒙和我决定到卢萨卡去求职。经过了一些耽搁，我们被接受了并开始工作，但仅仅工作了一天，他们给了我们半克朗，就叫我们离职。我一直没弄清究竟出了什么事，但我想陆军方面一定得到消

息,说我们属于“不受欢迎的”角色。

我早先已在联系南罗得西亚的一个教师职位,所以我就继续旅行到南方去。这是在索尔兹伯里附近的一所救世军学校。不幸我耽误了从北罗得西亚动身的时间,以致到学校为时已迟,那个职位已由另一个教师在担任了。但是教会的领导人说,在离索尔兹伯里大约八十五哩的宾杜拉矿区,另外一所学校有教师的空额。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得去接受这个职位,所以我及时地坐公共汽车出发。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在那次痛苦的旅途上自己的种种思想。我赶了五天路,没有洗个澡的机会;我是又疲乏又肮脏,在异乡无亲无友。我想来想去全是想家,浪子回头的寓言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当我们离目的地不远,公共汽车在路旁停了下来,我从窗口望出去,看到一个老妇人正在从路边排水沟的混浊积水里掏出水来往一个葫芦里灌。我问我的旅伴,这个妇人究竟在干什么,因为当时是雨季,她总不会要提水去浇她的园子,也不至于要提水去烧砖头。我的旅伴对这种在我看来是很异常的行为,却并不表示诧异,他说:南罗得西亚的这一带地方缺水,这个妇人必须步行几哩路才能到达最近的河流。他说,她取水是为了日常家务上的需要。

当我站在那所学校校长住宅的门阶上时,在他的眼里,我一定显出了一副怪相。我背上背着一个笨重的背包,头上顶着一大箱书、一提箱衣服、一捆毛毯,肩膀上挂着我的吉他。我的头发里布满灰尘,我的衣服又脏又皱。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问哪里我可以洗澡。旁人告诉我

说，河在三哩路外，但沿这条路下去有个地方可以取到水。我动身走去，走了一段时间以后，经过一个肮脏的池塘，那里有烂泥没到膝部的几头牛在饮水。我朝前走，一路上张大眼睛，寻找可以洗澡的地方，每走一步，就感到更加疲乏，更加饥饿，更加肮脏。大概走了一哩半路以后，我问路过的人，哪里有洗澡的地方。他们朝后面向我指点那个牛池。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得走回头路，在那个肮脏的地方尽可能把自己洗了一番。当我终于回到学校时，我拿到一份非常坏的饭菜，简直难以下咽。那天晚上，我决定尽快回家去，但次日早晨，我发现身边已经没有钱了。什么办法也没有了，除非卖掉一些东西。我想到我珍贵的吉他，但吉他音乐是那些日子里我唯一的安慰，我离不开它。我把从刚果边境莫坎博用三十先令买来的一件旧短上衣设法卖了五十先令，还将母亲给我的一件毛衣卖了七先令六便士，虽然这件毛衣的价值要贵得多。

我乘公共汽车回索尔兹伯里。那里的售票员要我出示“派司”才肯卖给我车票。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要求出示通行证，当然，我是没有的。谁会发给我通行证呢？我深知南罗得西亚的通行证条例的苛刻名声，并且亲眼目睹当场逮捕的情景。我慌慌张张地把手伸入胸前的口袋里找我的北罗得西亚身份证，我知道它在南罗得西亚是无效的，但它至少提供了我的姓名。恰巧，在我的钱夹里，我的卢布瓦教会迁移证和我的身份证放在一起。我取出证件，还来不及说明，售票员就把这张官方式样的证件认作是某种通行证，不问一声就给了我车票。买了车票后，我数数零钱，发觉只剩下三先令六便士来买食物

了。我买了一条黑面包和一瓶马佐埃橘子汁。我知道还要赶四天路,就把小刀拿出来,小心翼翼地把这条面包平分做四块。

在布拉瓦约,我初次看到一个欧洲人和一个非洲人在打架。这个非洲人是两足都跛的残废者,那个欧洲人用拳头狠狠地打他的脸部。这个非洲人虽跛,肩臂却强而有力。突然间,他向行凶者反击过去,抓住那个欧洲人的手腕猛摇,象一条狗猛摇一只老鼠一样。我恐怕发生惨剧,于是冲向我以前看到过一个警察的地方,但警察已经不在,当我回来的时候,这场打架已经结束。几个旁观者把这两个人排解开了。除去有时候在银幕上看到的骑马牧童间的殴斗外,这是我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看到一场真正的殴斗。

当我在布拉瓦约重新上火车的时候,我发现和到铜带区基特韦去的一家人坐在一起。我们一起闲谈,我拿出那瓶橘子汁,请他们大家尝尝。我们十分友好,他们一定注意到,我除了一小块黑面包以外,整天没吃什么东西。那天晚上,他们邀请我和他们一起进餐,我接受了他们殷勤的款待,但是第二天我全天避开了他们,因为我感到为难,怕他们打算再请我吃东西。重新通过赞比西河,回到我自己的国家,是多么欣慰呀!在那里,我遇到几个我以前在卢布瓦的学生,他们把我接下火车,并招待我洗澡和就餐。浪子又回家了。

我依然想为农场筹集资金,就到铜带区去。在坦噶尼喀的那次旅行后,我的朋友约翰·索科尼离开了我们,他到基特韦的一家商店里工作。我想我应当去看望他,看看

他当店员运气怎样。我在商店外面的人行道上和他见了面。他满脸愁容走出来。他刚拿到一个月的工资二十六先令。

虽然当时我不了解，我几乎落入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手掌之中。有一个担任矿地欧洲人工会领导人的白人，他大大地违背了他的白种人伙伴的愿望，主张应该把非洲人吸收进(欧洲人)矿工工会。他刚开过一次海外工联主义者会议来到这里，他在会上拿到了一笔款子用来帮助他组织非洲人参加他的工会。我申请当他这个工会的非洲人分会的组织秘书，但由于当时我不了解的某种原因，这个计划被取消了。

直到我读过爱泼斯坦教授叙述非洲人矿工工会成立经过的著作之后，我才了解到这个插曲的幕后情节。这本著作值得一读，因为它说明了我们非洲人对白人移民向我们提出的任何创议为什么有怀疑：

在欧洲人矿工眼里，在非洲人矿工中间可能要开展一个坚强和独立的工会运动被看成立即构成对他们自己地位的一种威胁。(欧洲人)矿工工会主席，他在前些时候还说建立非洲人的工会是一个无法制止的群众运动，现在却开始在多次会议上演讲时向非洲人提出种种建议。他企图说服非洲人放弃单独建立工会的想法，改为参加现有的矿工工会。他争辩说，非洲人工会将是软弱和无效力的，因为在政府的管辖下，非洲人不会取得罢工的权利。他进一步指出，这种运动引起劳工队伍的分裂，将加强采矿公司的地位。但是，这些提议被非洲人的领导人拒绝了。他们问道：(欧洲人)

矿工工会成立以来已有许多年，始终没有提出过这种建议，而在非洲人即将有他们自己的工会的时候，这种建议却提出来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非洲人的领导人还宣称：他们未经锻炼，对工会会务毫无经验，如果参加到欧洲人矿工中去，那么全部行政管理和进行谈判的权力必将为白人所拥有。非洲人问道：如果他们得不到办理他们自己工会的职权，那他们将如何能有机会证明他们有能力在更广阔的政治领域里担负起责任。

这是我怎样差点儿成为一个工联主义者的经过。这时候我以为，我受过当教员的训练，挣得资金的最好机会便是做教学工作。于是我申请铜带区的一个教师职位。在我等待申请是否被认可时，我得到了在恩昌加矿当福利助理员的职位。我的工资是每个月四镑，我厌烦透了。我的职责似乎就是闲呆在福利中心和开放图书室。图书室里的书籍，我在学校里的時候几乎全部都读过了，我的上司是一个不值得我尊敬的人。当我又被接受做教学工作时，我才松了口气。这个时候，贝蒂和我的第一个孩子已和我在一起，我们一同到木富利腊去。我被派在弗格斯·麦克弗森牧师管理的学校里担任舍监，我的妻子在小学教书。我们决定共同努力改善我们的生活水平，为了增加我们的总收入（当时我每月赚五镑十三先令六便士，我的妻子每月三镑三先令六便士），我们决定从刚果边境的莫坎博买进旧衣服，拿到家乡去出售，稍稍赚一点钱。当时法令准许老百姓可以越过边界到刚果去买美国旧衣服，但每个人只准带回一件短上衣和一件女服或男

衬衫。在月底我领到薪水之后，我就组织一组学生，我们在星期六下午过境到莫坎博，然后穿着各色各样奇特的服装回来。

学校里许多寄宿生筹措入学费用有困难，所以我组织他们成立一个自助会。他们买了种子，在学校附近开辟园地种蔬菜。这些蔬菜我为学校向他们买下来，就不必向市场出售了。这样，许多学生就挣得了他们的入学费用。几个年龄大一些的孩子要求参加国民大会的地方支部，我是支部的副书记；为了筹集会费，他们同意每星期各缴一个便士，由我收集。在木富利腊，我很乐意地训练了一个唱诗班，它在当地相当出名。

我被其他老师选为他们在市咨询委员会里的代表。我在市咨询委员会里服务了一个长时期，但是会议是十分枯燥的。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是由区专员同委员会里有代表的各种团体磋商后任命的。1949年，我被选入省的委员会，并差一点被省委员会选作代表参加整个领地的非洲人代表会议。

五 种 族 隔 离

在木富利腊，我第一次发觉自己受到种族隔离的侮辱。欧洲人的商店是不准非洲人从前门进入的。非洲人如果要买东西，就得到商店侧边墙上的一个洞口去买。我下决心要揭露这个制度的实质：它是对我们种族和人民的一种侮辱。我告诉学校里一些男学生，我打算向种族隔离挑战，已选定城里一家对待非洲人已臭名昭著的药店。这家商店除卖药品外，还卖玩具和书籍。我的男学生们在外面人行道上等着，我走进店里去，有礼貌地提出要买一本书。记得是阿瑟·米著的《对青少年的讲话》。我的朋友约翰·索科尼，以前曾把这本书的一个破烂本子从一个矿工手里(他把它当作卷烟纸用)抢救下来，这是一本对我一生有深刻影响的书。

站在柜台里面的那个女店员，也许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非洲人用她自己的语言同她说话。她做手势叫我到站在柜台里面的药商那里去。我又重新向他说要买一本书。他指着门口，恶狠狠地说：“滚出去！”我又说：“我只要买一本书，城里别的地方都买不到。”他说：“你站在这儿直站到圣诞节吧，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一本书。”我正在想，那时正是八月，还得等很长一段时间；这时候，两个穿工作服的白人矿工走进药店。他们听见店主又说“滚出去”，就抓住我的两只臂膀，拖手拖脚把我架到门口，正遇

到十七个愤怒的学生，他们用明确的语言，强烈抗议用这种方法对待他们的老师。随即发生了一场情绪激动、言语粗鲁的争吵；他们把我们叫做“黑鬼”，我们回敬说，他们披着一张白皮，又有什么了不起。那两个欧洲人寡不敌众，走向汽车，溜之大吉。

我立刻赶到公署，控告我所遭受的待遇。有一个我所熟悉的年轻的区官员在那里。他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他同情地倾听我的陈述，愤慨地用拳头敲打桌子。他说：“喂，肯尼思，你要有什么事，来找我好了，我给你写张条子。”我说：“但是，这不是主要问题，问题是还有别的千千万万人需要在商店里受到正常的人类待遇，叫他们怎么办呢？难道他们每次都得到你这儿来拿一张条子吗？”他答应写封信给药商，我就让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几天以后，我决定再到那家商店去，看看那个区官员的话是否使情况有所改变。我又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但站在柜台里的却是另外一个人，他命令我离开商店。我说，我一定要采取一些步骤。他只轻蔑地笑笑，说：“你试试看。”我又到公署去，这一回那区官员陪我回到商店。我清楚地记得他对药商讲：“你是否意识到你竟如此对待一个不久要参加立法会议的人？”（这时我刚好被选上省立法会议）店主稍微有点吃惊，把我请到店里给我道歉。他说：“卡翁达先生，只要你告诉了我你是什么人，我一定不会命令你出去的。”我不得不再次申明，我不是要对我个人有什么特别照顾，我只要求我的人民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应该得到合理的有礼貌的待遇。在这个事件发生后不久，我就离开了木富利腊。再没有人继续我的抗议，在那些商

店里，事情又回复到通常的状态。

直到1957年，对这个问题我才又一次提出挑战，那时候我正同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哈里·恩坎布拉一起访问基特韦。那是在基特韦白人区，附近没有非洲人饮食店。我们驱车到一家咖啡馆，司机已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要求在店里面吃，那么需要什么都可以买到；但是他没有向我们讲明，即使这样买东西，也得站在门口，等非洲人侍者出来问明要什么，再进去把要的东西拿出来。我们走进咖啡馆，到柜台那里，我说要一些三明治。一个大约十七岁的青年女店员回答说，柜台上不接待“崽子”。当我告诉她，我不是“崽子”，我不过要买一打三明治罢了，她同一个显然是掌柜的上了年纪的白人妇女说话。这个妇人问我要什么后，又重复说一遍：柜台上不接待“崽子”。接着我也重说一遍：我不是“崽子”。就在这时，我被一个欧洲人扭住衣服，拖出咖啡馆，哈里·恩坎布拉已经先被他拖出咖啡馆了。这个白人打哈里，骂他是下贱的、非打不可的黑鬼。另外五个白人参加进来，和他一道攻击我们，我们进行自卫。过路的白人和黑人都来参加打架，一场“种族隔离”的争吵发生了。这是我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打架。

我们被命令离开这个店，但是我们拒绝了，理由是白人首先挑起打架，我们一走，他们就要溜了。最后，不顾我们是原告这一事实，由一个非洲人警察把我们押送走。白人却不经押送，到警察所去。

在警察所，要我们陈述事情的原委。哈里·恩坎布拉开始说，柜台上的女店员拒绝为我们服务。他还没说

完这句话，跑来制止这场殴斗的白人警长说：“你不该把白人太太叫做‘女店员’或‘女人’。”哈里不理这个，继续说：“那以后，一个年纪大的女人来了，……”但是，又一次，他还没把话说完，警长就说：“听我讲，你这个不要脸的黑鬼，你不该把一个欧洲人太太叫作‘女人’。”

接着，这个警长把哈里叫到一个房间里，关上门，揍他。哈里告诉这个警官，他幸而身穿女王陛下的制服，不然的话，一定要跟他拚个你死我活。

当这个案件提交法庭时，我们要求由我们自己选定医生进行一次体格检查，但是被拒绝了。因此我们不想把这场官司打下去。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早上，一群矿工来到咖啡馆，对店主说：“听说我们的领袖在这里挨了揍。我们报仇来了。”有一个警察在警卫咖啡馆，结果群众的领头人被逮捕并被处罚金。

这类事件，在联邦不断发生，而按照象罗伊·韦伦斯基爵士之流的代言人的说法，联邦正在取得种族之间的伙伴关系和好感。

即使在我写本书的时候，尽管北罗得西亚政府通过了反种族隔离法案，不幸的事件仍会发生。就在上个月（1962年3月），北罗得西亚基督教协进会副会长 M·S·卢契亚牧师，和他的欧洲人同事、协进会会长一同走进一家咖啡馆，要买一杯茶，被拒绝了。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欧洲移民待我们竟象对待什么低等人种一样，我们常常为此感到怨愤，这难道还有人会感到惊讶吗？

当然，可以在本书的每页都写满这类故事。在我们

自己人中间，可以连续几小时谈笑这些事情，因为它们常常使欧洲人显得非常愚蠢。在我们联合民族独立党总部，有一个忠实地为民族独立运动服务的勤务员。他是个穷人，他从来没有得到受良好教育的条件，因而不能说流利的英语。几年前，有一天，他到老卢萨卡邮局去，在那里，那时还实行种族隔离。他无意中发现自己走到欧洲人那一边去了，因为周围人不多，他就走近柜台，把一先令送进铁格窗，并说：“夫人，请给我几张一便士邮票。”她理也不理。于是，他再试一下说：“小姑娘，请给我几张一便士邮票。”这时，那办事员召来一个警察，我们的勤务员被要求对自己的行动作出交代。他以他特有的有力的语言对警察说：“我说，夫人，邮票。她不睬。我说，小姑娘，邮票。她不理。我说这事蠢得很。”幸好，那个警察颇有点幽默感，把这件事一笑了之。

六 我决定回家

1948年底，西蒙·卡普韦普韦、约翰·索科尼和我三人一致决定回家。我们积蓄起一些钱来买自行车，以便来来去去，并随时参加集会。我们决定买手表，以便能准时参加这些集会。我的妻子和我决定，也要买一部缝纫机，帮助我们修补我从卡塔布尔韦带回的需要在出售之前加以修补的旧货。我已经提到过我周末到莫坎博去的旅行。从我们少得可怜的月薪中提出的小额储蓄，加上我们设法从出售旧货中积起来的钱，帮助我们买下了这三大件必需品。

我记得我们正在考虑用什么东西来装行李时，耶稣基督在圣经中的教导惊人地显示出来：“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一天早上，我们家的一位好朋友恩卡卡先生来看望我们。他告诉我们说：他和我们的几个高年级学生正在做一口木箱给我们装衣服。这使我们大大松了一口气，我们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恩卡卡先生是我们学校的教务主任，他和恩卡卡夫人也是我们礼拜堂唱诗班的成员。这类事情在我一生中是很多的，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并鼓舞了我。

我们的许多朋友到木富利腊火车站来送行。虽然我们学校的男女学生在休假，他们来送行的却很多。在卡

皮里姆波希，我们没有找到卡普韦普韦一家人，他们本要在那里和我们会合的，因此，我们没有等到我们的朋友就离开了。我们没有充裕的钱足以支付我们个人的车费以及几件行李的运费，所以我的妻子只买了到姆皮卡公署的车票，当时我的岳父母住在那里。索科尼和我带上我们的自行车则买票到姆皮卡公署以南大约九十哩的卢库卢。我们在卢库卢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傍晚安全到达姆皮卡。我们正在纳闷，我们怎能骑自行车穿过姆皮卡和钦萨利之间大约一百二十哩有狮子出没的地区，这时候，我们那缺乏信仰的心灵又一次被提醒造物主是多么神明。那天，我们的一个开卡车的朋友叫我们搭车到钦萨利。我们回家受到了热烈欢迎。索科尼到他父母家去，我留下来计划下一步行动。

许多老朋友来欢迎我们回家，其中有一个是我早年的老友；他已很久不在我们区里露面，在我离家外出时才回来的。他是罗伯特·S·马卡萨，仍在卢布瓦教书。我平生第一次坐下来按自己的意思计划自己的生活。

我立刻被三种东西吸引住了，那就是生性喜欢的务农、经营旧货和搞政治活动。作为一个坚信人民贫苦的地方应该开展合作社运动的人，我邀集了少数几个朋友，用我母亲的地方办了个合作农场。我们把它称为钦萨利青年农业协会。索科尼在我们南面的地区开办了一个同样的农场。我们两人分别在各自经营的地方被选为经理。从我们过去对此毫无经验来说，我应当说我们干得挺不错的。我们广泛阅读所能得到的一切有关农业科学的东西。对我来说，这是非常愉快的日子。我获得了那种订

出计划又依靠自己力量加以实现的满足。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小孩，班吉·托什库，就是那个在周岁时，当着我和很多小学生的面，站起来跑到墙边，从此就不再爬地的小家伙。他就是这样开始走路的。他不肯离开我，我外出时，总是只好偷偷地溜掉，因为他要是知道我要离开他，总要哭哭啼啼跟在后面，嚷着要我回去。所有我过去在木富利腊的学生，我一遇到他们，他们总记得他，问候他，因为小家伙很受他们的欢迎。我为自己修建了一座四个房间的屋子，前面布置了一个很好的花园。我的大姐是退职保姆，她搬来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也为她修建了一座四个房间的屋子。我的哥哥仍在教书，休假回来时，就住在他原来的有三个房间的那座屋子里；我的二姐休假回来时，就同大姐住在一起。我们是一个愉快的大家庭。

我种了许多蔬菜。在我那一亩大的果园里，有橘子、柠檬、番石榴、巴婆果和芒果树，还有香蕉。我的一大困难是灌溉。我的最大乐趣之一是养鸡。我的邻居是个非常勤劳的农民，名叫艾伦·姆巴拉什，他养了一些良种鸡，他的良种鸡的鸡蛋每个卖四便士，他卖给我们帮助大家改良家禽。还有几块地种玉米、木薯、豆子、谷物和其他农作物。最愉快的时期是种子发芽的时候。这一切意味着真正艰苦的劳动，但都是我自己的劳动，我真喜欢它。

另外还有那赢得了莫坎博这一美名的旧货。我想这原因是：大部分第一批畅销的旧货是在铜带区出现，而从莫坎博买来的。我会同几个邻居骑自行车赶三百多哩路，到卢瓦普拉河对岸在当时比属刚果的卡达布尔韦，再渡过卢瓦普拉河回到北罗得西亚，然后就是抢着把货物

装上扎吉尔和霍布逊的运货汽车。这一切都是非常紧张艰苦的。接着就是长途的自行车赛跑，赶在货物到达之前回到家里。当我不在农场时，我的姐姐负责农场劳动，我的妻子经营旧衣商店。

我的政治活动并没有由于我离开铜带区而停止。在1949年底，为请准在钦萨利设立一个国民大会的支部，我同当时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总书记罗宾逊·纳布利亚托联系。我得到了批准可以着手进行，于是同马卡萨和索科尼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一致认为进行这事的最好办法是把它在钦萨利非洲人福利协会上提出来。我们照这样办了，国民大会在钦萨利受到了谨慎的欢迎。在3月初，马卡萨被推选为主席，我被选为书记，我们的一个朋友西蒙·苏拉先生被选为司库。后来我们知道，当时流传着谣言说谁担任国民大会的职务，谁就要坐牢。这个谣言传得很广，以致那些任命实际上是把我们将作实验用的牺牲品，因为把国民大会引进来的正是我们这几个人。苏拉先生在职业学校当会计主任，马卡萨担任恩库拉初级中学校长。

这以后一个时期是我生平最惊人的时期之一。整个星期，我在农场工作，马卡萨教书。每星期五，我骑自行车到他的学校去，下班之后，我们就骑自行车跑四十哩到六十哩路。我们一路唱着赞美诗，是R·D·麦克明牧师和P·B·穆兴杜牧师从苏格兰教会的赞美诗集中译成班巴语的。我们象这样把自己完全交给造物主的心情，在以前还不曾有过。钦萨利区一直有许多吃人的狮子，但这种吃人的狮子是否在外面活动，却是谁也不在

乎的。我们继续前进，把我们的人民组织起来。当马卡萨太忙不能去时，索科尼一般总是去的，如果两个都不去（这是很少有的事），我就一个人去。在这个时候，钦萨利人民得到的是什么启示呢？我们必须使我们的人民意识到，他们是人类，他们同其他人种一样好或一样坏。即使在十二年前，这种启示也不难在我们的人民中传布。我知道：我们这些为保卫大英帝国而战斗过的大多数人民，都是白吃了苦头；我们只被雇作劈柴担水的人，我们不能同桌而食，也不能在旅馆里睡一样的床。我要问何者更重要：是为别人准备饭食和卧床呢，还是分享它们？一个人给你做饭，为你铺床，并照管服侍你，这正是在掌管你的生活，这难道不是常识吗？要是有人说，你可以掌管我的生活，可是说你臭，或者因为你是个黑人，我可不愿跟你同桌而食，这又是多么荒谬啊。接着就讲我那个尽人皆知的故事。

这是一个非洲士兵的故事，他甚至不被人称为士兵，而叫做“阿斯卡里”^①，尽管如此，他却被送去与希特勒这个可怕的种族主义者作战。实际上，我们是去保卫所谓西方的或者基督的利益。我指出在薪金、制服、饮食以及所有其他当兵条件方面存在着的差别。接着我就描述这个“阿斯卡里”，在向他所作的诺言一条也没有实现的情况下退伍了。这个“阿斯卡里”受到的苦痛是够多的，终于不得当筑路工。后来他要路工工头让他搭一次车，工头却叫他坐在一辆政府敞车的后面，同时工头的狗

^① 意思是“土著兵”。——译者

却同工头一起共坐前座。在旅馆里，这位大工头叫他留下看行李，自己却到里面去吃饭。他给狗一些东西吃，而这个退伍的“阿斯卡里”却什么也没有。接着他们到城里去，这个跟他的英国对手一样曾经冒过生命危险的人，跑到商店去，却看到门高头写着：“犬不得入内”。想不到当他遛达看看商店橱窗时，却从橱窗里看到商店里确实确实有一只狗。如果他试图走进去，在门口赫然迎接他的，便是：“滚开，你这个黑鬼、猴子。”“卡菲尔人不准入内。”接着，他自己的黑人同胞便走来命令他出去，“到小洞那边去。这里只有白人可以进来。”然后这个退伍的“阿斯卡里”就回忆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些日子。他记得他们是怎样发动一个个运动来征召他和象他一样的人入伍的；记起白人和黑人士兵之间的差别待遇；记起别人向他作出的诺言，答应退伍后给他什么。然后他又回到比较现实的事情上来：他的路工工头如何使他受热、受冷和淋雨，而工头同他的狗却一起共享温暖及其他一切。最后他要问：“韦伦斯基所说的这个国家里的伙伴关系，到底在哪里？”从那点出发，他才决定参加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这几乎是我每会必讲的内容。我最后总要问：我说的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有人有足够的勇气站起来证明是真实的。许多退伍者发现他们同演讲人一起泣不成声。很多听众，不论男人或女人，也都如此。我说的话，是不会不起作用的，因为这正是非洲人的亲身经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今天仍然经历着。区别在于，在1950年时，只有很少人认识到所发生的事情是错误的，今天懂得的人已很多了。现在成千上万的人不但体会到

所发生的事情是错误的，而且还认识到，如果他们团结起来，就能纠正这种错误。我用这种方法，把钦萨利人民的政治觉悟激发到比较高的水平。

R·R·斯托克斯先生很为我们作为农业经营者组织起来的努力所打动，因而开辟一条从公署到卢布平原的新公路，来帮助发展我们这个地区。有一天，人家抓住他对我们的同情，加以严厉责问。这是第一次在一个英国政府代表和普通人之间出现了直接冲突。事情发生在大酋长恩库拉的村里。我说不确切当时的麻烦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个人有勇气说，而且确实说了。我现在还能清楚记得当时政府官员们面部那极其可憎的表情。

在1951年，发生了有助于加速这个国家非洲人民民族主义运动步伐的事情。哈里·恩坎布拉先生常到印度洋各岛收集海贝到布威拉去出卖，在他有一次这样来往时，受当时任总书记的纳布利亚托先生的邀请，来参加我们在卢萨卡的会议。姆比库西塔先生当时是我们的主席。我记得他在当时所说的话里有这么几句：

我相信，北罗得西亚非洲人民的未来，在殖民部手里，比在任何形式的责任政府或联邦统治下，来得安全些。我不相信，如果把北罗得西亚合并到那个几乎有完全的责任政府的南罗得西亚，殖民部会起那样强大的影响。

在说到向国务大臣所提出的请求时，他继续说：

非洲人不只依靠担任这一职位的个别大臣的好心肠。大臣是通过下议院向英帝国人民负责的，而极大一部分人民——英帝国的选民——是男女劳动者，他们

比殖民地人民的雇主更能懂得殖民地劳动人民的痛苦和希望，尽管这些雇主身在非洲。英国的男女劳动者知道哪些公正和自由的待遇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不会不愿给非洲人以同样的待遇。

当时，姆比库西塔先生是反对联邦的，以下所引的话可以表明：

诸位大概记得，在维多利亚瀑布城会议后两年，我作为你们的主席，在基特韦非洲人协会所作的演说中，曾提出过一个建议，认为在北罗得西亚、尼亚萨兰和坦噶尼喀之间建立一个联邦，较能为人所接受。不幸的是，伦敦会议讨论的范围太狭窄了，不能包括这个提议的内容。我愿意再一次提出这个意见，这一次并包括以下内容，即：由政府发起在伦敦召开一个所有东非和中非国家的代表参加的会议，考虑更密切联合的需要。若是能有一个包括坦噶尼喀托管地、肯尼亚这个政治上进步的国家、乌干达和桑给巴尔这两个非洲保护地在内的联邦的话，那末我们这个国家和尼亚萨兰的非洲人就不会再有这么大的焦虑了。在这样大的联邦中，南罗得西亚十三万四千个欧洲人的影响，决不会再有这么大了。

他用称赞黑斯廷斯·班达博士和“我们所有杰出的成员”的话，作了结束。

就这样，那个在1951年带头反对联邦的人结束了讲演，他在第二年却成了第一个参加那个赞成联邦的党的非洲人，而且从此一直当了联邦议会的议员。这就是他的历史：他在1951年提出泛非主义联邦，但是第二年又走

上凡是泛非主义的事一律加以反对的道路，提出要使巴罗策兰从北罗得西亚分离出去，并为此而斗争。此后，他变了另一个人。

七 哈里·恩坎布拉作为领导人

我在1944年第一次遇见恩坎布拉先生。我们同坐一辆卡车从卡皮里姆波希到席瓦恩甘杜去。我清清楚楚记得他，那是因为：在姆皮卡公署，我们同行的乘客中有一个生了重病，可是司机似乎并不在意，而且事实上正准备把这个可怜的乘客丢下不管了，这时候，没想到恩坎布拉先生用非常激烈的口气对司机说话，指出：想尽方法使那个乘客得到照料，这正是他的责任。那时候的司机，特别是客车司机，事实上都是独断独行的国王。所以，任何人胆敢在国王自己的领地上向他挑战，需要很大的勇气。七年以后，我认出恩坎布拉先生，向他提起所做的这件好事，我记得纳布利亚托先生说：有些人记忆力真好。

我们有二十七个人出席这次会议。马卡萨和我代表钦萨利。恩坎布拉先生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反对联邦，他立即得到我们的赞同。同时，某种严重的拉票活动正在进行。戈登·钦但拉正在找遍一个个人，说：因为恩坎布拉头脑太热，如果他当选了，会把我们引入歧途的；又说：我们应该选姆比库西塔先生，让恩坎布拉先生当组织书记。我记得，我们当时怎样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来挫败我们认为是错误的选择，虽然我怀疑，恩坎布拉先生直到现在是否知道究竟是谁在暗中为他进行选举活动。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恩坎布拉先生得二十四票，刚离开教

师这个公家职位的萨费利·奇利西先生得三票，姆比库西塔得一票。这表明，连钦但拉都没有投他这位候选人的票，否则便是这位候选人忘了投他自己的票。

1952年2月，我们开了一个富于爆炸性的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我遇到一个把北罗得西亚认真地看作是他自己国家的北罗得西亚白种人。他是国民大会的正式党员，他不隐瞒这个事实。他直言不讳地反对联邦。我记得，听到他那些用很高的嗓音发表的演说，我是多么感动呵。我觉得他一点也不安全。在恩多拉建立一个反联邦委员会，也是他的政治活动。他和鲁本·奇坦迪卡·卡曼加、贾斯廷·钦巴和阿历克·奇丰达一起，共同编辑一份非常激励人心的《自由通讯》，这使他受到更严厉的监视。我记得还有一件事：当恩坎布拉先生发表那么激动人心的演说来答复首席检察官的威胁时，我喊：“哈里万岁……处死卖国贼！”

在1952年2月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发生的另一件重要事情是，建立了最高行动委员会。这是一种模仿温斯顿·邱吉尔爵士的战时内阁的组织。执行委员会负责处理一般事务，而由最高行动委员会指导反联邦斗争。我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我们的第一次会议在2月27日举行。首席检察官对我们的计划反应非常激烈，发出了一个又一个威胁。结果是，最高行动委员会发出了一个由当时副总书记乔治·卡卢瓦签署的公开声明。声明说：

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高行动委员会在1952年2月27日在卢萨卡举行会议后，主席向该大会的公开会议发出下列声明，经会议予以批准：

“最高行动委员会希望公众注意首席检察官通过立法会议的两个非洲人委员以下列措词转达给国民大会的一个警告：我警告你们，政府将断然行使其权力，以对付你们开会策划的、包括总罢工在内的一切骚乱。”

当立法会议的非洲人委员提出抗议，说强制建立联邦是造成紧张的原因，首席检察官说：政府是好是坏，这没有关系，它在这个地方统治，所以它就要这样统治下去。

声明接着说，国民大会无意采取骚乱的行为，又说：国民大会的抗议行动，是“由于联合王国政府和北罗得西亚政府对非洲人全体一致反对”联邦一事，“拒绝给予任何注意”而不得不采取的。

会议结束了，但是首席检察官的威胁并不使气氛有所改善。我们愤慨极了，几乎所有的代表都买了红领带，表示我们准备为我们的国家而牺牲。我们大家回去把会议通过的重要决议向我们的支部汇报，决议中有一项是派遣一个强有力的代表团到英国去抗议建立联邦。这个代表团由恩坎布拉先生率领，成员中包括最高酋长奇蒂穆库卢、大酋长穆索科特瓦尼、纳布利亚托先生和已故的L·C·卡蒂伦古先生。全国热情高涨。高级文官们在募集经费的公众集会上讲话。全国各地立即成立募款委员会。运动进行顺利，我们的代表团出发了。募集了几千英镑；现在回顾起来，我们大家都清楚，我们没有确保全部款子都交到国民大会的机构，因此，我们一定丢失了几千英镑。这个困难正是包括我自己的党在内的许多政党

都面临的，去年开始发生骚乱时，我们对这问题作了认真的研究。我们现在已经聘到一个登记执业的会计师帮助我们制订管理募款的方法。

在国内，我们所有的公开集会的议项目，现在都把我们的反联邦斗争包括在内。我们幸而有恩坎布拉先生和黑斯廷斯·K·班达博士在伦敦所准备的文件，当时他们是好朋友。这个文件很详细，对所有我们拿到副本的人都大有帮助，而事实上，它在后期用小册子形式重印过。现在把它全文转载（见 157—166 页），以驳斥那些人一再说我们没有充分理由拒不接受联邦。我们拒绝的大部分根据，在今天也仍然是强有力的。

就这样，伟大的运动发展着。我们刚接到出席最高行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书，我们国民大会那个白人党员被捕的消息传来了。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沮丧的时刻。我们的前任主席姆比库西塔先生对这个人——他从前的党员西蒙·伯·朱卡斯，为控告提供了证据。我不知道罪名是什么，但西蒙·朱卡斯被驱逐出境到英国去了。我很高兴，他现在幸福地结了婚并定居下来。他在从事一个很好的职业，经营一家建筑公司，我的确希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将能从他的经验得到益处。作为一件有趣的事，我可以在这里补充说：我们的一个白人支持者，在卢安席亚的一个会议上问我，如果我们的白人或棕色人支持者或联合民族独立党党员，有些人被联邦政府驱逐出境，我们将怎么办。我回答说：驱逐出境只是暂时的，我们不久就会把他们作为英雄迎接回来。

我们的最高行动委员会 1952 年 4 月在布罗肯希尔

举行的那次会议，决不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有几个党员没有出席。也许我应在这里提到，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发出了我在本书其他地方说起的那一封我们写给卢布瓦的传教士们的怒不可遏的信。这当儿，我的一个朋友（我以前从他那里接办过卢布瓦职业学校，他当时负责卡萨马高级学校）对我们正在组织卡萨马非洲人福利协会（他们后来把它改组为卡萨马非洲人学会）的几个人建议说：如果他们邀请我到他们的一次会上讲联邦问题，那倒是一个好主意。这个人是亨利·契布塔先生，现任姆皮卡的助理督学。然而这没有成为事实，因为正当他们设法和我联系的时候，在卢萨卡召开了酋长和人民的会议。这是一件大事。在伦敦的代表团寄了报告回来。这是一个十分振奋人心的时刻。酋长们和他们的人民融洽无间，团结一致地反对联邦。

北罗得西亚政府容忍不了这一切。这次会议的记录簿里写着这段记录：

酋长们和土著事务秘书的会见：土著事务秘书通过卢萨卡区专员，派来两个通讯员，要求非洲人国民大会容许酋长们在1952年8月23日会见他。酋长们讨论了这个邀请，他们接受了。

8月24日下午三时，酋长们会见了土著事务秘书。当时的经过情形没有写全面的报告，但土著事务秘书会见酋长时说了下面这些话：

1. 你们酋长不得把你们的权力交给非洲人国民大会。国民大会正在企图夺取你们的酋长职位。
2. 你们不得捐款给国民大会，因为它只用捐款

买汽车,你们不会看到它为你们做任何别的事情。

3. 某酋长拒绝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合作;他确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酋长。

酋长们对土著事务秘书的答复:好几个酋长以下列方式评论了土著事务秘书的几点意见,作为答复:

1. 如果国民大会接管我们的酋长职位,那也是一样,因为国民大会的全部职员都是我们自己的子民,仍然是非洲人当酋长。但这不是国民大会的意图。

2. 即使国民大会用我们的捐款买汽车,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政府也用我们付的税款买汽车,但我们税已缴掉,不用操心了。

3. 那唯一对国民大会击败联邦的努力不感兴趣的酋长,他的国家并不包括在联邦计划之内,他当然用不到担心。

从此以后,北罗得西亚政府采取了顽固不化的立场。它使用它全部的权力,对表示支持民族主义者的酋长,一律给予非常严厉的处置。“分而治之”的政策从未表现得更为明目张胆的了。从这时起,全面发动了对国民大会男女党员的迫害和控告运动,象我在下文所写到的那样,若干可怕的事情,在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名义下干了出来。

八 北方省的组织书记

就在这次会议之后，我被任命为北方省的组织书记。那时候，北方省包括今天的卢瓦普拉省。换言之，我承担在下列地区组织我们人民的责任：从塞仑杰区和姆皮卡区的边界到北面坦噶尼喀边界；从尼亚萨兰边界到西面当时比属刚果的边界。这全部工作要靠骑自行车进行。它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我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是一个最好的锻炼场所。后来，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书记和作为被禁止的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以及现在作为联合民族独立党的主席，我仍然能吸取当时我做第一线组织工作的亲身经验。

在这项非常艰难的工作中，我从许多源泉得到很多的帮助。有我早年阅读亚伯拉罕·林肯传记所得到的鼓舞；有阿瑟·米的《对青少年的讲话》。应该感谢我们的朋友和同事兰伯伊·帕但尔，他那时为我们找来了许多关于印度独立斗争的著作。就在我第一次巡回时，我读到一本有益的书，它以后从未离开过我的书架，我每次出巡总是把它带在身边；那本书是拉尔夫·沃尔多·特赖因的《与上帝协调》。我的家庭对我帮助也很大。他们对我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毫无怨言。事实上，我每次外出要整整三个月，回到家里满脸胡子。我始终在走动，结果，我一封信也没写回家去。虽然她们不发怨言，但她

们——我的母亲、姐姐和我的妻子——确曾互相议论我的行动。她们怀疑我是否不过在躲避农场的职责。这种对我小心隐瞒了一些时候的“密谋”，现在我们家里想起了就会大家哄堂大笑。

要写下我在跑遍北方省的那十二个月中的经历，需要另写一本书，所以只好等到以后再说了。但现在既然有许多关于我和一头狮子遭遇的传说，我想我应当用我自己的话在这里讲一讲。在过去那年代，并不禁止教师在国民大会担任职务，所以我在门杜初级中学停留，我的同班老同学阿松·查尔斯·布瓦尔亚在那里当校长，他也是支部主席。当天晚上，我在一个会上讲话。第二天早晨，我出发到伊索卡公署去，预定晚上在一个公众集会上讲话。我心里忧虑重重，是一种担心会发生什么祸事的心情。我赶了大约五哩路，这时有什么东西飞快地从我旁边过去，因为我的心情本来就已在战战兢兢的状态之中，所以差一点从自行车上跌下来，却只看见一个微笑的青年在我的面前。原来是布瓦尔亚先生派他送来我忘在他学校里的我的一双笨重的长统靴子。那以后，我竭力强制自己驱除这种恐惧心理，心里想，全是无中生有；但是预感的压力仍然留在我内心深处。当我慢慢地踏我的自行车时，我听到我左边有一种什么声音，接着，就在我前面大约五呎的地方，一条大蜥蜴以我见所未见的蜥蜴爬行速度冲过去，一条大蛇紧跟在它尾巴后面。我把车牢牢刹住，扔下车子，但是这动作刚刚完成，那两个东西已经踪影全无了。我开始前进，与其说是踏车子，不如说硬在把自己拉扯过去。我从这地方前进了哩把路光景，开始上

山。更糟的是，沙子实在太多，没法骑车子，而刚转了个弯，我看见距离大约一百码的地方有一只象大猴子的野兽。它从路的北面跳到路上，显然没有看见我。这时想来已是上午十一点钟光景了。这家伙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接着就走到路的中间。它迅速地向前后两个方向瞥了一眼，它看到了我，我立刻看清楚，我的四脚朋友不是猴子，却是一头狮子。使我非常惊奇的是，那种一直纠缠着我的恐惧心理，一下子变成了力量和勇敢的感觉。我向它前进，这野兽紧紧地盯住我望着。我停下时，离它大约二十码光景。它纹丝不动地继续盯着我。我揪车铃，叫喊，但它仍然一动不动地站着，盯住我望。它是纯棕色的，颈毛清楚地表明它是只大狮子。我拿起打气筒，几乎敲遍了自行车的每一个部位，然而，我只看见那畜牲连眼睛都没眨一眨。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可是突然之间，象要渡过一条没有桥梁的溪水那样，我把我装得满满的车子举了起来，双手抓住车子在我头上挥舞。这叫那百兽之王吃不消了；它一跳，快得象它来时一样，一下子就不见了踪影。我把车子放下来，向前步行，一离开路的多沙部分，就又骑上车子，及时赶上我的伊索卡会议。

如此这般，我跑遍了北方省，会见酋长、村庄的头人、教师、商贩、种田人、小职员和一般公众。凡是做得到的地方，我就建立起国民大会的支部。1953年8月，我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书记，迁居到卢萨卡。

九 非洲人国民大会总书记

1953 年间,我们继续进行反对联邦的战斗,4 月里发给女王一份由一百二十个酋长签名的请愿书。为了谋求她的干预,我们写道:

我们需要您的保护,这个国家还没成立一个使我们感到安全的政府。……我们明白,欧洲人正在试图把我们纳入象我们在南罗得西亚和南非的非洲人兄弟所处的那种统治之下;把我们永远束缚在廉价劳动者的地位上,毫无改进的希望。我们不能为我们的百姓接受这种地位。……

我们给这份请愿书加了一个附注,说明巴罗策最高酋长并不赞成成立联邦,但如巴罗策兰的保护地地位获得保证的话,则同意对强制成立联邦不作反抗。

把这份请愿书作为附件,我们写信给下议院议长和上议院议长,指出:在请愿书的签名人中,有原先把我们的领土托付给联合王国政府的那些酋长的法定继任人。我们要他们注意下列事实,即:已经宣布赞成成立联邦的南罗得西亚,在它所实行的选举权中,为数十二万八千的白人,在选民登记簿上拥有将近四万九千名选民,而近二百万的非洲人在选民登记簿上却仅有四百二十九名选民。同样,在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它们的问题在后面提到)的立法会议里,在分别具有二十三名和十八名的委

员中，各只有两名非洲人。这些非洲人委员都投票并发表讲话强烈反对这种体制。我们接着宣布：强制成立联邦违背联合国宪章，特别是该宪章第七十三条，我们要求列席下议院的会议作证或在上下两院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上申述意见。

人人知道，我们的呼吁未被听取，而选举联邦议会的时间却到了。在我 1953 年 10 月 13 日发表的新闻公报中，我说：

在中非，违反约六百万非洲人的明确愿望，支持一小撮反动白人移民，强行作出了对宪法的重大修改。这种强制之所以得逞，不过因为帝国主义者依靠英国军队的武力，他们正在凶残地使用这支武力来镇压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愿望。不，他们没有解决问题。他们不过设法把中非不可避免的种族斗争搁置起来。严重的纠纷势将发生。强制成立联邦，已使这种纠纷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势所必然。

但是我们仍然决定对选举进行合作。在这同一个公报中，我写道：

如果我们非洲人决心继续为反对人类不平而战斗的话，我们把我们的民族运动跟外国已有的议会制度联系起来，是明智的。我们必须努力做到，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议会机构，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使我们的民族愿望更为坚定。

我们担心，如果非洲人的各种组织抵制选举，那么联邦议会也许会在成立联邦以后修改宪法，以便各个地区的总督得以任命非洲人走狗。因此，我们决不是被强制成

立联邦所挫败，而是号召国民大会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这时，我对支部工作人员发出定期通报，我在通报中尽力鼓励我们的人民投入今后必然要遇到的长期斗争。

但是，在许多时候，我们的斗争被人误解，我们的行动被人歪曲，这使人非常痛心，而且常常引起骚乱，例如在格温贝山谷、卢瓦普拉和北方省所发生的，在那里，国民大会被指责为煽起由于其他原因而发生的纠纷。国民大会的组织工作者认为自己是老老实实为自由事业工作的人，是人民通过他们表达自己不满意见的工具。赞比亚的“普通人”在感到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没有可以向之申诉不平的议会议员。他发现，在移民来到这个国家所造成的改变的急流中，自己正在被冲走。他昔日的安全世界，正在周围土崩瓦解，他在惶惑中无处可以求助。国民大会把自己看作是非洲人可以通过它表达正当愿望的工具。

在另一方面，政府——体现在区专员和他手下的官员身上——则把“国民大会党员”看作是个捣乱分子，他们阻挠政府为改善人民（政府官员是被派来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的状况而进行的一切尝试。在间接统治制度之下，省行政机构（即是区专员们和区官员们，在我们中间被总称为省行政机构）是通过当地酋长及其土著管理当局贯彻工作的。因为非洲人没有选举权，非洲人国民大会不能成为政党，于是它被看作是一种专门制造纠纷的破坏性组织。中央政府不敢禁止这个组织，因为一禁止就会在海外引起大吵大嚷，所以他们竭力通过酋长和土著管理当局来对付它。总有一天，我要用我手头旧国民大会的档案材料写一本书，讲讲省行政机构在农村

地区所干的那些卑鄙无耻的事迹，他们是怎样利用酋长来打击国民大会的。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把关于格温贝山谷骚乱的报告全文附在书里(见附录四)。这是误解和压迫的骇人听闻的故事。那些本意良好的帝国主义者区专员所永远无法理解的是：非洲人是人民，不是可以被人赶到一起、任意加以驱使的牲口。当惶惑的农村人民并不立即做区专员们想要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做的全部事情时，区专员决定用土著管理当局法令来迫使他们顺从。我从我自己的经验知道：赞比亚人民是具有自己的偏见和恐惧的普通人类，但也具有才智和改善其地位的伟大愿望。用耐心和谅解，可以引导他们到较好的境地，到他们梦想的乐土；但是，如果你试要以超过他们所想要的速度，硬把他们推上去，那他们就会反抗。

我绝不责备区专员个人。我知道区专员中有许多是好人，有几个我视为朋友；但他们不得不贯彻这样一种制度，他们本来有责任以爱护之心来引导人民，但这种制度却把他们置于与人民对立的地位。例如，在强制成立联邦的时候，区专员和区官员们都得跑遍全区，劝说人民赞成。有几个区专员告诉我，他们是很不愿意地做这事的。如果一个人要做人民的朋友，把他们引向较好的状态，那他必须懂得他们的语言；但是，中央政府调动地方官员的记录是惊人的，它把省里的官员从一种语言的地区调到另一种语言的地区，从来不给他们领导和指引的时间。例如，1961年发生过最严重骚乱的钦萨利区，十年之内，区专员和区官员就调动了十九个之多。

一〇 挫折时期

在 1954 年,我认识到:如果国民大会要维护团结,那就必须作某种建设性的思考。人们在说:现在联邦已经是既成事实,我们再也没法搞垮它,所以我们没有理由继续进行斗争了。

我们决定起草一个五年计划,因此我发出了一份通知,在通知中我说:在过去三年中,我们进行了激烈的反对联邦的斗争。联邦的唯一好处是使我们大家团结起来,现在人民必须明白,尽管联邦已经强加在我们身上,但是使非洲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前进的民族运动,必须继续进行下去。过去,我们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反对联邦的斗争。以后怎么办呢?我们的五年发展计划将从 1955 年 9 月 1 日正式开始。我在通知结束时,请求大家给予支持并提供意见。

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我们发现,尽管我们居住在一个叫做中非联邦的国家里,但是我们非洲人的行动却受到限制。当哈里·恩坎布拉和我到索尔兹伯里参加代表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的四个非洲人联邦议员的会议时,在飞机场上,我们每人拿到了一份驱逐令。我们被叫做“土著外国人”。既然你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土著居民,怎么你又是一个外国人呢?当我写本书的时候,我还保留着这份驱逐令。它的标题是:

根据外国人驱逐条例第六十一章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将一个土著外国人驱逐出南罗得西亚殖民地的命令。

下面是这样写的：

肯尼思·戴维·卡翁达

鉴于我认为：你，一个外国人，不应逗留在南罗得西亚殖民地的疆域之内，这是有利于公众利益的。

因此，根据外国人驱逐条例（第六十一章）赋予我的权力，我兹命令，你必须在收到本命令一小时内，离开上述殖民地。

政府行政官员 R·C·特雷戈尔德。

1954年8月20日于索尔兹伯里。

把恩坎布拉先生驱逐出南罗得西亚的命令，发出的日期远在1953年3月。我的驱逐令仅仅是四天前即1954年8月20日发出的。但是恩坎布拉先生去年7月就来到索尔兹伯里，一直没有被捕，这在我们看来是很奇怪的。

关于这件事，我们感到很愤慨；我在下一个通知中作了如下的评论：“谁都是这样猜测，那时候他们所以不碰恩坎布拉先生，主要的原因就是还没有强制成立联邦，但是现在联邦成立了，他们还怕什么呢？”

北罗得西亚的欧洲人报纸经常提到排外的黑人民族主义的破坏力。但是，在1954年9月，就在我用激烈的文字撰写有关联邦的文章的同时，我正在为国民大会起草一份在北罗得西亚创办一所多种族学院的计划。当在七年之后我写本书的时候，第一所非种族成人教育学院正在兴建之中。

随着一年一年过去，我又陆续起草了一些决议，寄给

土著事务秘书，并继续努力改进我们的组织。在我做国民大会总书记的工作中，长时期来，我意识到需要有一份我们自己的报纸。在1953年底，全国执行委员会决定，办一份报纸既有助于国民大会的宣传工作，又可以作为收入的一个来源。一个由泰特斯·穆库普、W·K·赛卡卢比和我组成的编辑部成立了。当然，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资金。我们走遍了卢萨卡的所有印刷厂，但是，他们估计印刷一份报纸所需的资金远远超过我们的财力。我们决定出版一份用复写机复印的月报——《国民大会新闻》第一期在1953年10月亏本出版。

在11月出版第二期后不久，主席恩坎布拉先生和我因印刷未经登记的报纸而被捕。然而刑事调查总局不知道我们曾经写信给邮政总长，他答复说：因为报纸是复写的，而不是印刷的，所以他不能登记。我们这样解释以后就被释放了，但是在未得到“进一步通知”以前，我们的报纸被禁止出版。直到我们通过几个友好的议员对殖民大臣施加压力以后，当局才勉强发出了这个“进一步的通知”。

我们经常发表新闻公报，它们不一定引起很大注意。因为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有关分裂北罗得西亚的可能性的议论正在继续，我认为下面这件事值得记一下，就是：早在1954年，我就说明将非洲人和白种人分别成立国家的范·伊登计划显然是行不通的，我把这作为根据，提出我反对任何形式的分离的理由。

将各种肤色的男人和女人保持在一个整体内，这仍然是可能的，这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地方的男人和女人正在为它进行斗争的一个原则，如果接受范·伊登的分治

计划，这将意味着这一原则的完全失败。所以我们极力与范·伊登计划进行斗争，我高兴地指出，这一计划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支持。

1955年初，我第一次被关进监狱。使我被捕入狱的一些事件，是值得一提的，因为这些事件表明，当局正在搜寻我们在各省的组织者，还决心要把我们总部的一些人关进监狱。当他们发现我们办公室内放有一些违禁书籍的时候，他们找到了这个机会。

有几个月，我们从伦敦一个议员那里收到了几份《非洲和殖民世界》杂志。编辑部要求把我们写的关于格温贝骚乱事件的报告刊登在这份杂志上，当然，我们同意了。不幸，后来成为我的好朋友的《中非邮报》编辑弗兰克·巴顿看到了这本杂志，他大事宣传，结果这杂志就成了“违禁出版物”。我写信给那个英国议员，问他，我们应该怎样处理这期杂志，因为我们收到了许多本预备分发的。他回答说：我们应该将它们送到南罗得西亚去，因为在那里这一刊物没有遭到禁止。我认识到这些杂志必须处理，于是我就将它们捆在一起，放在办公室的一个架子上。我在这捆杂志上潦草地写了几句话，说明应该将这些杂志送到南罗得西亚去，或者送到卢萨卡区专员那里去处理，后来我就将它忘了。1955年1月6日，我从一次长途旅行回来不久，我在床上被妻子叫醒，她说有两个欧洲人要见我。我以为他们是新闻记者，所以就起来，穿上短裤和汗衫，走了出去，一个欧洲人要我走到他的汽车那里去。当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他说：“肯尼思，我们要你到你的办公室去。”

他拿着一张蓝色的纸，说：他有一张搜查我房屋的搜查证，但是首先我们必须到办公室去。

在办公室，一个白人将那张蓝纸上写的字读给我听，大意是说他有权进行搜查。他问我的意见，我说我不反对。副司库赛卡卢比也在那里。我们走了进去，搜查就开始。其中一个白人走到放那捆杂志的地方，发现了它，他的样子看来很满意。接着，搜查了我的桌子，发现了一个写给 G·卡卢瓦先生的大信封，就把它放进了一个欧洲人的小提箱里。在此之前，我所属组织的主席恩坎布拉先生，由另外一个白人陪同，来到办公室，他问我那捆杂志是否还在那里。我说：“在；不幸，我没有能够把它们处理掉。”

恩坎布拉先生和我被判处服劳役并监禁两个月。

从国民大会的活动来看，1955年是不如意的一年。我花了很多时间从事组织工作，但是要维持我们各支部的热情是困难的。我们一些省的组织工作者因各种不同的罪名被捕入狱。为了发展我们的党员，我努力说明参加我们运动的理由，发出了下列通知：

你现在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将有助于：

为争取获得选举权而斗争；

为反对在公共场所例如邮局、旅馆、休息室、饮食店、戏院、公园、运动场和许多其他地方的种族歧视而进行斗争；

为保证非洲人不受现在盛行的警察暴行和非法逮捕而进行斗争；

为争取非洲人在本保护地和联邦的行政机构

中,在军队和警察中,按照用人唯才而不是按照肤色获得较高职位而进行斗争;

为争取我们的酋长按照我们 1952 年 8 月会议所声明的办法,在津贴方面得到较好待遇,争取政府官员停止对酋长及其土著管理当局雇员进行一切威胁和虐待而进行斗争;

为争取更多更好的教育和卫生设施,争取非洲人在城市、农村获得自由的经济的发展而进行斗争;

为反对联邦制订一项共同的土著政策而斗争;

为反对联邦这个可怕的魔鬼最后成为中非自治领而斗争,换言之,也就是在我们能够完全参与处理本保护地事务之前,为争取保持在殖民部直接管理下的保护地地位而斗争;

总而言之,所有以上各点,都是为争取自卫,而不是由别人来保护!

我们再向你再说一遍,你现在就参加,今天就报名,成为这一民族运动的一个成员。如果你参加的话,你就为具有约一百零五个酋长、五百个土著管理当局雇员、三千个村庄头人和三万七千个男人、女人和儿童的组织增加一个成员。你成为一个党员,只要交很少的钱:

女士 入党费六便士,每年党费一先令六便士

男子 入党费一先令六便士,每年党费二先令六便士

学生和儿童 入党费三便士,每年党费一先令

但是你可以尽量多交钱!

在这一年，政府增加了压力，立法会议上提出了一项修改治安条例的议案。我们在卡布瓦塔举行了两次反对这一条例的大会。第一次是在这一条例尚未成为法律时举行的，显然，当局已开始重视我们在这些大会上所讲的话，因为有六个白人由一名福利官员率领参加了大会。第二次大会有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参加。当然，随着一年一年过去，我们组织的力量增强，警察常常参加我们的露天大会，并把我们的讲话录音。

但是在那个时候，在我们的会议上出现警察这种事并不引起我们最大的关心。所有的报纸和电台都集中诋毁我们。一个很小的事件可以证明。在分发给报纸和所有非洲人阅览室的“非洲新闻社”所发的第一一八号政府公报中，说有一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知名党员，由于在钦萨利的一个仓库放火，已在北方省被捕入狱，判了四年徒刑。事实上，这个名叫科萨姆·姆万巴的人从来不是国民大会的党员。在我发出的一份通知中，我揭露了这一有意诋毁我们的企图，并说我们憎恨暴力，认为这是没有好处的。

政府不喜欢我们所讲的事情，但是又不敢完全禁止我们讲话，所以他们采用了他们惯用的通过酋长进行干涉的方法。例如在班巴族各酋长组成的伊拉姆法亚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动议，要非洲人政治家在任何酋长的管辖范围内举行会议之前，必须首先得到该酋长的准许。参加会议的一些政府官员发言支持这一动议，但是这一动议遭到重大的失败。

班巴族的许多代表反对这一动议，其理由是：欧洲人

政治家在这一殖民地的任何地方举行会议，都不需要取得政府的批准。我从一个非常可靠的方面获悉，在卢班巴族各酋长的最高级会议——伊拉姆法亚会议上提的这个动议，是由区专员亲自说服一个酋长提出来的。这个酋长曾两次拒绝在伊拉姆法亚会议上提出这一动议，只是在第三次他才勉强同意了。

或许由于国民大会日益得到各界非洲人群众的支持，政府被激怒了，说不定还有些吃惊。当时我讲：

我们要提醒当权的人们：当人民懂得一项事业，准备为这一事业忍苦受难，并认为这种苦难是光荣的时候，要镇压他们或损害他们所拥护的事业，实在是完全不可能的。越来越多的非洲人认为国民大会的奋斗事业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就加入这个组织。由于这一原因，我们对政府最好的新年忠告是：消灭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好方法，并不是用暴力加以禁止，而是尽一切可能设法消除构成国民大会的政纲的东西，可做的事是很多的，因为大部分种族冲突难道不是由种族歧视所引起的吗？这种种族歧视不是在受害者的心中引起灰心和混乱吗？非洲人一旦团结起来，象一个人那样讲话和行动，可以取得一些好的结果，这一点他们难道还不懂吗？非洲人和其他任何人种一样，决不允许谁用肤色作为歧视他们的根据。他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在他们出生的国家里，把他们当三等或四等公民看待。

我们希望政府注意这一重要事实，就是：一旦他们禁止国民大会，他们只能把非洲人民族主义运动赶入地下；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知道，在任何地方，对任何

人来说，地下运动都不是愉快的运动。我们真诚地希望和请求：当权的人们，不要在这一多民族社会中为了一部分人取得暂时的满足，而滥用自己的特权地位。

在 1955 年，我们本来已经几乎放弃了从自由党的白人那里得到鼓励的希望，却高兴地发现了代表卢萨卡的联邦议会议员斯科特博士，他支持与我們相同的事业。在我的一份国民大会的通知里，我把他的讲话放在非常突出的地位，并着重指出：斯科特博士在议会内外，推动中非各政府对土著人民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他的要求被搁置不理，而且相反地，特权阶级和立法议员们提出越来越多的压迫人民的法律，企图制止土著人民要求取得他们正当的权利。我指出，我们正忍耐着，并再一次要求特权阶级的领导人“在我们的人民忍无可忍之前”采取行动，来改正“以肤色为理由对我们所犯的错误”。

1956 年，我们非洲人国民大会认真着手拟订一种我们认为适用于我们国家的宪法。鉴于赞比亚反对伦诺克斯·博伊德硬塞给我们的 1958 年宪法，因此必须将我们自己的建议详细讲明白，这些建议见本书附录三。

在一个“关于联邦政府不为非洲人设立高等学校和北罗得西亚政府不为非洲人设立中等学校的备忘录”中，我们也提出了修改联邦宪法的建议。我们在这一备忘录中指出，联邦政府减少了过去为非洲人出国接受高等教育而规定的奖学金和助学金的数目；我们还指出，非洲人希望，他们的高等教育问题不应再是联邦立法机关的讨论事项，而应改由地区政府办理。乌干达有二百多个非洲人在联合王国进修大学课程，而北罗得西亚大约只有

十个人在那里求学。当你将这两个国家的收入情况加以比较以后,对于这一点你就会特别感到意外。

我们继续申诉说,计划对欧洲人学生和非洲人学生分别设置宿舍,是不合罗得西亚大学的多民族性质的。此外,一些南非人被任命为大学的职员,但是却没有任命一个非洲人。

关于为大学准备考生的问题,我们强调了扩大和发展中学的必要性。还没有一所非洲人女子中学,看来大学中将好多年没有非洲人女学生。唯一的一所初级女子中学是奇彭比的教会办的。事实上,北罗得西亚的女子教育非常被忽视,以致医院中的非洲人护士和受训者几乎全部来自南罗得西亚。

就技术教育和技术训练而论,进展是如此缓慢,非洲人发现,很难利用已经同意的计划来发展采矿业和其他各种工业。备忘录最后指出:“如果北罗得西亚政府心里真有伙伴精神这个原则的话,那就必须给非洲人享有和欧洲人同样的得到技术教育和技术训练的机会,并达到同样的标准。在北罗得西亚的任何工业中,都没有吸收非洲人当学徒的计划。在学徒条例的条款中,非洲人是被清清楚楚地排斥在外的(见北罗得西亚法律一八七章第三条二(a)项)。对人民取得更多选举权来说,关系非常重要的成人普及教育,由于政府的不支持和缺乏热情,已经不复存在了。”

一一 非洲人的意见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南北罗得西亚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急需关心的问题。大的河流在发电和灌溉方面的充分利用，是非常重要的。

在北罗得西亚，大多数人拥护的计划是：在卡富韦河与赞比西河汇合处不远的地方利用该河，建造水电站发电，使该河上游的广大肥沃土地得以灌溉。在南罗得西亚，计划是利用赞比西河流经的卡里巴峡。

当联邦的问题开始被认真考虑时，北罗得西亚政府已经在卡富韦计划的准备工作（例如修建一条通向水电站的公路）上，花费了纳税人的大量税金。大家认为，当时的南罗得西亚总理戈弗雷·哈金斯爵士已经提供保证，决不使接受联邦制妨碍大家指望对北罗得西亚会有极大好处的卡富韦计划。

可是，后来请来了中立的法国专家，他们提出了一个更加野心勃勃、花钱多得多的卡里巴计划，关于卡富韦的事就几乎不再听说了。在当地情况下，这可能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决定，但是那时，在北罗得西亚却引起了极大的敌对情绪。卢萨卡的商人尤其反对。

1955年11月17日，恩坎布拉先生按照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代表赞比西河流域因让出土地给卡里巴峡水电计划而正在被夺去土地的人民，向英国女王送

去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中指出：在赞比西河北岸北罗得西亚境内卡里巴峡上游二百哩以内的地区，全部土地不是土著保留地，就是土著托管地，都是划出“专供北罗得西亚土著直接、间接使用和取得收益”的。请愿书要求女王训令殖民事务国务大臣充分考虑生活在女王陛下庇护下的赞比西河流域人民的安全和福利。殖民事务国务大臣必须决定，例如，人民被夺去土地是否合理，卡里巴计划是否对北罗得西亚土著有利。请愿书中还提到要付给失去住处的二万九千名北罗得西亚人和一万四千名南罗得西亚人的赔偿金问题，并建议建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和解决所引起的各种问题。象现在大家所知道的，卡里巴计划很快就被执行，结果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湖，使水坝上游千千万万非洲人居住了许多世代的地区完全淹没在水中。

北罗得西亚非洲人对卡里巴计划的意见完全被忽视，即使在较小的范围内也不能被人们适当地了解。在城市地区，意见是应该由市咨询委员会提出的。咨询委员会内的非洲人代表按选区制选出，委员会并由当地的区专员担任主席。这些咨询委员会并没有行政职能。咨询委员会每月举行一次会议，讨论有关地方公益事宜、不满意见和申诉等预先规定的议项目。然后区专员如果认为适宜，就采取他认为必要的行动，或作出他认为必要的表示。他是咨询委员会的唯一代言人。

对于减轻本保护地内大批非洲人消费者的痛苦，咨询委员会被证明是不起作用的，唯一准备为非洲人消费者的利益而进行严肃斗争的团体是国民大会。1953年，

我们国民大会开始发动一场战斗，抗议在邮局和商店内推行种族隔离制度。我们不管一切禁止的布告，大批拥入商店和邮局，不久就强迫废止了这一种族隔离制。

在北罗得西亚东部卡萨马有一个商人，他在这一地区开设许多联号商店。我们收到许多控诉他对待非洲人消费者的意见。据说他们受到威胁、虐待和侮辱。据说他有一次使一个非洲人遭到死亡。国民大会组织了不买他的货物的抵制运动，这一运动进行得非常有效，使这个商人支撑了几个月之后，就将他的商店出盘了。他的接手人比较讲理，大家就讲和了，没有再发生麻烦。但是我们国民大会的组织者马卡萨，却由于组织这一次抵制运动而被关进监狱达十八个月。1956年最突出的事件是：在北罗得西亚大部分城镇发动了抵制运动。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在开始行动之前，国民大会先写信给当地商会，提出不满控诉，并要求召开一次讨论这些控诉和找出改善办法的会议。在每次事件中，商会的答复总是：商会不准备和国民大会或它的领袖会谈，但是如果确有不满意事项的话，可以由当地城市咨询委员会处理。我们的答复是拒绝接受这一主张，接着发生的抵制运动，对非洲人消费者来说，几乎总是一样有效的。在钦戈拉，当发动了一次抵制运动以后，当地商会同意和国民大会的地方支部会谈。会议举行了，抵制运动就立刻停止。我们知道，完全由欧洲的和亚洲的商人组成的商会拒绝承认国民大会或和国民大会会谈，是按照北罗得西亚政府的指示行事的。

欧洲和亚洲商人的团体，对于这些抵制运动并不是

置之不理的。他们向政府提出控诉，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对付抵制的人。例如，在卡萨马事件中，我们有三、四个党员被判犯有阴谋叛乱罪，处以长期徒刑，关进监狱。在其他大多数地方的抵制事件中，个别纠察员或特别热心推进抵制运动的人，都被加上犯有殴打暴行或威胁恐吓等罪名而被关进监狱。

1956年5月，在铜带区的木富利腊，事情达到了高潮。5月23日，国民大会的地方委员会写信给商会，举出非洲人消费者感受到的一系列痛苦，要求商会和它会谈。商会复信拒绝和国民大会的地方委员会会谈，但表示愿意和当地的咨询委员会会谈。我们拒绝接受这一主张，于是一次就非洲人消费者来说效力达到百分之百的抵制运动，就在6月11日开始了。这一次，商业团体的抗议促使一个显然持反对态度的政府采取行动。它对地方委员会的两个领导成员以及西方省国民大会副主席和主席提出了阴谋叛乱的起诉。那第四个人是爱德华·蒙戈尼，他在卢萨卡被警察逮捕，他们把他和一个非洲人警察铐在一个手铐上，游街到火车站，由火车运送到恩多拉，在那里，他被用同样方式铐上手铐，并好几次游街示众。这种不必要的粗暴待遇，引起了，也必然要引起铜带区非洲人的极大愤怒。

这一次，我们决定进行斗争。我们聘请了索尔兹伯里律师界一个高级律师，这件事在7月3日和4日，由木富利腊的地方长官审讯。对王国政府来说，这个案件是一次有敌意的阴谋叛乱，因为广大的非洲人消费者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那些不满意度，是可以向木富利腊非洲

人咨询委员会提出，经过官方渠道来解决的。他们特别强调这一事实，即这一案件的前面三个被告，既是木富利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要负责人，又是该城城市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所以，他们说，商会拒绝和当地非洲人国民大会会谈，实际上并不是拒绝和这三个人会谈，因为商会是愿意按他们的咨询委员会委员的这一身份和他们会谈的。事情既是这样，他们就认为，抱怨非洲人国民大会被藐视，是没有根据的，所以发动抵制运动是具有敌意的。公诉人说，发动这场抵制运动，并不是为了依法保护木富利腊消费者的利益，而是为了发动一个运动来强迫政府承认非洲人国民大会。

公诉人方面的主要证人区专员和商会秘书，并不试图否认国民大会5月23日信中提出的不满事项的存在或其确实性。在抵制运动开始以后，价格检查员们到木富利腊去，那里的二十四个欧洲商人中有三个被判决犯有抬高价格或少给斤两的罪行。在肉店里，他们把肉包成标有固定价格的小包，要非洲人买主不看到或没有机会看到小包里面是什么东西就买。任何非洲人如果硬要先打开小包看看才买，就要受到毫不客气的对待。

我们的主要食物玉米，每袋四十磅重，对欧洲人买主可以免费送到家里，而非洲人则只能自己拿，虽然价格是一样的。商店不准非洲人走进店里，只能从街上铺面所开出的一个小窗洞里购买东西的这种窗口制度，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斗争，已在北罗得西亚大部分地方取消了，但是在木富利腊的一些地方仍旧存在。当受到对待非洲人买主非常粗暴的指责时，商会承认，它的许多低

级店员是态度粗暴的，但是却又有些天真地补充说，他们对欧洲人也同样是粗暴的。这样，不满的事项越积越多，区专员在盘问以后承认：全部控诉都是合理的，需要改正。

地方法官在判决中释放了所有的被告，并宣布：他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抵制买货的人，其行动是有充分理由的。他说：没有证据证明，这种抵制运动是为了强迫承认国民大会而组织的。有证据说明，抵制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消除非洲人消费者的不满。

国民大会主席 H·恩坎布拉先生和四个被告走出审判室时，大约有三百个非洲人群众热烈欢迎他们，毫无疑问，审讯的良好结果，使国民大会在北罗得西亚全体非洲人居民中大大提高了地位。这次诉讼得到这样的结果，人们认真地怀疑，北罗得西亚司法部门的起诉是否明智。司法部门知道，或者经过相当的调查以后能够知道，非洲人消费者的控诉是无法否认的和有力的；因此它应该知道，试图得到判罪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有关商业团体也许向它施加了巨大压力，但是它应该有力量和智慧来抵制这种压力。

这一事件突出地说明，在北罗得西亚，目前存在着危险的双重管辖问题。那里有联邦政府，它宣称奉行一种种族伙伴关系的政策。那里还有北罗得西亚政府，在它的下面有司法部门，这个司法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对木富利腊事件暴露出来的状况负责，显然还要对商会拒绝承认国民大会或和国民大会会谈的态度负责。

国民大会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直到目前为止仍受到残

酷剥削的非洲人的命运,或者通过谈判,或者在谈判失败时通过行动。用这种方式,特权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差别正在逐渐缩小;差别愈小,不同种族和平和融洽地生活在一起的机会就愈大。

非洲人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大的信心。当这种对自己的信心一天一天地在增长时,人民就会努力和他合作。每一个研究历史的人都承认和明白这一点。这种情况在印度、在缅甸、在加纳和在其他许多国家也都存在。凡是正确处理了这个问题的地方,在各种肤色的人种之间就会带来和平和融洽;凡是得不到正确处理的地方,就会对每一个人带来灾难。我们今天的局势要求有第一流的政治家才能。

北罗得西亚是一个具有种种根深蒂固的差别的国家,其所以根深蒂固,是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照种族隔离的方针谋划的,每一件事情不论在过去,在现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是按照这一方针进行的。现在一切纠纷的根源就在这里。这种据以谋划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种族隔离方针,在这里是非常清楚地被承认的,因为它采取种族政策,就不得不承认它是这样的。真正想把多种族问题处理好的人,难以认为有关各政府的掌权者们是在认真地对待种族问题的。

单单表示虔诚的希望,或坚持把我们叫做煽动闹事和自私自利的人,是没有用的。为了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是不是能够举出近来在其他国家发生的一些实际例子呢?在肯尼亚,肯雅塔和他的受到谩骂的助手们被勒令离开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并受到处罚,结果是——

那里就没有一个负责的非洲人民族运动的领袖可以作为谈判对手，于是可怕的和悲惨的遭遇就落到肯尼亚的头上。在乌干达，布干达国王被当作一个潜在的煽动者和闹事者而被放逐，因而造成的悲惨后果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在塞浦路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和他的同事们，由于有人坚决相信只要把他们弄走就会万事大吉而被放逐。我们举出这些例子，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在制订什么暴力计划。这些是必须非常仔细考查的事实。我们举出这些事实是由于坚定地相信，我们作为国家可以从我们的朋友的悲惨历史中得到教益。

现在，这些所谓非洲人反叛分子、煽动者和自封的领导人，在做些什么呢？这些即使经法庭证明为无罪，还是被送进监狱或被拘禁的人，是些什么人呢？这些牺牲幸福生活、愿遭枪杀的人是些什么人呢？明明知道有这些可怕的事情在等待着他，还会有什么个人的利益或乐趣吗？老实说，是没有的。然而这些人走上街头，告诉他们自己民族的人说：他们工资太少，他们生活在贫民窟，他们只有办得很糟的学校、办得很糟的医院；由于在安排他们命运的一些会议里没有他们的代表，他们在一切公共场所都受到歧视，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他们碰巧是黑皮肤而引起的。这些人告诉他们：除非他们能象白人一样地把自己组织起来，否则他们的处境就会永远象现在这样。非洲人看到，只有在将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并采取积极行动之后，他们才能引人注目。在政府同意改革以后，在皇家委员会调查了有关的争端以后，所有的决定和建议都由于白人移民的喊叫反对而被搁置了。非洲人领袖，由于和

不守信用的当权者进行谈判，而受到他们自己的追随者的责备。这些当权的人正在破坏将来一切谈判的机会。

我们现在谈谈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他们为什么象现在那样到处奔走组织他们的人民？”这一问题的答案是简单的。他们这样做，正和那些白人政治家和工会工作者一样，是为了保护自己人民的利益。

第三个问题，显然也是这一环境下最重要的问题是：“该怎么办？”过去，我们告诉有关的人们说：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于消除非洲人在工业、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痛苦；我们觉得再多说什么完全是浪费时间。

一二 访问联合王国

以后我会常常记着 1957 年这一年。我第一次访问联合王国就在那一年。我受工党邀请，参加一次社会主义者的会议。恩坎布拉先生和我于 5 月 26 日离开北罗得西亚去英国，次日到达伦敦。在我们访问的初期，我们参加了工党组织的在萨里郡多金市比阿特丽斯·韦伯大厦举行的联邦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二十六个国家的代表。他们中有些是代表象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加纳那样的独立国家；另一些是代表象尼日利亚那样的半独立国家，其余的是代表仍旧在外国控制之下的象北罗得西亚那样的国家。一般地说，所有的代表都是程度不同的相信社会主义理想的人。

我们利用我们的空余时间，使杰出的代表们如澳大利亚议会反对党(工党)领袖伊瓦特博士对我们的问题发生兴趣，讨论的结果常常是严厉谴责中非联邦。

会议以后，我们忙于向英国下院议员和对我们的问题有兴趣的各种人民团体发表讲话。我们请求约期会见殖民大臣，但是肯尼亚的制宪危机妨害了我们的安排，在我们能够会见殖民大臣以前，恩坎布拉先生不得不回国，把我留下来继续这一工作。

由于对合作运动和对地方政府的研究工作，需要的时间比我所能利用的要多，我决定简略地研究一下英国

的政治制度,重点放在“党的组织”方面。为了弄清是否有什么教训可以吸取,以改进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工作,我决定研究英国工党的组织。但是,应当记住,那时工党成立已五十多年了;它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工作,那里教育标准是高的,那里已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的政治上互相容忍,那里的居民是同一个种族的(这一点是为了在这里讨论而提到的)。最重要的是,工党并不负有其他任何政党所不负的法律义务;在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被认为是宇宙自然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气氛中,实行成人普选制。这跟北罗得西亚相差多么悬殊!

我继续进行下去,使我们的问题被大家所了解。我在不同的城镇的大大小的会议上发表演说。我和下院议员主要是工党议员、工会工作者、牧师、教授、新闻记者和其他许多有影响的人民团体谈话。大家表示很大的兴趣和同情。他们普遍的要求是:“请常常给我们通信,我们将尽我们的力量帮助你们。”总之,我发现英国公众对我们的问题愈来愈关心,在我回国时,我将我的想法,即在此后三年内在英国派驻一个我们自己的消息灵通的代表的想法,向国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这样做,这是很重要的。联邦政府那时正在罗得西亚议会用非常强烈的宣传来欺骗英国公众,使他们相信,联邦政府正在广泛宣传的经济情况,对联邦的全体居民都是有利的。他们把我们描写成不顾人类的价值、唯一的兴趣只在于取得政治权力的极端分子,所以我们是会把白种人赶到海里去的。这些方法虽然是恶劣的,但它们做到了在某些有影响的各界人士中引起许多恐怖。

我发现，用六个月时间要完全了解英国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制度，是来不及的。但是我发现，对“工党是如何进行工作的”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是非常令人神往的。在约翰·哈奇领导下的工党联邦部的帮助下，我到他们的一些暑期学校和周末学校听课。我还访问了一些地方组织，了解工作的实际情况。

我在英国逗留期间，生活不能过得应有的那么愉快，因为我始终肩负着在国内继续进行斗争的重任。我在英国遇到的对非洲有兴趣的人，是非常厚道、有礼貌和有同情心的，但是他们象我在罗得西亚的开明的欧洲朋友们一样，在政治上是幼稚得很的。他们决不会真正相信我所讲的关于我国农村人民遭受压迫的情况。当他们把我看作是一个温和的极端分子而渐渐忘掉我时，我从我们北方省和东方省的组织者那里，收到一些使我感到深为痛心的信。他们告诉我继续发生的侵犯权利和各种压迫情况。

当欧洲人问我 1961 年出现的情况是怎样时，我竭力将北方省长期遭受压迫的一些事例加以说明，但是我发现他们常常不相信我所讲的是事实。1957 年 8 月发生的事情使我非常担心，于是我就写信给掌管殖民事务国务大臣伦诺克斯·博伊德先生要求会见。我被告知说，我可以会见珀思勋爵，我们果然会见了。但是我发现他态度十分冷淡。他开始教训我需要忍耐，我想我们不是友好地结束会谈的，结果一无所获。

在我逗留英国的整个期间，国民大会代理书记泰特斯·穆库普不断地把国内所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他告诉

我，一些诚挚和善意的欧洲人组成了宪法党，这些人中，除了老一辈政治家斯科特博士以外，都不过是在玩弄政治游戏的。科林·莫里斯和梅尔芬·坦布尔就是在这个党派里第一次开始展翅起飞的。从那时候以来，他们已飞了一长段路了。当然，宪法党从来谈不上构成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挑战，1958年2月，这个党在成立后仅仅四个月时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上就决定不反对联邦，并开始分裂了。

我写信告诉泰特斯，产生一个反对党的时间还没有到来。“一旦我们有了选举权，那时我们就不必去管成立了多少昙花一现的党派。我们中的一些人那时已经完成了我们的职责，希望定居下来，过和平的种田生活。但是在那时以前，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保卫我们在民族团结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当我在英国时，我得到了到新德里大学读书的奖学金，我非常高兴地等待着接受它，但是国民大会里的情况变得危急起来。据说党纲将要改变，并将给予主席较多的权力，“非暴力”条款可能被修改。

我响应恩坎布拉先生打来的电报，飞回国去，到达时恰好国民大会在卢萨卡召开年会。不幸的是，报纸、杂志企图把我树立成恩坎布拉先生的对手，这引起了我非常难于消除的疑惧。那时我决定，国民大会在反对压迫的斗争中，必须在世界人民面前团结成一个统一阵线。

在1958年2月初，北罗得西亚总督阿瑟·本森爵士，在国民大会成立十年来第一次同意和我们的代表会晤，讨论拟议中的本领地新宪法。我们准备了我们的建

议，在恩坎布拉先生和我提出的文件中，我们强调了重大变革的必要性：

国民大会曾在七年中提出了一些建议供政府考虑，这些建议都被丢进了废纸篓。由于这样的处理，在非洲人领袖和他们的追随者中，确实引起了愤怒和失望。我们必须重复地说一遍，问题是要制订出一个计划，从而消除显著存在的种族怨恨和仇视状态。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对选举权的建议和我们在文件结束时提出的警告：

我们提出的选举权建议的基础是：接受一人一票的成人普选制。我们在前面几段中已经将我们的意见讲得很清楚，除规定年龄和精神是否健全以外，没有必要再规定选举权的资格，因为还要给少数种族集团设置保留席位，这样就会消除少数种族集团被非洲人压倒的危险。这是国民大会的建议，国民大会的建议就是北罗得西亚保护地非洲人的建议。

此外，我们还愿意这样警告当局：假使联合王国的英国政府和中非的欧洲移民想要在世界的一部分地区建立一个健全的多民族社会，那么，现在是这样做的时候了。和联邦选举制相类似的建议，和正在采用的用详细规定选举人资格来阻挠非洲人政治上健全和进步的做法，构成了对实现这种社会的严重威胁。现在提出的规定选举人资格的建议，将使数百万非洲人得不到选举权。当然，这些非洲人将组织起宣传运动来反对少数特权人物，这将在保护地内产生不稳定的气氛——一种必然要使现在的政府处于困境，并在少数

种族的心中产生疑惧心情的气氛。在这种局势下，谈论建立一个健全而正常的多民族社会，是毫无意义和完全有害的。

难怪这个国家处在混乱之中。“土著利益高于一切”是直到 1949 年为止英国保护地的政治指导方针。这句话解释起来的意思是：“……如果土著人民的利益与移民民族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应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1923 年“德文郡宣言”）。这对移民来说一直是一个极大的障碍，移民顽固地要实现把南北罗得西亚合并的野心，而另一方面，这种合并又为非洲人所激烈反对。1948 年，这一方针被所谓“伙伴关系”所代替，丝毫不考虑非洲人的意见。后来我们被告知说，这是北罗得西亚、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的新联邦的基石。

与韦伦斯基共同设计联邦的莫尔文勋爵，正和他的朋友一样，从来不隐瞒自己对非洲人的蔑视。作为联邦的第一任总理，他对这种“伙伴关系”是这样说的：“……这是和骑马人与马之间的关系相同的一种关系。”移民是骑马人，非洲人是马。1958 年 3 月，他报告上议院说：“在非洲人取得很大进步以前，他们都是些惯于欺诈说谎的人。”（见《北方新闻》，1958 年 3 月 26 日。）

英国政府在 1953 年强制成立联邦时，就是把把我们出卖给这些伪装为相信伙伴关系实则肆意鼓吹种族隔离的人。所以难怪我们发现，北罗得西亚的二十世纪的民主制度，是和自由民和武士享有特权，而农民、奴隶和外国人则被排除在外的古希腊不发达的民主制度完全相似的。当象这样的一些人掌握着政权时，他们发出好听的

宣言，用来欺骗世界人民相信他们是自由主义者，然而他们制订宪法，实际上使全部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必须承认，当恩坎布拉先生和我一起走上政府大厦台阶——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它的大门——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建议是这样温和，政府会发现是难以驳回的。没有多久我就发现，我是多么错误。这头英国狮子现在虽已老得掉了牙，可并不是一头人们可以温和地接近的野兽，除非你打算向它出卖你的人民。我记得本森总督问我说：“卡翁达先生，你是否认为，假使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欧洲人就会使政府陷于瘫痪？”我回答说：“总督阁下，你是否暗示，为了使我们的要求得到满足，我们就非处于使政府瘫痪的地位不可？”我的问题从来没有得到回答。

政府的建议宣布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震惊。恩坎布拉先生当众烧掉了写有政府建议的白皮书。建议中规定的选举权不比现行的联邦选举权多，甚至加上一些更加反动的措施。八个非洲人席位中，六个要根据农村地区的特种（低级）选区选民登记簿选举。每一个竞选这些农村地区席位的候选人，都必须得到他所在选区的三分之二酋长在证明他的候选人资格的证书上签字。此外，这些酋长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在总督正式指定的一个皇家代表在场的情况下签字证明他的候选人资格。我们大家知道，酋长都是由政府控制的。

这一宪法的最大弱点之一是：一个非洲人要参加竞选而获得十四个欧洲人席位中的任何一个席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很少几个非洲人能取得编入“普通选民登记簿”的资格，而另一方面，欧洲人党派却在非洲

人中找到走狗来投票选他们党的候选人。

在选举两个特别席位的成员时，候选人未能从酋长那里取得必要的证书。两个非洲人列入韦伦斯基联邦党的候选人名单由欧洲人投票当选。约翰·莫法特爵士的中非党得到两个席位，国民大会得到一个，还有一个是代表巴罗策兰的无党派非洲人的。

当政治欺骗实际上已经成风的时候，我们却再一次被告知，说我们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这是在韦伦斯基要求将联邦宣布为共和国之前不久的事。

一三 我和哈里·恩坎布拉决裂

非洲人国民大会历来声明：它是信仰非暴力的。随着岁月的消逝，我越发确信：唯一的办法是说服你的敌人接受你的思想方法，而不是用暴力去击败他们。在1957年7月30日致英国工党詹姆斯·约翰逊的信中，我说：

“我参加斗争现在刚超过六年。我的人民在政治上觉醒的速度是惊人的，我们已经看到目前的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被一个更激进的班子所代替的那种形势正在进展，后者可能认为目前我们推行的非暴力的办法是一种不够快的解除痛苦的办法。詹姆斯，我现在知道，对殖民地国家暴力活动负有责任的不是领袖们。过去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任何非洲人把非洲人国民大会目前的执行委员会称作是一个妥协的和温和到危险程度的委员会，但这是已经在发生的情况，我所要求英国政府的，只是帮助我们和平地解决这些事情，告诉他们：非洲人越来越反对民主机构里的人们，这是危险的。我但愿自己断断不是一个主张暴力的人，因为除了不值得这一事实以外，暴力只是使我们的人民被杀害。为人民而斗争，却让人民被杀害，这是什么意思呢？争得了那些权利而牺牲了一半人口，谁将得到好处呢？尽管我说的话是实情，如果我不把前面存在着的危险告诉英国公众，我就做了有害的事。为了强调起见，我把我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我们

没有意图在我们国内推行“茅茅”^①运动，但是有那种危险。我已经把我认为英国政府应该知道的那个重要事实指出来了。”

1958年初期，我患了重病，医生好象无法查明病源究竟是什么。我从东方省作了一次可怕的旅行，我的肺部充满了尘埃。那时候，我非常感激在希甘卡塔的救世军医生S·G·冈特利特博士给我的一切帮助。他不但大力帮助我恢复健康，而且在他忙碌的病房巡回中，在我的病床旁边停下来，和我作又长又有趣的讨论。我现在仍旧乐于把他当做一个朋友看待。

这时候，我对“非暴力”政策的关心是加强了。在1958年1月31日的国民大会通报中，我写道：

这是一个巧合，在我们就这个十分重要的题目写文章的时候，不但印度而且全世界都正在纪念印度之父，就是那个把“非暴力”的有力武器付诸实施的人。他用这个武器反抗当时最有势力的帝国和世界列强之一，即英帝国。多少年来，他把苦难担在自己身上，而作为帝国主义肮脏工具的受害者告终。我们可以补充说，他象那样告终也许是合适的，……不可能找到更高尚的结局了。

在最近七年内，我们的民族领袖和主席强调了非暴力在我们的斗争中的需要。这是执行得非常好的。即使在挑衅面前，非洲人也行动得特别好。但是，我们说，每件事都是有极限的。去年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

^① 是指肯尼亚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的爱国武装组织。——译者

会上，领导人维护这个原则非常困难。大多数代表赞成从我们的党纲里删掉有关这个原则的条文。只是群众对他们的领导人的信任，才使条文得以保留下来。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辩护说：如果在北罗得西亚爆发暴力行动，受害的只是非洲人。没有人比国民大会的领导人知道得更清楚了。我们意识到暴力将把南非军队和英国军队引进来，美国军队也可能开进来，倘使，譬如说，在阿尔及利亚和塞浦路斯曾发生的事情也在这里发生的话。所以国民大会的领导人认识到，他们有道义上的责任，使他们的人民不受到帝国的枪杀。

我们插进这篇文章，试图说服政府停止它目前的行动……我们有证据表明，政府或它的代理人历来是怎样惯于挑衅的。北方省和卢瓦普拉省的警察机动部队的活动，和民主国家的任何警察队相比，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公署通讯员做了数不清的损害非洲人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坏事；难道没有白人上司的指示，他们的行为会如此恶劣吗？在最近的一起案件中，一个区专员居然来到国民大会委员会的会议席上，命令警察机动部队殴打很守秩序的国民大会男女和儿童党员。政府究竟在搞什么呢？我们能否作这样的结论：就非洲人来说，正在建立的警察和军队就是为了将北罗得西亚变为一个警察国家？

我们要求我们每个地方的所有工作人员，对我们的全体人民不厌其烦地强调保持非暴力。我们必须使政府得不到机会用机枪扫杀我们的人民。这种事件过去在铜带区发生过，如果我们给他们抓到机会，可能

发生更大规模的这种事件。这并不是说你应该和那种邪恶的事情合作，远远不是这样。应该拒绝和人类所不应做的任何事情有任何牵连。

1958年5月，我受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的邀请去访问印度。我以前由于不能去新德里而感到失望，所以我欢迎有此机会，访问甘地的故乡，去会见许多参加过非暴力示威的人们，这种示威曾有助于使印度赢得独立。这是一次很好的经历，对此我将永远感激，但这只是我们自己长期斗争中的一个插曲，所以这里就不多谈了。

现在我转到一个不太愉快的题目。凡是知道我和恩坎布拉先生多年来共事关系的人——起初我作为钦萨利区的书记（1951—1952），以后作为北方省的省组织书记（1952—1953），最后作为总书记（1953—1958），有理由对我们之间好象是突然的分离表示惊奇。这个分离是悲哀的，但在发生的当时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都知道并且赞赏恩坎布拉先生自从接替姆比库西塔先生以来所做的大量工作。但是我持有这样的见解：让恩坎布拉先生象他现在干的那样继续引导这个民族，这将是政治上的民族自杀。我们的几个评论家敏锐地向我们指出，为了避免我们内部分裂，应该撤掉他的主席职位。我希望那些人在了解当时国民大会内发生的情况之后，会变得明智些。我愿意在这里指出我们分裂的缘故，而无论如何不伤害我的老朋友的名誉。

我们在一起的整个时期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党纲规定：国民大会的最高负责人，即主席、书记、司库以及他们的副职，都必须在三年任职期满后在一次适当的会议

上选出。但是当恩坎布拉先生体会到他已经把自己弄得不得人心时，他开始计划修改党纲，改为在每个支部设立投票所，使主席的选举跟美国的选举具有类同的形式。他想依靠他在基层成员中过去的声望，可以使自己成为有些象国民大会的终身主席。我们和他一起在上层的成员，全都拒绝接受这样一个不必要地付出很大代价的事情，它首先将引导我们在国民大会内造成族阀主义和专制政治，这些恰恰就是我们在国民大会外反对的弊病。

恩坎布拉先生开始把凡是反对他所想要做的任何事情的人都指为共产党人或叛徒。一个人不管如何聪明，总是要犯错误的，如果在任何党派或者任何人民团体里，成员们为了害怕被指为共产党人或叛徒而害怕对他们的领导人提出建设性的批评，那么，它将完全成为一出独脚戏，而你就接近独裁统治了。这是我们当时在国民大会内的处境。

在1957年4月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我们同意派遣一个包括三名最高负责人的代表团到英国去（由于缺乏经费，人数减为两名）。我们还同意用抵制啤酒馆来支持这个代表团。这次对啤酒馆的抵制也支持了我们关于啤酒酿造应该由非洲人办的合作社接管的要求。在那个时候，经营这些啤酒馆的所有市议会和董事会里，非洲人代表一个都没有，因此数以千计的金镑开支是来自非洲人的，而非洲人民却完全没有发言权。这是恩坎布拉先生和我飞往伦敦时的局面。在我们约定会见殖民大臣的日期前两天，恩坎布拉先生决定飞回本国。我试图说服他必须和伦诺克斯·博伊德先生会见，但是他却

问我是不是惧怕单独去会见，以此来回驳我。我告诉他，这不是什么惧怕的问题，而是由于我只是一个职位低的总书记。他现在是在英国已经和殖民大臣约期会见的主席。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只需多耽搁两天，然后离开。但是他决定回国，他果真回去了。结果我们没有见到殖民大臣，我接到通知去见殖民事务国务大臣珀思勋爵。

恩坎布拉先生另外还有一个约会。他原定在会见殖民大臣之后到爱尔兰去，既然他走了，这就使我背上了可耻的责任，捏造他不得不突然离开的谎言来为我的主席辩护，我希望有关人士当读到这几行文字时会宽恕我。

恩坎布拉先生回国之后，不愿去找他原先委托代理他职务的卡普韦普韦先生，而径自去停止他自己的全国执行委员会所发动的抵制运动。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但是毕竟发生了。结果是我们省级的同事们受到苦难，因为那些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得以叫大家注意党的领导人通知废除他自己发动的抵制运动，他们指责他的下属未经他的同意而发动抵制运动。

恩坎布拉先生所犯的最致命的错误之一是：他习惯于在自己认为有某个可能引起严重争论的问题的时候，邀请哈里·富兰克林先生列席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当他逐渐觉察到自己是在丧失威信的时候，他不能正确判断：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实际上对他比对哈里·富兰克林更为尊敬。在我们发展过程中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确不能让国民大会象过去的非洲人福利协会那样听凭前任区专员、“老板”富兰克林来辱骂我们。最后一次邀请是和上面提到的抵制啤酒馆问题有关的。为了这些抵制，

富兰克林先生居然有脸把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称为“野蛮人”。正如可以料到的那样，有几个委员愤然离开了这个委员会。恩坎布拉先生想通过这种友谊得到什么好处，只有他自己明白。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全国执行委员会里的所有进步分子开始丧失他们对恩坎布拉先生的信仰。究竟这些对委员会的侮辱是两个哈里之间预先策划的呢，还是一时的冲动呢？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告诉我们。

即使在这些事件之后，我还是试图对我经常用“老头子”这个尊称招呼的这个人保持信仰，直到我根据他的指示从英国回来为止。那时候我正要到印度去，我已经缩短了自己的路程，但当我听到国民大会内发生风波而我的主席要我回去时，我就回来了。当我到达的时候，一个老资格的报人弗兰克·巴顿在《非洲时报》上重新发表了他原先在《中非邮报》上所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他每星期日去教堂做礼拜，并为今后二十年打算》。这次他用《卡翁达，这个等待着的人》作为文章的题目。这篇文章在恩坎布拉先生的心里引起了很多烦恼。他严肃地向我谈论这篇文章，告诉我，这对我是不会有丝毫帮助的。我告诉他，我和《非洲时报》上的文章毫无关系。他说，如果确是这样，我应该加以驳斥。在我欣然照办之后，他的怒气平息了一阵子。

当我参加了在达累斯萨拉姆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的会议后在印度观光的时候，恩坎布拉先生到各处去兜了一转，把所有他认为已对他失去信任的省级负责人都停职和开除。他把卢瓦普拉省、东方省、北方省和西方省的

大多数负责人停了职。结果是他没有给以停职处分的仅有的两个省——北方省和中央省，对他投了不信任票。

当我不在的时候，国民大会借了一些钱派恩坎布拉先生到伦敦去，和他一起去的有一个政府官员代表团，包括索科塔先生和奇利西先生。起先，殖民部拒绝会见恩坎布拉先生，但是上面提到过的立法会议的两名非洲人委员，设法说服本森总督，容许恩坎布拉先生和殖民大臣会见。当约定的时间已到时，他仍旧在旅馆里躺在床上休息——这是为什么呢？只有他自己能说得清楚。他唯一能做的事，是把他的备忘录邮寄给殖民部。这是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做法吗？

我们中间那些熟悉政治事件趋向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恩坎布拉先生烧掉了关于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问题的白皮书。在他允许弗朗西斯·钱贝先生——一个联邦议会的议员——没有首先辞掉议员职务而参加到国民大会来之前，他与联邦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次，在联邦选举的时候，恩坎布拉先生让已故的劳伦斯·卡蒂伦古先生在1958年10月分裂之后在国民大会的会议上搞竞选活动。这些是恩坎布拉先生靠拢联邦的仅有的两次活动。即使我们把这两件事看作纯粹是偶然的，但在涉及北罗得西亚宪法问题时，恩坎布拉先生的行为是有很多缺点的。

即使在全国执行委员会讨论这个宪法草案前，恩坎布拉先生就忙于和宪法党调情勾结。当他到各处去订立同盟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正在等待他回来召开一次执行委员会的重要会议。当他终于来到时，他试图说服我们通

过这样的办法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为非洲人赢得八个席位，并且通过和宪法党合作，他认为有把握可以赢得八个欧洲人的席位。我们排斥了这种主张，认为这样做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政治上的卖淫，而最坏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背叛。我们向领导人盘诘关于宪法草案的种种要点，他自夸对草案已经精通，而实际上给我们的印象是，他还没有开始懂得它。结果，我们成立了一个六人小组去答复白皮书。这六个人是鲁本·C·卡曼加、所罗门·卡卢卢、西蒙·卡普韦普韦、贾斯廷·钦巴、泰特斯·B·穆库普和我本人。这个答复列举了我们驳斥本森宪法的理由，见附录三。

在我们作出决定以后不久，恩坎布拉先生当众烧掉了一份关于北罗得西亚宪法的白皮书的抄本，我们认为当然他作为我们的领导人，已经对这份充满政治圈套和陷阱的伪宪法表了态。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他对关于联邦的白皮书有过相似的行动。所以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对我们的领导人想要给这部宪法一个“公平的裁判”，是十分吃惊的。这是导致事情结局的最后一个因素。

很自然的，我们开始向自己提了一连串的问题，其中有：难道他就是在反对联邦这段时间里鼓励过我们的这个人吗？难道他就是鼓励过我们将北罗得西亚非洲人大会改名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这个人吗？他此刻是在追求他接替姆比库西塔先生以来从未认为必需的权力吗？我们接着想：我们一直信任的这个人，甚至在他拥有宪法权力之前，就要求得到他明知是错误的东西吗？他不是正在把那些非党员和不属于省级的男女工作人员拉到全

国执行委员会来吗？我怀疑他是否仍旧是我过去曾给以无条件支持和忠诚的那个人，仍旧是我一向认为由于他对自己的人民和国家的热爱而从不屈服于任何事物的那个人。我不知道他的行为为什么会这样。恩坎布拉先生由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过去是一个不准任何带有部族性的东西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上讨论的人，可是现在他却忙于试图完全按照部族路线把我们分裂开来。这是可怕的和令人惊奇的，但没有理由欺骗我们自己，因为事情虽然可悲，但确实是在发生。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在变为姆比库西塔第二。现在的问题是：是什么使恩坎布拉先生那样改变自己的态度？除了他自己，别人没法回答。别人只能猜测。假使他不愿回答，历史将作出回答。因为尽管我们能够相互欺骗和作弄，我们对待历史却不能这样。但愿历史将不太严厉地对他作出裁判，因为他在早期是真诚的。

我们一无所得地离开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我们所有的只是一股反对我们的怒潮。在10月24日那天，赞比亚非洲人大会^①在布罗肯希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诞生了，六十名代表是在会期前仅仅一星期接到通知就来出席会议的。我被选为主席，西帕洛先生为书记，卡普韦普韦为司库。D·孔克拉先生、W·K·赛卡卢比先生和R·C·卡曼加先生分别被选为我们的副职，但是当孔克拉先生一发现自己没有被选为主席时，他立刻离开会议，保罗·卡利希尼先生替代他，当选担任一个副职。选举过

^① 原文如此，根据《赞比亚史》和本书下文，应是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译者

后,我们立刻着手工作,而我们是真正辛勤工作的。今天当我们聚集在一起,回忆我们的组织系统和所根据的精神的时候,我们努力完成的工作量之大,使我们自己也感到惊愕。

我们的总部设在新奇伦杰镇上第二八〇号茅屋。除了把它用作办公室以外,我们还不得不住宿在那里。我们拟订了每天的工作计划,并且把一切完成的工作都仔细地记录下来。这种工作计划写在一张纸上,标题为“工作进程如何?”我们每一个人,必须照表上分配给自己的任务,每天晚上到市镇的一个场所、院子或区域里去。我们的工作有三个要点:第一,向人民说明我们为什么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决裂;第二,详细说明我们为什么拒绝本森的北罗得西亚宪法;第三,为吸收会员和募捐呼吁。

每天早晨,我们碰头汇报前一天晚上工作的成败,然后我们订出当天的新的工作计划。

在我们工作成功的地方,我们知道不必过于集中力量,只要经常检查一下指定的组织者的工作便行了。即使我们离开总部,总还是有一个较低级的人驻在总部听取报告,再向我们汇报。我们的口号深入人心。我们提出简明易懂的口号,以便所有追随我们的人都能够照样讲,因为你有越多的人喊这些口号,党的声望就越高,征求会员运动就越有成绩。在几个星期里,我们的发展相当可观。

我想在这里指出,最近读到里德利报告,我得知那些向本森总督告发我们晚上活动的人,把我们晚上认真组织我们人民的工作,当作是对他们的威胁和恐吓。这是

不真实的。里德利报告中说到，我们由于激烈的言论遭到逮捕后，正在计划使用暴力；所有这些，我认为全是适应当时政府所采取的行动的某种借口。这是任何没有偏见的观察家的常识：当你把领导人从他们的追随者那里调离，这些追随者每人就成为他自己的司令官。在印度独立斗争中，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每逢领导人被逮捕时，暴力行动几乎没有不爆发的。事实上，虽然报纸、广播或其他宣传工具散布了种种谎言，我们从来没有计划过任何种类的暴力行动。对我在这个时期里的活动，加在我头上的唯一罪名是，曾和别人同谋召集一次未经许可的会议。当然，这是被当作一项重罪看待的，当报纸上报道我被控阴谋犯一项重罪时，这在漫不经心的读者眼里，好象我是在策划干什么恐怖的事情。在下面的一章里，我将说明，召集这一未经许可的会议是依照我们早已明确主张的一项程序做的，即我们给政府以应有的事先警告，如果我们计划打破法律规定的話。我实际上向本森总督提出过这个问题，曾经三次为举行会议向他请求许可，当他拒绝允许我们再举行任何会议时，我觉得，不理睬我们大家都认为是愚蠢的那种禁令以便维护言论自由，这正是我的责任。

在我们日夜忙于组织我们新的政党的时候，我们抽出时间为宪法的修改起草我们自己的建议，这份建议我们在1959年2月4日向英国政府提出。在我们这份建议书的前面印有这样的文句：“除了人民自己，我们不知道还有任何别的社会根本力量的宝库。”

在我们给殖民大臣的信里，我们说：“只有每个人感

到他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政府才是最强有力的”，当然，这是我们要求普选权的根本依据。正是选举权的获得才使每个男女公民感觉到自己是新国家真正的一分子。

我们提出的文件很长，不能在这里全文照录；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在赞比亚被每个人骂作凶手和无赖的那些日子里所提出的建议，同 1962 年英国政府颁布的宪法是相差不多的。现将我们的提案第二、三、四条中有关各节摘录如下：

第二条 选举权

1. 男性或女性非洲人，凡年龄在二十岁或二十岁以上者，都有选举权；
2. 外国的非洲人，年龄在二十岁或二十岁以上，居住满六个月后，有选举权；
3. 外国的非非洲人，年龄在二十一岁或二十一岁以上，在居住满三年并经批准为公民后，有选举权；
4. 从英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来的外国非非洲人，年龄在二十一岁或二十一岁以上，在办理入籍手续或居住满三年后，有选举权；
5. 从南非和英帝国其他非洲领地来的非非洲人，年龄在二十五岁或二十五岁以上，在办理入籍手续或居住满五年后，有选举权。

第三条 代表

应设立一个议会，包括五十九名由人民直接选举的议员和三名担任下列职位的当然议员——首席阁员、首席检察官和财政部长。

1. 五十九名议员的选举办法：下列市镇各选两名议员（其中八名应为非非洲人）：利文斯敦，卢萨卡，布罗肯希尔，恩多拉，卢安席亚，木富利腊，基特韦-卡卢卢希-希卢布马，欣高拉-班克罗夫特。
2. 四名议员从南方省、东方省、中央省和西方省的四个农业区域选举产生。
3. 三十九名议员的选举办法：巴罗策兰，五名；西北省，四名；西方省（农村），三名；卢瓦普拉省，四名；北方省，七名；东方省，六名；南方省，四名；中央省，六名；共计三十九名。

全国酋长会议

应设立一个中央酋长会议。所有最高酋长皆为全国酋长会议的当然委员。所有土著当局选举一名。

会议

全国酋长会议每年应召开四次会议。

全国酋长会议的权力

(甲)保卫习惯法、文化和传统。

(乙)发挥作为国家的监护人和管理人的作用：

(i)按上述(甲)项内容，检查影响国家的各种立法。

(ii)检查其他一切立法。

第四条 议会

应设立一个下文称之为“国民议会”的议会。国民议会由其选举的议长担任主席。

除由总督掌管的国防、外交、财政和法律诸部和三个首席文官外，内阁应包括九个部长，由多数党领导

人与总督磋商后从选出的议员中提名。这些是首席部长(内政及国家指导部)以及工商、经济计划与矿产部,农业与自然资源部,土地开发与合作社部,劳工部,卫生部,教育部,新闻与广播部,地方政府部,运输和交通部部长。部长须效忠于英国王室。各个部设常务副部长,由责任部长推荐任命。副部长不出席国民议会。

一四 被捕和监禁

就三月的天气来说，白天热得异乎寻常，不适时令的干旱使小家伙们不舒服地手脚伸开躺在公用席子上，显得相当疲乏。在新奇伦杰镇上第二五七号一幢两间房的屋子里，住着我们十个人。除了我的妻子和我们的五个儿子以外，还有两个侄女和一个侄儿。侄儿和我们的大儿子同住在我们小小的厨房里。他们躺在那里，看来与其说象人，不如说更象几根硬柴棒。最小的两个孩子和我们一起住在那间小卧室里，其余的则住在另一个房间。它兼各种用场——卧室、起居室、餐室；在我们得到一幢新奇伦杰镇上第二八〇号有两间房的屋子之前，这个房间也用作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办公室。实际上，就是在这儿通过组织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决议的。我知道，这样拥挤和不舒适，对我那即将分娩第六个孩子的妻子来说，是很难忍受的，可是她毫无怨言。这种困境现在已成为卡普韦普韦一家人和我们一家人在闲聊时的大笑料。萨洛梅·卡普韦普韦妈妈和我的妻子在暗地里十分怀疑她们的丈夫开始搞一个新的政党究竟是否明智。当我们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工作时难道还没有吃足苦头吗？我们重新去过一种正常的生活，即在参加国民大会活动以前的那种生活，难道还不是时候吗？然而她们把这种想法小心翼翼地瞒着我们。

3月10日，我们的一个情报员来报告说：各省的所有高级警官已汇集在他们的北罗得西亚总部开会，他知道，那天或者第二天我们即将被捕。因此，我们开始预作准备，彻底清理我们办公室和住宅里的有价值的文件和书籍。我们把这些东西寄放在我们可以信任的人以及我们知道警察不会怀疑和搜查的人那里。这时候，我们已经把刘易斯·香果福先生送到坦噶尼喀去。我们没有足够的经费，但是当时在布罗肯希尔经商的班·卡普菲先生愿意资助我们。我们本来想，分别担任国民大会书记和副司库的穆努卡荣布瓦·西帕洛先生和鲁布·奇坦迪卡·卡曼加先生，都应该离开本保护地，但是由于缺乏经费，此事未能做到。

在3月10日，没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在11日，事情很清楚，我们已被人用极不寻常的方式盯梢，我们也知道原因是什么。夜里，我们五个人聚到一起。现在很难说，我们为什么要会面。也许我们的灵魂和肉体需要聚在一起。然而，我们在一起愉快地度过了几个小时，到后来有人开玩笑说，最好还是在各自的家人面前被捕，这句话就使我们大家回到各自的家里去。我们大家都心情沉重，虽然每个人都尽力不形于色。我回到家里时，除我的妻子以外，其余的人都睡熟了。我找不到我们的锁，于是就用一把剪刀代替锁。

我很可能已经睡了一个钟头，这时候我睁开眼睛，看到一辆摩托车开近我们的家，强烈的照明灯光照到了我们的卧室。我的表上是一点钟。我开始穿衣服，也叫我的妻子把衣服穿起来。我们还没来得及走过去，我们的

畜栏式门上响起了很响的敲门声。我以坚定的语气说：“请等一下。”接着听到猛力一推，那把剪刀落下了，一眨眼工夫，一个穿制服的警察就出现在我们卧室里。

他立即命令我在一张既不给看也不向我宣读的纸上签上名字。在正常情况下，我一定会拒绝在我一点也不知道其内容的东西上签字的；但是，这一回，我望望我的妻子，又望望我的两个小孩，望望他们那惊恐的面孔，我毫无抵抗地在一个不知是什么性质的文件上签了字。直到现在，我也不能解释自己这一行动。这好象不是由于突如其来而使我举止失措。我知道他们来了，就我记忆所及，我的心情是镇定的，……所以这并不是什么突如其来来的事。然而，警察命令我收拾一只衣箱，而他的两个同伙则把我的书籍和文件塞到他们的兰德-罗弗牌越野车里去。当我走出去时，我的两个侄女中年纪较小的一个坐起来喊着“喳一喳一喳”，然后正象她突然惊醒一样，又突然倒下去睡着了。整个兰德-罗弗牌越野车塞满了我的书籍和文件，这些东西如此之多，以致我是蹲在自己本来看作很贵重的财产上，我的左手同一个非洲人便衣警察铐在一个手铐上，右手同一个穿制服的白人副巡官铐在一个手铐上。我的妻子跟着我们出来，那个显然是领导这一行动的警察叫我的妻子到区专员办公室去报告，领口粮钱。于是，到某一不明目的地去的我的长途旅行就开始了。我被急急忙忙地带到伍德兰警察局。我后来发现，那个负责人不信任我在文件上给他签的名，所以又要我在他的文件上打上手印。从这个警察局出发，我们的车子飞快地驶过政府大厦、秘书厅、最高法院，然后开到

与开罗大道相连的乔治国王大道上。在离卢萨卡六哩的地方，在通向布罗肯希尔的大北公路上，我们突然转弯，到了一个很大的砂砾坑，是承包商在那里挖掘过铺路碴的。我想，这一夜，整个警察力量都集中在那里。周围一定有四十辆左右警车。负责我们这次不受欢迎的远征的那个人，向他的上司们报告了他的大逮捕，我立刻感到有几十只眼睛贪婪地、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的衣箱被丢在地上，有人把它打开，彻底搜查了我所有的衣服，然后把它们满不在乎丢下了。接着，我被推进附近的一辆警车，我发现我的两个同事，西蒙·卡普韦普韦和年迈的约翰·莫姆比已在车里。过了几分钟，卢萨卡支部的主席奇波韦也同我们会合了。

我们不知道我们将到哪里去，这事使我们非常不安。我们设法同这时负责看管我们的两个警官谈话，但是他们不愿讲，所以我们决定放肆起来，开始唱歌。他们不喜欢我们这样做，因此恐吓我们说，如果我们继续唱，那就要把我们分开。我们觉得在当时情况下，那是可怕的，所以我们就不唱了，但是这给了我一个谈话的机会，我漫不经心地说：“我非常高兴，终于要去看我的母亲了。”两个警官中的一个落入了我们的圈套。他哈哈大笑，显得颇为得意，说：“你有你的希望。不过，你正好是去相反的方向。”虽然话不多，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了我们不是回家去。顺便说一句，我们五个人以前都是钦萨利人。

想来一定已是上午三、四点钟之间了，除了一辆汽车、一辆兰德-罗弗牌越野车以及我们警车上的人以外，所有警官和警察都离开了。四点钟，我们开始出发。我

们围着卢萨卡兜了大约一小时，然后直奔飞机场，在这里我们发现全副武装的保安警察。我首先被叫下来，两个魁梧的警官把我押送到一架等在那里的有四十四座位的客机前面，飞机的发动机已经发动，准备立刻起飞。他们扣着我的手把我带上飞机。五点一刻，我们起飞到我们不知道的目的地去。我们下一个降落站是恩多拉。我们走下飞机时，可以看到一辆大警车，周围有许多兰德-罗弗牌越野车，我们知道，是停下来搭载更多的“捣乱分子”。果然，从布罗肯希尔来的海登·丁吉斯瓦姚·班达、尼夫斯·坦博、J·K·穆伦加、R·卡帕加拉、约瑟夫·L·马伦加和拉尔夫·科贝加入到我们之中。我记得，当我们再被空运时，他们给我们一点腌牛肉和饼干。有人告诉队长(一个警官)说我不吃肉，可是那个可怜人也没有什么办法。过了一会儿，我上盥洗室去。一个非洲人警察紧跟着我。我对队长强烈抗议侵犯我的私事，但是我们的队长只表示抱歉，告诉我们这是他得到的命令，所以我决定不去了。大约两小时后，我们降落在巴洛瓦莱停机场。我在那里度过了几小时，然后把我送上长途旅程的最后一段路，到我所不知道的目的地去，下午六点钟，我被移交给卡崩波区专员。弗兰克·希塔姆巴拉在这里跟我会合，半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我们的新“家”。

在我和科林·莫里斯牧师合写的《黑人政府吗?》一书中，我说：“我们从事一场反对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不是因为它有许多白人当代理人，而是因为它坏的方面多于好的方面。”这里有一个例子足以说明我的这个意思。当我们在卡崩波吃了第一顿早饭之

后,我们决定去散一会步。使我们惊奇的是,当我们接近村民的时候,他们都跑开了。男人们站在树旁,准备在我们要靠近他们就爬上树。母亲们抱着婴儿,赶快奔进屋里去。当这种事情大约重复发生了三次以后,我们想应该弄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经过调查,我们发觉,当局散布了一种有关我们的非常有恶意的谎话。他们告诉村里的人说,这些赞比亚人是吃人肉的。他们尤其喜欢吃小孩,因为小孩肉嫩。任何人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竟然撒谎到了这样恶劣的程度,我想是需要请精神病医生治疗的,但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干的。在《黑人政府吗?》一书中我还说过:“这是一种会毁坏一个最好的人的办法,不管这个人的肤色、信仰和宗教如何。”我无法想象,这些在非洲干出这种事情的人,在英国也会干出这种事,但是在这里,他们在维护着一种错误的制度。然而,我们很快就安居下来,我们周围的人民立刻有许多人来听有关自由的好消息。事实上,我们给人以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我们在那里仅仅住了一个月以后,每个人就分别接到命令,绝对禁止我们在任何集会上讲话。

我们的行动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以内,于是我们试图运用在这种情况下尽可能有用的办法来消磨时间。我们早上先洗澡和吃早饭,然后,两星期后来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弗兰克和穆桑达就出去找粮食;接着,他们到我们的露天办公室和我会合。有些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一个很热的早上,我穿了一双式样很简单的凉鞋,没穿衬衫,只穿了一件汗衫。我一直在很认真地看书,但这时我突然停止了。我的思想开始漫无边际地活动起来。我不知

道人为什么不能更接近自然，并和我们今天所畏惧的一切做朋友。我自己想，如果我们能象孩子们那样在瞰身蛇之类的毒蛇周围玩耍，那该多好。这当儿，我朝下一望，看到一条很大的蛇的头，它正在我的左脚小趾上爬过。我没法在这里为我的行为作解释，但我却平静地看着。我的这位不受欢迎的、其毒足以致人死命的不速之客，是一条大约五呎长的黑毒蛇。（在约翰·冈特先生把我骂做黑毒蛇之后，我常在惊异，“我的家属”的这个成员为什么不停下来向我问候呢？一定是因为我不懂黑毒蛇的语言吧！）大约过了整整五分钟，我突然跳起来，急忙奔回寝室里去。那时候，那条敏捷的蛇一定已在一哩之外了。

午饭后，我们常是休息一下，然后又重新回到我们的露天办公室，一直待到下午五点。当弗兰克和穆桑达为我们准备晚饭时，我就去作长距离的傍晚散步。就在这样散步的时候，又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这以前，我惯于欣赏大自然里的许多事物，但是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接近大自然，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真正爱上大自然。我的意思是：在此以前，我很真心地主张有控制的“火耕法”、“土壤保持”以及猎物的保护。我这样做是由于我在家里所得的个人经验。在卢布瓦周围，我们有很多的猎物、树木和野草。但是持枪的人越来越多，猎物也就越来越少了。今天，猎人不得不到卢安瓜河谷的奇巴尔酋长和隆杜酋长的地区去打猎了。树木消失了，除非采取某些控制的办法。我们在传教站不得不付出辛勤劳动，循着等高线作田塍，来保护土壤，防止侵蚀。这是我

住在卡崩波的日子以前的经验；但是现在，在这里，对大自然的一种新的亲切的深情支配着我。我常是散步大约一哩路，然后走到一个很高的地方休息一下，在那儿可以鸟瞰在这样的季节里极为美丽的乡村景色。这儿，静静的卡崩波河水汇聚成一片汪洋。河的两岸长着高大的树木，在雨季中呈现着深绿色。这些树似乎在相互妒忌，当风吹得树枝左右摇晃时，又显得象是在指着对方，不可思议地互相指责。正当这一片汪洋的河水在卡崩波公署这块壮丽高地的多草的脚下急转弯时，静静的河水撞击着坚硬的岩石，激发出喧嚷的抗议声。

在这儿，我坐下来，远离这个世界默默地沉思。在这儿，我似乎愈来愈接近于懂得大自然的语言。我观察树木各种各样不同的外形，这给了我很大的乐趣。轻轻的微风从卡崩波河上吹来，周围的草木好象随着一支奇妙的曲调在起舞，这使我感到自己是处在永远也不会进入耳鼓的乐曲之中。然而，我坐在那里，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在这期间，狮子、豹、鬣狗、蛇和所有动物，似乎都只信仰一个造物主全能的神，一致同意决不互相伤害。有时候，弗兰克·希塔姆巴拉会因我长时间不在而担心，于是来找我。有了这次经验之后，我打算搞一架照相机，想从我们喜欢的各个角度来拍摄树木，贴一本这些树木外形的照相簿。这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厉害，我开始为这样的想法所苦恼：树木和所有的生物，一定都有它们自己的语言；但是人类所无法理解的上帝的创造一直把它保守着秘密；总有一天将把这种秘密向人类揭示，正如许许多多秘密已被揭示一

样。出狱之后，我买了一架照相机，但由于环境的因素，我在卡崩波被监禁时期的这种雄心未能实现。我仍希望有一天能实现这一愿望。

我们在卡崩波周围的影响不只限于学生和村民。我有使用一根粗糙木棍来代替手杖的习惯。在一个月內，几乎每一个公署通讯员就都拿这么一根木棍走路。许多学生也是这样，官员们大为恼火，开始大讲其不该怎么怎么，来教训他们。在卡崩波的生活决不是完美的。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几乎丧失了生命。我得了严重的赤痢，接着又得了厉害的疟疾，然后又连续地患伤风和咳嗽。就我的健康状况而论，我再度被捕和判处坐牢时，情况却要好得多了。此外还有一些关于卡崩波的悲痛的回忆。一天，为了我们的津贴不够用，我去找区专员。我上午八点半到办公室。九点半，西北省立法会议的成员威廉·恩卡查阁下到了。他等了四十五分钟，但是区专员不能见他。只是叫我们等着。恩卡查先生回去了，但我仍继续等候。中午十二点，我从站在区专员办公室门口附近阻止任何人进去的通讯员身旁走过去。我完全失去耐心了。我极愤怒地敲门，也不顾他没有叫我，就走了进去。他吆喝着叫我出去，但我拒绝了，反而请问他为什么叫我等了三个半小时。他回答说，他在起草一个要我签字的文件。我大声回答说：那按礼貌也应该让我知道，我就不会浪费时间了。如果有人对待他象他对待我一样，难道他会高兴吗？

在这个时候，他发了脾气，破口大骂我。我不声不响地直冲过去。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我们围着他的桌子打

转，他一面喊他的通讯班长。通讯班长进来，站在我们两人中间，我们好象好斗的公鸡那样彼此盯着。我们这位新找到的调解人是很尊敬的一个老人，当他请求我不要动手时，我望着这位朋友并且说：“我对通讯班长比对你要尊敬得多。”我就离开了。一个钟头以后，区专员来到我们的露天办公室，要我们在文件上签字。这些文件是命令——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三个月内禁止我们三个人在任何集会上讲话。

另外一件事情我想应当提到。我作为被拘留人押解到卡崩波之前，我全然没有访问过西北省。因此，我对该省以及巴罗策兰情况的了解仅是第二手的。有一些事情立刻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使我认为是我们国家的普遍问题，其中之一，就是酗酒。我对这个问题的不安心情，只要读我致所罗门·卡卢卢的信的一部分就可以知道，卡卢卢刚刚辞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职务。这一次我写信给他说：

卡卢卢兄弟，我在这里的短期逗留使我大开眼界。有些人说，最坏的事情中也总有一点好处，我现在同意他们的说法。如你所知，我自从1953年接任书记职务以来，不论好坏，我把很多时间花费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办公室里。这使我忽视了农村地区。我匆匆地到各处跑，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当前的政治问题上，心中对许许多多问题很少了解就赶到总部。照我们今天处理事情的办法，我们把国家大厦建立在沙滩上，而正如我主所教导的，这样建立起来的大厦是经不起大风暴的，这种大风暴是我们轻率地称之为生活的东西的一个组

成部分。从这方面看,我想,我被拘捕和被押解到乡下去,表面看来是不幸,其实是一种幸福。我不但发现了我的错误(应当说是大如喜马拉雅山的错误),而且刚刚开始进入重新发现我自己和我的人民的进程。我以前一直相信,我们的道德败坏仅在一定地区严重存在,而不是在农村地区。在这一点上,我是非常错误的。我不知道你对此是否有同感。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是如此强烈,以致我们自己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被顽强的贪婪的西方文明所侵吞。更严重的是,经济上如此不平衡,以致我们的人民失去了他们的社会和文化基础,现在停留于向表面上优越的西方社会和文化水平看齐。这需要一定水平的经济实力,但现在没有。结果是,他们想得到他们所不能得到的东西,或者是外国统治者把他们剥夺了的的东西;那末怎么样呢?自然是道德上的败坏。

现在,我们自称为非洲人舆论的领袖的人,认真考察了这个问题了吗?我们是否为争取立即自治忠实地工作呢?如果是的,那么,我们希望谁来领导我们到我们所向往的乐土呢?一个半醉、半思、半腐的民族,只具有生活中应有的那么多的东西的一半,那会成为怎样的民族呢?总之,我们是否希望从道德极其败坏的人民中间形成一个民族呢?这行吗?有时,我担心这个问题会把我纠缠得陷入迷阵。这个问题是难以凭自己的意思来说的,所以我相信你会象过去那样关心我,直爽地告诉我,你内心深处是否认为我对这个问题是忧心过分了。换言之,如果你认为事情并非如我所理

解的那么坏,就请这么告诉我,并提供论点表明情况是与此相反的。

自从我到此地以来,我看到一些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更糟的是,有些年纪比我还轻得多的人,他们简直不用脑子。他们只要拿到工资,星期六和星期日买几瓶卡查苏酒喝喝,人生所应关心的大事也就全部满足了。这里周末的生活,呈现出如你在卢萨卡所见到的同样可悲的一种情景。老实说,我们怎么能这样过日子呢?这些酗酒的地方是如此混乱,结果人们星期一都是上酋长的法庭。没有时间来认真思索和计划。在这种种混乱中,北罗得西亚政府大约下一个月要在这里开一家酒店。这使我想起当有人反对增加啤酒销售时,非洲人事务委员会负责人中有人曾经说过的话。他说:“不经办这种事,那我们怎么进行我们地方政府的非洲人事务呢?”好吧!老实说,如果一个政府不去严重腐蚀它的人民就无事可做的的话,那么,那个政府不行,它就必须让位给有能力的人。

我们不反对人们喝酒。这是我们已养成的习惯,我说的我们是指整个人类。但是,我觉得这种习惯正被利用来毁坏我们。我们的生活方式中有很多事情是坏的,但我相信也有很多事情是好的。在这些好的事情当中,有一件就是我们祖先喝酒精饮料所习惯使用的方式。这不仅是尊严的,而且也是老年人传授智慧给青年人的一个场所。事实上,甚至在今天,这仍然是不同肤色的一切有自尊心的人喝酒的方式。我们非洲人群众为什么要有所不同呢?请你把这个问题同克里

斯托弗兄弟和你所信任的其他任何人讨论一下，并把你们的意见告诉我。我无需讲“你们的坦率的”意见，因为我相信你们不会把任何你们认为是不正确的意见告诉人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对我的产生这种忧虑有很大关系。

接到你的回信以后，我将提出另一个问题，也许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当我们被禁止、被拘捕、被放逐到全国各地时，本森总督对我们进行了非常厉害的攻击，这是通过报纸，自然也通过电台多次广播，而广泛散播的。当时我听到，已建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研究查禁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问题，因此，我决定准备向该委员会送去一份声明。这是一份庄严声明。这份声明不送给里德利委员会，因为我的法律顾问们反对这样做。下面是我声明的一部分：

庄严备忘录，起草者肯尼思·戴维·卡翁达，三十五岁，北罗得西亚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前领袖和主席；给调查禁止上述北罗得西亚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事宜的特设委员会。

首先，我希望委员会负责人知道，我起草备忘录时所处的境遇是很不利的，因为我可以从中引用精确的参考材料来为我的理由作证明的文件，都在北罗得西亚警察手里，而我可以请来作证的人，也全都处于同样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以1959年3月13日《中非邮报》所报道的总督的声明作为我的备忘录的根据。

总督已采取严峻步骤，不但禁止一个成立只有四

个月、受人民拥护的非洲人政治组织，而且不经法院依法审讯，就把它的全部领导人逮捕并押送到乡下。总督拿出那样不充分的论据来解释他采取这种步骤的原因，这是令人惊讶的。我在这里可以拿出证据向委员会证明：要么就是由于对某些重要事情的真相极端无知，正如在声明中清楚表明的那样，而他采取的行动正是以这些事情为根据的；要么就是抱着极大的偏见。在目前情况下，似乎接受前一种看法较为宽厚些。

1. 总督以显然强调确实性的口气说：“在我极为坦率地告诉你们促使我采取这一行动的全部理由以后，我愿意简略地讲一讲我给你们规定的守则。”

然后，他继续讲到阿克拉会议；他描述了恩坎布拉先生（他是中非唯一没有被禁止的非洲人政党的主席）怎样“不同意某些事情，并在会议结束之前就离开了”。这个可怜的人不懂得，如果恩坎布拉先生不同意某些事情，而他却沉默不言，那就只能是意味着同意了。

可把恩坎布拉先生叫来证明，他不同意某些事情，并且明明白白这么说的。说恩坎布拉先生在会议没有结束之前就离开了，这句话的正确性，正如说本森总督过去五年一直是负责卢萨卡非洲医院的医生一样。恩坎布拉先生同会议主席汤姆·姆博亚先生、尼亚萨兰的黑斯廷斯·K·班达博士和其他代表们乘坐同一架泛美航空公司飞机，于1958年12月19日离开阿克拉。我在飞机场给他们送行。我记得我对他说到我们在阿克拉签署的“联合宪章”，劝他在我回国之前，不要对它采取任何措施。我留下来，因为我接受了加纳大

学学院校外给全体代表的邀请,参加为期十天的“新年学校”。我到学院去之前,到多哥共和国访问三天,亲自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2. 总督详细谈到的作为他禁止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依据的第二件事情是,阿克拉会议已把我们通常的非暴力保证改为暴力。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非暴力恰好是整个会议始终极为强调的口号。拉塞尔·豪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写的文章中是这样说的:

“据来自法属和英属西非洲的代表们称,星期一在这里开幕的全非洲人民会议,其目的在于为仍处于殖民统治下的每一非洲地区的争取独立制定一项战略。除了争取独立的非暴力运动(着重号是我加的)以外,会议将讨论:组成‘西非联邦’式的经济和政治联邦;建议修改某些非洲国家的边界,其中大部分是在1884年的柏林会议上武断地划定的,并且常常表现出某种种族反常状态;酋长的未来地位,传统的宗教和‘部落’组织;非洲妇女的地位以及其他社会问题。”

这实际上就是会议所遵循的路线。总督在这方面的消息来源,是同上述第一点同样错误的。

3. 总督接下去,除了别的话以外,还说:“正是这些赞比亚领袖人物,从今年以来,一直在对其他非洲人以采取暴力行动相威吓,在宣称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在组织不服从公正法律的运动,特别是在准备用暴力和威胁来阻止任何非洲人选民在3月20日的选举中参加投票。这些是他们在群众中公开进行的。但更恶劣

的，更恶劣得多的是，他们在夜间在乡村和城市的秘密活动。他们在那儿实行了一种恐怖统治局面。他们把人们置于生命毫无保障的状态之中。他们以死亡和残害来威吓人们的妻子儿女。他们乞求于巫术蛊惑和难于引述的咒骂来阻止非洲人投票。由于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夜间没有见证人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所以简直难以按法律来处治他们。”

这以后，这位阁下接着把我们比作芝加哥的匪徒。使人惊奇的是，女王陛下在当地的最高代表竟然如此严重地指控我们，而当他必须给自己的论断提供证据时，却用这样的话来结束：“……他们是在夜间没有见证人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所以简直难以按法律来处治他们”。在此我希望委员会负责人把我的深切遗憾载入案卷，那就是，这位阁下没有在此为他的论断提供证据。

我接着列举了以多数人统治为目标的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种种活动；“正如英国人统治英国，法国人统治法国，日本人统治日本，印度人统治印度一样，非洲人必须统治非洲”。我强调了这种情况是多么不公平，那就是：拥有随意利用电台和报纸的一切机会的总督，还运用省政权、警察和许多其他机构来进行广泛宣传，而当他无法证明自己禁止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行动是合理的时，又指控我们说“简直难以按法律处治他们”。但是，也许下一段话最能概括我的论点：

现在，阿瑟爵士之所以干出他所干的这种事，其最大原因就是他自己害怕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赞比

亚非洲人国民大会几乎在一夜之间发展壮大。它的影响是很大的。它的反对本森宪法的运动是如此激烈和有效，以致阿瑟爵士害怕我们将能做到说服我们的人民不参加3月20日的投票。我们的成功将导致一场宪法的危机。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宪法，他自然要担心，必须运用他的一切权力来使宪法得以实行。他做了一些事，就是禁止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拘捕和监禁了它的全部领导人并把他们押解到农村。

我愿在此明确宣布：我们将不屈不挠地反对仅仅由于种族原因而剥夺了这个国家三百万非洲人充分享有民主权利的种种制度。但是我将始终祈祷：不要发生仇恨的事情，我们自由战士永远不要有种族歧视。我们站在为民族独立和自决而斗争的前线，决不要求人宽恕，自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们确实决心获得它。

因此，先生，我谨提出：总督阁下阿瑟·T·本森爵士所采取的行动是没有理由的，不公正的和错误的，不仅对禁止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命令应立即取消，而且应代表总督为他的诽谤性声明向我们表示道歉。

最后，我愿向你提出这个请求：请你建议成立一个宪法委员会，以研究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制订一部民主宪法，因为这是在我们祖国停止政治斗争的唯一途径。

一五 狱 中

我记得有一天我告诉弗兰克·希塔姆巴拉，叫他把所有的文件夹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会惹起麻烦的东西，可能被警察所利用而不利于他。我现在不记得他是否认真对待我的劝告，但是第二天早晨，我第一次接到区专员写来的一封颇为恳切的信，请我去和他谈谈。弗兰克和穆桑达都陪我一起去。我一到达公署办公室，就再度被捕了，并且被带回到我在卡崩波的住处，进行彻底的搜查。不巧的是，那天早晨我没吃早饭。我们坐车从卡崩波到巴洛瓦莱，似乎只是为了要知道我们的朋友和同事们也被搜查了。我认为这次搜查一定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事实正是如此。在巴洛瓦莱，刑事调查官的好心的妻子给了我一些橘子汁，这是我直到深夜为止吃到的唯一的食物。

我催促我的临时监视人加快行程，以便我能及时赶到卢萨卡与我的律师们联系。他们告诉我说，两个律师都不在。我后来才知道这话并不是真的。事实是，他们接到命令，要他们在下午七点钟到达卢萨卡机场。我一到卢萨卡，就有人用车子把我送到卢萨卡中央监狱。我又回到我过去早就熟悉的牢房，1955年我曾和恩坎布拉先生一起住在这里。这次，两只床并没有搬走；实际上，还有床单、两个枕头和两套睡衣。当晚，我吃了一些面包、

人造奶油和奶酪。第二天早晨，我的律师来了，我们坐在一起为我的案件作准备。我并不拒绝这次起诉，所以我准备了一篇很长的声明。但是我还没有谈完，主持审讯的法官认为这是一篇政治演说，不让我再讲下去。我的律师使公诉人方面的证人颇吃了一点苦头。最后，根据被控事项的第一点“图谋不轨”，我被判徒刑九个月；根据被控事项的第二点“授权他人召开非法会议”，我被判徒刑三个月；两个判决一并执行。在我受审期间，有一次，警官把我带往法庭，我的同胞们看见我就对我挥手，我也向他们挥手，警官对我非常生气。他对我说：“你为什么一直不断地向他们挥手，仿佛你是伊丽莎白女王那样？如果你继续这样做，我一定要叫你乘警车上法庭去，警车，你懂吗？”我当然懂得，不过我并没有回答。我继续挥手，但是这次我非常小心。乘警车的旅程并不是一个美妙的前景。穆努卡荣布瓦·西帕洛以前一直被看管在费腊乡下，他此时也和我一样在狱中，但他并不和我一起住在欧洲人、亚洲人和欧非混血种人的监禁区。他被关在单独的所谓“禁闭室”中，显然是要把我们分隔开。

六点钟，我的早晨开始了。这时，我自己房间南边两扇门的大锁被打开时所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声音，宣告了监狱长的来临。然后我的房门被打开了。几乎毫无例外地，那个非洲看守人总是怀着敬意悄悄地向我问候，然后就退到门口。一到他认为那个欧洲监狱官一定会听见他的声音的时候，他就提高嗓门，同时用他那异常大的一串钥匙在门上碰撞，发出奇怪的响声，然后用非常刺耳的声音叫喊着，“伍卡，伍卡，伍卡”，意思是“起来，起来，起

来”。欧洲监狱官然后走进房间，迅速地向四周一看，并问：“一切都好吗？”我就回答说：“好，谢谢，长官。”由于我担任了欧洲人、亚洲人和欧非混血种人监禁区的厨子，我就急忙跑去，象我们经常说的那样，“烧旺炉子”。我们的早饭依照口味而不同。我要准备一些东西，如茶或咖啡，玉米饭和麦片粥。然后我开始洗锅、盘、盆子。当别人都排队出去做工时，我就开始把地板擦亮。监狱长通常在九点钟左右来巡视。当他来到我所管的范围时，约十点钟左右。他就象所有他这类人那样，对任何一点肮脏，都有非常敏锐的目光。我通常把一切东西都弄得干干净净，然后他会提出一些建议还应当做些什么，这实际上就是命令。如果他感到满意，就会说，“好，要保持清洁，卡翁达”，从他那低沉缓慢的声音中，可以辨别出在满意中带着一种还有改进余地的感觉。还有一个监狱官，我记得很清楚。他是个苏格兰人。他在执行职责时非常直率。当他发觉我几乎常常边工作边唱歌时，他就对我说：“唱吧，继续唱下去消磨你的日子吧，卡翁达。”当他巡视后，他就会满意地告诉我说，他从来没有看见厨房搞得这样清洁过。我就对他的评价表示感谢，然后他就走了。但是他对监狱中玩的花样却是眼睛雪亮的。至于我在狱中的同伴，我记得在我们这区没有一个人不和我友好的。我们相处得很好。有几个人善良而表示忏悔。他们深表歉意地说，他们了解我入狱的原因和他们是不同的。我可以看出他们竭力想安慰我，虽然我一点也不需要什么安慰。

这里也有属于无可救药类型的囚犯。这些人喜欢吹

嘘自己的辉煌事迹，我们其余的人就坐着听。我记得有个这种类型的人告诉我们说，他坐牢是由于和南罗得西亚金矿有关联。但据我们所了解的真相是，我们这位朋友是因盗窃罪而被第九次判刑的。人们可以看出，这些是人类非常可悲的问题，需要我们同情而不是愤怒。

从十二点半到两点钟之间，是我们的午饭时间。我这区的同伴们吃肉，我吃鱼。我们也有蔬菜、米饭、豆类、炼乳、奶酪和黄色糖浆。按照当时的规定，我要比白人、黑白混血种人少四两糖、奶酪和鱼。午饭后不久，我被吩咐去冲洗我们那个使用老式水桶的盥洗室。然后我就要开始准备晚饭，晚饭与午饭大体上没有什么不同。五点半我就开始在院子里踱来踱去，当卫兵或刚来的犯人打开那扇小门进来时，我就可以看到一点点外面的世界——自然界的缤纷彩色。否则我所能看到外界的一点点景致，就只是一棵穆沃姆包树（一种生长纤维的树）上的几根树枝，这棵树恰巧在我牢房的后面，当我在院子里前后来回地踱步时，就能看到它。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个小朋友，它可是不认识我。它是一架小飞机，差不多每星期日都飞过我们监狱的上空。下午四点钟左右，我就站在院子里等着，向这架小飞机挥手。我想这一定是属于一个卢萨卡飞行俱乐部的。当我们非洲人监禁区中的大部分同伴进入他们的牢房时，还有几只十分可亲的喜鹊飞来向我们问候。这些鸟儿飞得离我们很近，仿佛在对他们说：“我们从外面带来了问候。”卫兵一来，他们就飞走了，仿佛在说：“这些人我们信不过。”

他们不准我和任何非洲人囚犯讲话，至于非洲看守

人，除了在我这一区执勤的以外，我也不能和他们中的任何人讲话。但在狱中，一个人可以学会说各种语言。有正常的口说的语言，还有用手、手指、眼睛、头和腿说的语言。因此，当我在卢萨卡监狱第一天早晨起床时，我的同胞黑人囚犯们要向我问好时，主要用这些不是口说的或象征性的语言，这些语言是任何人都很难察觉的。在狱中，狱囚间传递消息的工作是做得极好的。狱囚之间团结一致的精神是可佩的，除非他们是敌对者，或者对一些事情没有相同的见解。虽然在看守人和囚犯之间的确也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友谊，但它是因情况而不同的。进行暗算的事也是常见的。举个例说，如果一个看守人对待他管的一群囚犯极其残酷，那么他多半会发现自己中了别人的巧计而陷于困境，而且几乎使他无法脱身。另一方面，看守人最喜欢把和他们私仇最大的罪犯安置在一些犯人中间，让他们处于极痛苦的紧张状态里。结果往往是双方达到互不妨害的均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必然会发生麻烦。

我在卢萨卡中央监狱刚开始安定下来服我的九个月刑期时，我的一个情报人员向我告警说，我将被转移到索尔兹伯里中央监狱去。第二天早晨，我们中的四个人被监狱长挑出来，叫我们穿好自己的衣服。我和威尔逊·沙库勒亚手铐在一起，他是因扰乱治安罪而被判刑十六个月的。他是我们布罗肯希尔区的书记，也是中非公路保养工会的总书记。穆努卡荣布瓦·西帕洛和一个名叫希尔瓦的人手铐在一起，这个人因被控使卢萨卡附近某地的火车出轨而判刑二十年。从卢萨卡到索尔兹伯里的旅

程中平安无事。我们坐的是二等车，因为他们告诉我说公共汽车上没有欧洲人乘客。沿途的乡村已从雨季美丽的绿色变为七月的深黄色了。我非常欣赏这些景色。也许是由于我被监禁在狱墙内，再加上我在卡崩波养成的对自然界的热爱，因而使我对沿途两旁的深黄色这样注意。我们到的第一站是奇伦杜。在我们到第二站卡罗伊时，我们要求卫兵除去我们的手铐，这样我们可以自己照管自己，但是他拒绝了，因此我们就这样旅行，一直到索尔兹伯里。我们到达新的住处时已很晚了。我们中任何一个人都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一个监狱。从大门口到我的房间，大约有十扇门。这座房子是这样庞大，当然除去它的古怪的围墙外，人们会认为这是一处高等学府。西帕洛说，这个地方是可怕得连最野性的象也会被驯服的，他的话经常逗得大家发笑。

一到那里，我们就被指定住到收容病人和供过境者住的厢房中。早晨，发给我们一套专门给印度人和欧非混血种人穿的被称为上等的制服。然后我们就被关进了各自的房间。这使很多人觉得非常奇怪。我记得有一个监狱官走过来，显然是急着想要看一看“这个捣乱分子”是什么样儿。大概是出于某种我无法知道的原因，他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总是躲躲闪闪地，我猜测，可能上级对所有的人都发过指示，在负责长官发布命令前，不许访问我们。虽然如此，当我的朋友躲躲闪闪地走向我的牢门时，我就从看守人和囚犯们讲话用的象平常鸽笼门似的小洞中看到了他。由于他在注意外面的人，因此他没有注意到我在注视他。直到他离我差不多只一呎

时，才觉察到我在看他，可怜的家伙，他一觉察，马上转身就逃了，这次他是笔直走的。实际上，就我在狱中的健康而论，他后来成为一个对我很有帮助的人。

当我在办公室报到去见负责长官时，他简单扼要地向我指出我所应该注意的事情。实际上，其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想，他是非常通情达理的。说到工作，他指示我应参加书籍装订组。

虽然我们在工作时旁边都是非政治犯，但有些监狱官一定要我们凡是在列队放风时都不能与他们任何一个人排在一起。我们待在那里的第二或第三天，恰巧是一个最难打交道的监狱官值班。当我们列队走过去时，他看见我们站在离普通囚犯队伍末尾的一个人五码左右的地方，他就用最高的嗓门喊着：“库……安达，到后面去，你带着他（指西帕洛）一起去，要不然，我要砍掉你的腿。砍掉你腿的时候，我将面露微笑表示没有什么真正的仇恨。”这个人原是肯尼亚人，他是负责供应如牙膏之类东西的人。他足足有三个星期不供应我非常需要的牙膏，我就不断地向监狱长提意见，直到他进来命令这个官员给我一支牙膏。这个家伙离我牢房还有二十码左右就开始喊着：“库……安达，库……安达，库……安达。”我不回答，他就说：“人们叫他库安达的那个土著在哪儿？”于是我说：“我在这里，长官，有什么事吗？”他走进来，盯着我看，眼里充满忿怒。当他自己感到满意了时，他把牙膏扔给我。我说：“谢谢你！”他却这样回答我的谢意说：“不要谢我。我是不给土著牙膏的——去谢监狱长吧！”我报以一笑。他向我做个鬼脸，走了。

早晨一开始我们就吃早饭。因为玉米粥使我的胃非常不舒服，所以食品中没有麸皮面包时，我就不吃东西，除非我们有麦片，当然，麦片是非常少有的。我对这事并没向监狱长诉说过，因为他对我们非常好，只要可以避免，我们总是不愿找上他。我记得，每当我对他的优待表示感谢时，他就回答说，他只不过是履行职责罢了。他对别人的关心，比狱中任何人对他的关心，总是要加倍的多。他说，他这样对待我们，只不过是相互的。但是，除了上面很少的几个负责人外，他的大多数部下都抱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尽可能地折磨我们，但是，我想，我们做到了不给他们得到他们所寻找的可以尽情虐待我们的借口。记得有一天，我们受到了一个联邦部长的正式访问。他没有到我们的工场间来，但当他们一行人离开我三十码左右时，监狱长大声叫我。监狱管理局长把我介绍给部长，部长说：我们虽都来自北罗得西亚，但我们从未见过面。他又说了一句：“我知道你在这里是一个模范囚犯。”我向他表示感谢，回答说：我不知道我是一个模范囚犯，也许监狱长和监狱管理局长知道的。监狱长就开玩笑似地说：“先生，这个人到这里，是因为阴谋推翻大英帝国。”部长回答说：“这对他今后的职责应该会有所帮助。”我们简短的闲谈就这样结束了。当他们继续向前巡视时，我就恭敬地退出了。

早饭后，我们就列队放风准备去工作。一个人在监狱中往往是在今天不知明天事的情况下过日子；而当一个人被转移到一个新监狱时，这就更糟了。在卢萨卡监狱，我们免除了一个可怕的惯例，那就是要我们被剥光衣

服，屈辱地抬起一条腿跳上跳下，以证明两腿中间并没有夹带东西。我知道，这个可耻的惯例，正象我们所受的许许多多侮辱一样，是从南非共和国那里来的。按照这里的惯例，白人囚犯是免除这种做法的。我们到索尔兹伯里监狱的第一天，我们不得不费了很大的力，不但为了保卫我们自己，也是为了监狱中的和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同胞们不顾我们对他们的请求，已经准备好，倘若任何一个看守人企图把我们剥光衣服，他们就来进行一场赤手空拳的大搏斗。幸好，监狱长在办公室里，所以当我们将提出反对时，很快就传到他那里，他就决定我们应该免除。至少我们暂时松了口气。两星期后，我们落入了邪恶者手中。一天下午，有个我们从未见过的白人看守人进来，看见我们正打旁边走过。他对我们大声吆喝，并且命令我们站住，好让他们把衣服脱光。我们一动不动地站着，但是没有一个看守人走近我们，因为几乎所有在场的看守人都已开始了解我们了。然而，正是上帝安排好的，唯一的高级非洲人看守（我记不得他的正式军衔，但我想他是个少校）插进来调解，向这个白人看守解释说：是监狱长的命令，叫我们不用剥光衣服。这个白人看守嘟囔了一阵，我们才被准许走开。

早晨七点钟，我们列队放风以后，就到我们的工场间去。我们很高兴去学习装订书籍，这是非常有趣的。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是我们吃午饭的时间。最后在下午三点到四点之间停工。然后我们就开始大忙特忙，因为我们大家都必须在五点以前准时回到我们的牢房里。我们谁都必须匆匆忙忙，因为我们必须把肚子里的东西清除干

净,以便度过长夜。虽然我们室内有便壶,但关在发出臭气的牢房内约十五小时,这并不是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但我们幸好能充分地组织好,所以没有碰到这种倒霉的事。

我们在狱中读到了大量的书。我们提出了一项特别请求,要求另外给予阅读时间,监狱长很好心地另外给了我们一小时。当时在非洲教育托管部工作的琼·E·威肯小姐设法使我得到了拉斯金学院的初级经济学讲义。基督教公谊会的乔治·洛夫特先生帮助我们从他图书馆和美国外借图书馆借到了相当多的书籍。我们从印度助理高级专员的外借图书馆也弄到了一些书。相当多的朋友如福克斯·皮特司令官,盖伊·克拉顿-布罗克和其他许多人,应我们的要求,都寄了书来,监狱当局相当友好地加以检查后准许送进监狱,书籍很多,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给人相当深刻印象的图书馆,其中还包括我们被准许从装订工场借来的书。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这一段时间是非常有益的。P·J·沃尔什长老当我在卢萨卡监狱内时曾帮我弄来过许多书籍,此时又非常同情地用车子把我的妻子和第六个男孩从卢萨卡送到索尔兹伯里来看我。他们准许我在一间给白人和黑白混血种人会见家属的房间里,会见我的妻子。只有到过索尔兹伯里监狱并看到过黑人囚犯是怎样被安排去会见家属的人,才能体会到准许我这样会见我的妻子,我是多么感激。我在这里还应提一下这个事实:我的朋友从世界许多地方寄来的信,我都收到了,对此,直到现在我还是感激的。在狱中得到一封亲爱的朋友的来信,真是无价之宝。大部分信件我至今还保存着。这些来信是有特别的价值的。

我记得另外一件事，是我们一个月可以看一次电影。这是有双重意义的。首先，我们非常爱看这些电影；其次，我们待在露天的时间比平常长，因而感到夜里时间短些，事实上，在这些晚上，我们可以看到夜晚的天空；而看看夜晚的天空，听着远处传来的狗叫声，在这可怕的狱墙被去除以前，一直是并将继续是我们的稀有的乐事。监狱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可怕的地方，但是对我们中间一些参加公众事务的人来说是有它的特别意义的。在监狱里，我们看到一些上帝的儿女，他们比那些每当法庭开庭时聚拢来的人更加需要照顾和关心。在我看来，这些人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我们从精神、道德和物质方面给予关心，就象一个人患了急性肺炎需要医生一样。

监狱，人们可以把它描绘成是黑暗社会的大本营。这里有一大群人，他们本身就是人类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他们是这样一种混合物，除了说他们对我们是一个挑战外，人们不知道应如何去形容他们。我相信，世界上各处的罪犯都是这样的。但在决定应当如何去帮助他们时，一旦种族问题占了突出的地位，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了。

一个人为悔罪而进监狱，这意味着到那里去是有目的的。我能注意到，这里有一些最可怕的事情，如果当局对这种情况采取一些措施的话，本来是能够纠正的。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把政治犯与怙恶不悛的罪犯混杂在一起的原因。英国殖民官员总是辩解说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政治犯，因为他们所监禁的人都是犯一般刑事罪的。那么，就以我这样的一批人为例，来说明我的意见吧。威尔逊·沙库勒亚因危害治安罪而入狱，穆努卡荣

布瓦·西帕洛也是这样。我是因图谋不轨和授权他人召开非法会议之罪而入狱。所有这些都是政治罪，虽然我犯的罪从法律上来说不能算作政治性的，但是我们这些人都和其他囚犯混杂在一起。政府当局以此来回避这个问题也许是一个聪明办法，但这是深刻的人性问题，任何负责的政府想通过法律上的诡辩来托词回避问题是不对的。

在任何战争中，战俘总是单独监禁的。我认为，象我们这类自由战士，是在和他们的“政治统治者”“交战”，唯一的区别只在于它不是开枪射击的战争。他们并不组织起来去杀人，但他们是自己的和人民的权利的保卫者，这一事实使他们并不比那些受训练去杀死自己同胞的士兵少值得尊敬些。我知道我这种说法不可能在世界上最得人心，因为这个世界对暴力活动充满着敬意，而对非暴力主义却只是给予口头上的敷衍。

我说过，监狱是黑暗社会的大本营。在索尔兹伯里监狱的几个月中，我有可怕的经验，我看到十五到二十岁之间的第一次犯罪的青少年入狱服刑几个星期，而当他们出狱的时候，他们竟学得这样道地，以致他们第一次释放后没几天，就又回到监狱来服更长的刑期。这是怎么回事呢？当这些可怜的男孩子初次进狱时，他们是如此惊吓，因此任何人向他们提供保护，他们就非常快地接受了，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需要保护。但是那些向他们提供这种保护的人，这样做是心怀恶劣动机的。如果一个男孩想要反抗，他的这个所谓保护者，就给另外的人布置好去狠揍他一顿，而恰恰就在这时刻，他出来向男孩

提供保护,这样,这男孩就会顺从他的不正常的欲望。这些怙恶不悛的囚犯的组织是这样有效果,以致看守人公然地或者在暗中同意这种行动。从此以后,这个男孩就被人当作“老婆”看待,他可以得到在严格狱规下私下带进监狱的食物和其他日常生活必需品。当然,有些成人也确实同意充当妇女的角色,而根据我可以观察到的和从同我们一起装订书籍的白人那里听到的来看,在白人囚犯中也同样如此。据我的观察,我可以肯定,监狱中大部分的打架事件,都是由于对受到这种待遇的男孩的争风吃醋而引起的。

晚上有“讲演”。囚犯们讲他们的事迹中最离奇的故事。这些故事经常在工作场所,在星期六或星期日和每一个恰当的时机被反复地讲述,以致这些故事深深印入到这些少年和成人的脑中,这些成人也可能是政治犯。当然,有些离奇的故事是真实的,而有些只不过是根据“理论”编造出来的,“讲演者”希望别人把这些“理论”付诸实践。这样,正派的社会就变得越来越糟了。

在我们这样年轻的国家里,要千方百计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力量够不上呢?我知道,受过专门训练干这种工作的人,也许已为此工作到深更半夜,但这并不能阻止我这样的门外汉来议论它。事实上,促使我这样看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我确信现在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帮助罪犯们。而且,我还确信:如果我们真正努力去挽救他们的话,象我在这里称之为怙恶不悛分子的那些人,其中许多人并不是一点不会受正常社会的影响的。我也认识到,就非洲人来说,监狱外面的社会是那样污秽,以致

索尔兹伯里监狱中有些囚犯经常坦率地说，他们在狱内的境况只有比在监狱外面好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他们认为，他们永远没有希望找到工作，他们经常为了护照、税收的收据和许多其他东西而被警察所折磨。一个迫使一部分公民产生这种想法的社会，是腐败的，必须被埋葬掉。在这一点上，我们犯了严重的罪，我们不得不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除非变化很快到来，对这个问题差不多立刻采取完全不同的解决办法。当我在讲这些话时，我一点也没有鬼迷心窍，我是以事实和数字作为我的论证的根据的。想想那无法进学校的千千万万的男女儿童吧。怎么才能阻止成千的人从这个黑暗社会“大学”里“毕业”呢？

我对监狱中的同胞讲了这么多意见以后，我应该讲几句关于前来探望我们的宗教界人士和法官的活动。这样才是公平的。据我的观察，我可以看出这些人是真心诚意的，是想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的，并且我相信他们中有些人离开时，是带着一种他们正在帮助这些较为不幸的同胞的心情的。但我感到遗憾的是，他们得到的效果是极微的。每星期日早晨，牧师们前来给予我们精神方面的帮助。囚犯们只要愿意去做礼拜的，都被准许走出他们的牢房，我想我可以正确地说，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出来了。在第一个星期日早晨，我们注意到，在某一个角落里聚集着一大堆人，比其他处五、六堆的人合计起来还要多得多。主讲的人必须大声叫喊，人们才能听到。我想，那是狱中一个非常得人心的教堂。第二个星期日，同一个角落里人群非常拥挤，但是使我感到意外

的是，这次是个从和上次不同的教堂来的不同的牧师在讲；在第三个星期日，我注意到同样的情况，那里聚着一大群人，然而却是从另一个教堂来的第三个牧师在讲。我们开始感到不可思议，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们才发现，这并不是由于哪一个教堂得人心，而只不过是因为在监狱院子里这是阳光最充足的角落。任何一个牧师选择了这个地方，就可以肯定获得很多的听众，我不知道牧师们自己是否知道这个情况。我甚至不知道包括哪几个教堂，既有黑人教堂又有白人教堂。这种继续不断的讲道，也许可能使有些人转变到正确的思想和正当的生活方面，并信仰主和基督；但是一个星期日接连一个星期日，我们坐着和听着，我注意地看着，可是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发生。那些品行值得称赞的人，来到监狱也几乎总是品行好的。目前的问题是在这里：这些牧师是否知道，他们讲道的这些对象，并不是真正能领悟神的启示？特别是关系到这种类型的罪犯，检查一下讲道的成败所在，难道这不是基督教教堂的职责吗？所有这一切是否也发生在其他监狱中呢？如果回答是“是”的话，那么，显而易见，对此必须设法改进。

至于来访的法官，在我两次进狱的时期里，这些很少来的访问者中，大多数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这方面大有改进的余地。我必须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这些知道自己为什么入狱的人，从这些法官那里是能够得到或者可望得到帮助的；但是那些最需要他们帮助的人，也就是那些在这样一种地方感到不知所措的普通人，却甚至不能接近他们。事实上，连法官为什么到这里来，他们都不知道。

这些人可以成为一种向善的力量，只要法官能降临人间。我不知道他们如何对待白人囚犯的，但是我能根据他们如何对待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这一点，就可以推测白人囚犯一定比我们得到更多的关心。人们也许可以这样辩解说，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内，狱中都有大量的非洲人，因此，数量上要少得多的白人囚犯受到更多的关心，这个事实是合理的。照此类推，也可以说，由于同样的理由，有主张的、受过教育的黑人囚犯数量不大，因而得到某些关心。这是现代社会的许多悲剧之一。它们倾向于丢下这些最弱的人，随他们自己管自己去。如果任何一个社会有权要求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么，肯定的，它必须准备去解决这一类的人类问题。这里的麻烦是，除了一个经费不足的社会福利部所作的一些半心半意的努力或尝试之外，据我看，那些当权的人们甚至不知道存在着这个问题。我深信，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可以挽救的，如果我们医治这些人的道德和精神上的病症，能够象医生治疗严重的肺炎一样认真负责，因为得了这两种病症，人们都将死去。所不同的是，一种病症是使他们在肉体上死亡，而另一种则是在道德上死亡。

一六 联合民族独立党^①和教会

12月18日，他们通知我把储藏室里的衣服取出来熨平。我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记不得是当天夜里还是第二天清晨，他们通知我说我将回到北罗得西亚去。原先，我本来应该和一个看守人一起坐飞机走，但是那天飞机上只有一个座位，于是他们准许约翰·莫法特爵士让我搭乘他的汽车回卢萨卡。我们的身子把约翰爵士车子的后座塞得满满的。我记得，当我们驶过三百多哩路，路两旁所看到的全是我们十二月份的一片绿色时，我是怎样又一次恢复了活力。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最难忘却的几次乘车之一。我要感谢约翰·莫法特爵士，由于他这样帮助了我，使他遭到约翰·冈特先生猛烈的公开抨击。人们将会理解，我对此是多么感激，因为已足足有五个月把我和自然界的美丽景色隔离开了。在路上我们停下来吃午饭，深夜我们才到达卢萨卡。我回到我所熟悉的牢房。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只是，我必须怀着感激的心情提及几个来访问我的好心的朋友，如E·G·奈廷格尔牧师，P·J·沃尔什长老，监狱援助会的几个成员，哈里·弗兰克林先生，此外，当然还有我的许许多多非洲同胞们。

^① 赞比亚现执政党，1959年10月，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被禁后，改此名。——译者

1月9日，监狱的大门打开了，我会见了我的律师、一个新闻记者和一个摄影师。我被提前一天释放，因为10日是星期日，星期日是不释放人的。我立刻发表了下列声明：

“自由了！我所要向北罗得西亚非洲人要求的是，必须保持镇静和忍耐；必须为摆在他们面前的真正的非暴力斗争作好准备。

“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被禁止了，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禁止我们要求获得自由，要求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在这一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将正告现在的统治者，他们应该认识到，肤色不是应该考虑的问题，应该考虑的是人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北罗得西亚的非洲人民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而去获得权力，而是因为我们深信这是解决我们问题的办法。

“我准备团结所有那些内心愿为人民谋福利的非洲人。只要我确信召开一次领导人圆桌会议并不仅是为了向全世界表示我们北罗得西亚非洲人的领导人能聚集在一起的话，那么我对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将予以支持；我希望看到达到真正的团结。

“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坚决地要在这个国家里实行非洲人自治。拘留、监禁和把我们放在农村地区限制行动自由只能拖延而不能阻止我们去达到这个目标，这个目标一定要在今年即1960年达到。

“我再次重申，北罗得西亚非洲人必须忍耐。我们将和英国政府和总督在这里举行谈判。我要求现在就修改宪法。我听说新的殖民大臣伊恩·麦克劳德是一个十分

通情达理的人。我确信他将会持同情态度。

“我们即将把我们的宪法建议提交给他，这个建议将在1月31日召开的联合民族独立党会议上草拟出来。现在是把权力从少数人集团移交到大多数人手中的时候了，我这话的意思就是实行成人普选权，就是人所共知的‘一人一票’。

“我希望通过非暴力斗争能达到这个要求。因此，我要求你们大家要镇静，忍耐，不采用暴力。我知道你们的内心怨愤。我知道你们已经镇静和忍耐了一个长时期了，但不应该因此就使你们采取其他行动。愿你们给予我们团结一致的支持和忠诚，而我们作为领袖，将采取非暴力的方法，为我们理应得到的自由而斗争。”

我出狱了。1月31日，由于迈因扎·乔纳兄弟欣然俯就党的副主席的职务，我被全体一致选为联合民族独立党的主席。

我一开始在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就发现，北罗得西亚警察每次集会都必到场，这很容易导致暴力行动。1960年1月的最后一天，在卡布瓦塔，我在我的支持者的一次热情洋溢的集会上发表演说。管磁带录音机的警官几次来到讲台前调节扩音器或记下演讲者的名字。每次他都遭到人群高声喊叫表示反对。一刹那间，管录音机的警官和我的一些拥护者发生了争吵，后者堵塞了他前往讲台的通道。我费了最大的力气设法控制了群众，但我继续坚持我们的非暴力政策。记得我当时说：“假若因为我们贯彻这个政策，你被抛到空中，摔在地上，你就说：‘杀死我吧，但是我将获得自由！’”我决心要把甘地的非暴力

政策和恩克鲁玛的积极行动结合起来。

在整个时期，我都意识到这种可怕的危险，我们党内有些年轻的极端分子正日益失去控制而将引起骚乱。在任何民族主义者组织内，总有一些“强硬分子”，他们硬要加劲快赶，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对待他们的方法。我认为英国工党用的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在那个党内，你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人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然而他们所有的人都尊重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如果我们渴望宪法的民主扎下根来的话，这就是我们非洲的政党内必须发展的艺术之一。“一人一票”现在是我们的口号。我们应该强调，也确实强调这个“一人一票”的重要性，并不是仅仅在实行普选的时候，而且这还是解决我们党内争端的唯一公正的方法。一旦这一点被大家所接受了，结果必然是，一个纪律性强的党会使其多数所作出的决定具有约束力。当然，这是假定那些“强硬分子”是处在少数地位。另一方面，如果那些“强硬分子”故意漠视大多数人的决定，那么他们就必须因之受到纪律制裁。

约翰·莫法特爵士这时在北罗得西亚立法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动议，指出：反对联邦的人已经增加，很明显，目前这种联邦的形式不能再维持下去了，要求建立一种大概能被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的邦联。他的动议以二十一票对七票被否决。这使我比以前更加相信，在现行宪法的约束下，要想在立法会议中进行斗争，是永远不可能获得自由的。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党为强制修改宪法而进行斗争。

我决定彻底反对中非联邦。我不是在原则上反对联邦，而是反对那已经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联邦。我拒绝给蒙克顿委员会提供证词。我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已全部写进当时我写的《黑人政府吗？》一书中。

在3月底，我写信给殖民大臣伊恩·麦克劳德，列举我要求修改宪法的理由：

“我们已经提出了要求立即实行自治的立场，但是我愿意扼要地叙述这一立场如下：

1. 我们确是要求文明地把权力从少数人集团转移到多数人手中，这不仅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管理自己是上帝赐予任何民族的权利，而且还因为我们十分真诚地相信，如果要创造一种发展和开发我们丰富的自然资源所必需的种族和睦和安宁的气氛，那么一定要由多数人来统治。

2. 那些当政的少数人集团不必害怕他们的利益会遭到损害，因为当我们说我们相信‘所有的人都是生来平等，而且都赋有包括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时，我们的意思是，这适用于地球上所有的人，不论他们的种族、信仰等等。我们并没有意图要用我们自己的一种压迫形式来代替现有的压迫形式。作为我们善意的标志，我们曾建议，如果你们信不过我们的话，那么，仍可保留总督、首席阁员、财政部长和首席检察官，作为对少数人集团的一种有效的保护措施。这本身就充分证明了我们确是说话算数的。

3. 应注意到这一事实,即在北非和南非发生的事情正在深刻地影响着这里的形势。我这话的意思是指我们在刚果和坦噶尼喀的非洲同胞正在获得独立。我们的人民中有些人在刚果和坦噶尼喀有部族同胞和亲戚,这一事实十分自然地增加了这里的不稳状态。维沃尔德政府射杀无辜的非洲人也是于事无补的。

4. 国务大臣在北罗得西亚仅仅逗留十天,在尼亚萨兰逗留十天,这对相信非暴力斗争的北罗得西亚非洲人的领导人来说,是一种轻视态度。人们正在把这解释为,只有在发生了流血事件时,英国政府才会采取行动。要澄清国务大臣在正常情况下或许能迅速接受的这种行动的不幸的解释,我相信,国务大臣如宣布在今年10月以前邀请所有有关的党派开一个讨论宪法的圆桌会议,是可取的。这将能平息非洲人的恐惧和担心。

“阁下,请允许我在最后这样说,‘多元社会’‘伙伴关系’‘多种族社会’之类的神话,一直是意味着外来种族统治我们土生土长的人民。对肉体上和精神上确实感到紧张的我们来说,这些说法等于是‘白种人优越’的一层薄薄的伪装。

“阁下,摆在英国政府面前的任务是作出选择:及时地,意思是马上行动,建立起一种真正的英国生活方式,就是使每一个二十一岁及二十一岁以上的公民成为权力的来源,因而建立一种使所有人都感到幸福的民主政治,英国定然仍是人民的朋友;否则,就是去取悦于少数人集

团,这意味着继续维持现状,结果必然带来痛苦的种族冲突,而英国仍然永远是非洲人的敌人。在任何情况下,我想,要倒转时势的潮流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可以根据你在其他国家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来判断,我想没有一个人会比你更明白,时钟是不可能再拨回去的了。

“我们已经表明了我们是有一个有忍耐心的和长期受苦难的民族。我们是人道主义者,对于一个人的肤色我们是不在意的。我们对基督教关于人的概念是赞许的。正是由于这样一种信念,我们正得到越来越多的欧洲和亚洲自由主义者的支持,但由于联邦总理罗伊·韦伦斯基爵士所造成的局面,他们目前不会公开出来表示支持。”

当我决心要使宪法得到修改时,欧洲人却决心要维持现状。1960年3月初,在基特韦,北罗得西亚统一联邦党领导人约翰·罗伯茨先生曾说:“我现在说,并且我有充分理由如此说,英国政府方面在目前议会的任期内,没有任何愿望或意图去审查目前的选举权或宪法。”这意思是说要再过四年。同时,在约翰·冈特先生领导下的更加极端的欧洲人正在成立他们所谓的“北罗得西亚联盟”。有一千多白人聚集在卢萨卡最大的电影院中听取约翰·冈特号召他们“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

我曾被邀请到美国去,途中我决定访问伊恩·麦克劳德,要求他给我们一部新的宪法。当我正在伦敦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位欧洲妇女伯顿夫人的可怕的死讯,她的汽车在一次政治集会结束后被焚毁了。迈因扎·乔纳在我正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感到非常

震惊，很难找到适当的话来表达我的心情。我说，我不知道这事是谁干的，不知是我党的追随者呢还是什么不知是谁的无赖。不管是谁，我感到非常遗憾。当我这些话在北罗得西亚发表出来后，立法会议的一个委员说，这些话是“真诚的反面”。我有时感到怀疑，我公开谴责暴力行动是否有什么用。如果我保持沉默，人们说我是宽恕暴力；如果我谈了它，人们又说我不是真心的。北罗得西亚韦伦斯基党的领导人约翰·罗伯茨先生在评论我关于伯顿夫人之死的声明时，说：“对于仅仅是公开地肯定非暴力，我是一点也不相信的。不法行动正是从宣传仇恨的联合民族独立党的集会上产生的。就在这些集会上，其中许多是在狂饮啤酒后举行的，在听众中激发起一种歇斯底里的狂暴精神。”当一个人被别人说成这样的时候，有时的确会忍不住要问一问：如果我们尝试运用暴力，而不是始终设法防止暴力，那么，真正会发生些什么。

这时，我很欣慰地得悉，有些教会公开表示反对联邦。许多传教士原来受了“伙伴关系”论的蒙蔽，因而相信联邦会对我们有好处；但他们中许多人逐渐清醒过来，懂得了我们一直来感到怀疑是应当的。有一天，我很受鼓舞地读到《北方新闻》上刊载的铜带区五个牧师和一个非神职人员代表联合教会内非洲人会员所发表的一个直率的政策声明，他们在声明中说：“帮助和平地结束目前的联邦形式是我们的职责。我们象一些政治集团一样，决心要看到这个没有得到大多数人同意、不经审讯就拘禁人民、不去消除种族歧视而实行统治的政府宣告结束。”

联合教会呼吁最大的非洲基督教教会也仿效铜带区教会。他们的声明毫无保留地支持非洲人要求自治。

这个声明宣布铜带区非洲教会对象克顿委员会的非正式抵制，“因为征询内容内并不容许人民对联邦问题说他们所要说的话。”非洲教会会议仅仅向该委员会送了一个书面抗议，拒绝到委员会去提供意见。

在这儿，我要离开本题对教会和政治发表一点我的意见，因为这对将来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正如我已经叙述过的，我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中长大的，我的基督信仰现在已成为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了。向上帝祷告，祈求他的指引，仍然是我的习惯。我并不认为我曾经认真地对福音的真理发生过怀疑，但当我看到北罗得西亚那些有组织的教会今天讲的话，有时我当真发生疑问，这究竟是否的确是上帝对我们说的。可能有一大堆充足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基督福音是以西方“教派”的形式来传给我们的，但我看不出有什么充足的理由可以解释这些同样的教派现在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当这些从西方来的新的教派在我们城镇中出现时，我们愈来愈感到惶惑。仅仅在卢萨卡（欧洲人居民是一万四千人），每星期日要为欧洲人举行十七个不同教派的礼拜，这我怎么能相信这些基督徒们的虔诚呢？这种教派的蠢行是对基督教义的极大的罪过，它使我自己和我的人民感到莫明其妙。我在卢布瓦的那些日子，我曾开始对教会生活中某些事情似乎和圣经中基督的教导相矛盾而发生过疑问。我不明白为什么欧洲人传教士在教堂内应该有特别的座位，为什么保罗·穆希杜牧师来去都是步行或骑自

行车，而欧洲传教士却是坐汽车。

我感到自己是在一种精神的荒野里徘徊，我变得十分怨愤，这在我 1952 年 3 月给卢布瓦传教士们的一封信中所摘引的下面一段话可以充分说明。我那时正在读萧伯纳的《命运的使者》，我写道：

“当（英国人）需要一个新的市场来推销他的低劣的棉纺织品时，他就派一个传教士去向土著传布和平的福音。土著们杀死了这个传教士，于是他就急忙武装起来保卫基督教，为它而战斗，为它而征服，于是他从天国那里得到了市场作为一种酬报。”

虽然我早年曾反对过传教士，但我知道基督教对我们的政治运动是有一些重要的意见要说的。我们一直期望基督徒能支持我们的斗争。

1953 年 3 月在基特韦召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会议上，我们曾决定号召我们的人民举行两天祈祷，祈求上帝在我们反对联邦的斗争中帮助我们。所有各教会（当然非洲美以美会除外）都置之不理，并且说：非洲人国民大会无权号召人民去祈祷。只有总督才能做这样一件事情。每个传教士都按各自的主张行动，这从两兄弟对这件事所表现的完全不同的态度上看得出来。其中一个此时在卡富韦职业学院和职员们一起举行祈祷，而另一个在蒙布瓦却将一个教师由于那天缺勤而解雇。我们国民大会的主席哈里·恩坎布拉先生在祈祷日后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在声明中说：

“两天的全国祈祷日结束了。我必须感谢在那些日子里祈祷的人。政府宣称国民大会故意确定这两天向上

帝祈祷，目的是要瓦解国家的经济。我必须告诉政府，这是对国民大会计划的误解。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决定这两天举行全国祈祷，目的是祈求上帝在他们反对联邦的斗争中给予帮助。他们告诉人民，要怀着极大的虔诚来进行两天的祈祷，并要求人民避免任何可能导致骚乱的活动。我对在这两天奉行祈祷的人们的合作，表示深切谢意。

“撇开崇拜上帝不谈，这两天对非洲人反对联邦者是一次考验，同时也可看到政府和雇主们会有什么反应。我对政府和雇主们在这次全国祈祷日所作出的反应，不能不感到遗憾。政府指令雇主们解雇那些奉行祈祷的人，而且还把他们逐出住处。我确信我这样说不能算太错，那就是：政府企图威胁为反对联邦而斗争的非洲人，而且煽动人民反对国民大会。”

在 1953 那年，我们因联邦的强制成立而深感痛心，我们对于对我们的任何攻击都非常敏感。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是为一项正义事业而斗争，但是正是那些以上帝的父权和人的尊严的意义来教导我们的教会，却看来在反对我们的斗争。

1953 年 12 月 10 日至 11 日在“前阿斯卡里纪念大厦”举行的地区泛非会议的会议记录，清楚地表明了那时候我们决没有反对基督教。我们邀请了非洲美以美会的迈姆贝先生参加我们的会议，他的演说详细地记在会议记录中。他所说的话很值得一提，因为它驳斥了经常说我们是反对基督教的种族主义者的那种非难。

“我们都是兄弟，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共同合作。没有任何人可以恨他的同胞，或想阻止他的

进步，或想禁止他享受他的国家所有的一切果实和权利，以及基督的拯救。

“我们由于肉体的降生而成为人间父母的子女；从一种特殊的意义上说，我们也由于精神上的诞生而成为上帝的子女。在那种精神的关系中，所有的人都应该生活在和平和慈爱中。假若人们不是属于我们的种族、肤色或民族，我们决不可以恨他们，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子女，而上帝的子女必须合作，排除心中的恶念，彼此之间不要作对。

“我相信这是今天在这里举行的泛非会议的目的。白人和黑人应当共同生活和工作。白人不要反对黑人，黑人也不要反对白人。愿上帝保佑大家。”

1957年，我们对联邦选举权法案和宪法修正案作斗争。我想我们都感到高兴，北罗得西亚基督教协进会这一次看来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

我们为教会在前进中这一情况而受到鼓舞，并完全同意《非洲时报》编辑的意见，那位编辑这样写道：“北罗得西亚教会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大胆地对政府看来是违背基督教道德的政策和措施公开表示反对。”象北罗得西亚这样一个年青的国家，在它的发展中，教会承担着很大一部分责任。他们不能希望仅仅局限于教堂以内工作就可以得到成功。

基督教教义是决不能分裂的，要么被接受，要么实际上被牺牲。在我们看来，不管是白人政府或是黑人政府，或者任何别的集团，他们实行了种族歧视，如果基督教教会不予以谴责，那么就是牺牲了基督教教义。只要是不

道德的东西,就一定不能被冒充为基督教的正义。

1960年我在《黑人政府吗?》一书中阐述了关于国家生活中的教会这一问题的意见。我没有理由去改变当时我所说的话。

这是我的坚定的信念,我们需要在所有的政党中增加男女基督教徒的数目。正是我们仁慈的上帝说,他的门徒应该是高尚的人,但是我遗憾地说,许多基督徒都被阻止参加政党。例如,许多基督徒教师害怕公开参加联合民族独立党,因为他们害怕不是被传教会管理人就是被教育部官员列入黑名单。当官方教会对我说,要我约束我的人民并防止流氓行为时,他们却一点也不帮忙去鼓励他们的人民积极关心我们的政治运动,我对此感到非常生气。

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是,城镇里的警察不准在星期日下午举行政治性集会。所以我只得在星期日上午举行集会,以致和星期日上午的礼拜冲突了。这就给我的许多很好的党员造成了极大的负担,他们必须选择,是来出席我的集会呢,还是到教堂去。

现在我是不属于任何一个教堂的教徒,然而我感到自己是所有教堂的教徒。我几乎很少有机会去出席公众的礼拜,我只能有时候在家里读圣经和祈祷。我想北罗得西亚的教会还不明白它是处在极大的危险中。由于这个国家的基督教教会经常不能把自己在有关种族和政治方面所宣传的东西付诸实践,所以我的成千成万个非洲同胞抵制了教会。虽然许多人仍对基督福音保持信仰,但是,如果教会看来并不是由那些在生活各方面实行基

督教义的人所组成的,那么,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也将失去这种信仰。我一直希望教会整顿一下它自己的机构,因为我们新的赞比亚国家在此时正需要成千上万个真正的基督徒。

一七 决定胜利的一年

1960年8月，召开了联合民族独立党第一次全体工作委员会会议，我向代表们作了长时间的详细讲话，向他们阐明我们的目标和用来达到我们目标的方法。我提醒他们今后还有严酷的斗争：“今天，你们就象犯人一样，无论到哪里，都有特务科的男女跟踪着；今天，你们为了喊‘现在就给我们自由’之类的口号，就会有坐牢的机会；今天，你们告诉你们的人民说，这是他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管理自己是他们天生的权利，这样一说就算‘犯法’，因此随时有从家乡被放逐出去的危险。这是我们今天的处境。从前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埃及、加纳和其他国家里的斗争的骇人故事，正在这里发生。虽然这些事情是悲惨的，但它们都起了有用的作用，那就是：这些都说明了我們正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一事实。我想重复我被放逐在卡崩波时说过的一句话：英帝国主义者从来不放逐或者监禁那些政治蠢人。”

我告诉他们说：如果我们害怕监禁或放逐而不能为争取独立组织起来，那么，这就等于我们不准备去接管政权。“白人在各行各业中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不是因为他碰巧是白人，而是因为他比我们组织得好；他的诀窍就在这里。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可能动员的全部力量都动员起来，争取现在就自治。这决不是一个轻松的任

务。这意味着在国内外妥善地选择你们的朋友，要求目的纯正、决心和勇气以及自我约束。这确实需要恩克鲁玛的三个“S”——服务、牺牲和受难^①。在任何地方，在任何领域，没有好的组织，就什么也干不起来。对于成功的人来说，良好和有效的组织是他们的格言。只要我们能够一起认真商量，在这里我们就能有效地组织起来。

“为任何事情进行有效的组织，你们必须心里十分明确要的是什么，打算怎样去达到它。我们联合民族独立党的党员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这就是现在就自治；我们也知道怎样去达到它，那就是通过非暴力办法加上积极的行动。

“当我们组织我们的人民的时候，应当注意，我们是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它不但给我们自治和最终达到独立，而且是一个有力量来管理我们的政府的机构。简单地说，我们是在此地组织起一个民有、民治和确实是民享的政府。我们批评和谴责现政府是不民主、不道德和完全反基督教义的，因此也是有自尊心的人民所引以为耻的。这是一个少数特权者所有、少数特权者所治和少数特权者所享的政府。中非韦伦斯基政府在武装着的，就是这些少数特权者。韦伦斯基不顾现有的几个多种族混合的团，而在建立纯粹白人的部队。虽然我们无保留地给以谴责，但这一切并不出于我们意外，因为这正是少数特权者为了使自己进行压迫和镇压的统治在这里永久存在下去的机构的一部分。

^① 这三个词在英语中为 Service, Sacrifice, Suffering。——译者

“在人们找到比较新的消极抵抗的办法之前，处在象我们这样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压迫者的局势之下，被压迫者不是在压迫面前屈服，就是起来公开起义。历史上尽是这样的事件。在压迫面前屈服是不体面的，对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来说是可耻的。另一方面，公开起义往往使无数人民被杀害，而正是为了这些人民，我们才谋求独立的。所以我们采取第三种办法——消极抵抗的办法，或者说非暴力的办法加上积极的行动。在压迫面前屈服和默默抱怨，是容易做到的。当然，组织一次公开起义也是困难较少的，而更为困难的是组织一次非暴力的斗争，因为它要求全体参与者都必须有坚强的信念。显而易见，这种运动要求广泛的指导，往往要经过一个长时期才能取得效果，这就比公开起义需要更严格得多的纪律。但是这种锻炼的成果，在参与者掌握了政权之后，对他们是很有用处的。这是我们已经选定的办法。我们没有丝毫意图要使我们的人民成为殖民主义者的炮灰。”

这种办法用在北罗得西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提醒他们记起那为了争取社会改革而进行的第一次非暴力斗争以及所有参与者所产生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它使武装者陷入以暴力对付非暴力的窘境。他们除了把那些虽单纯但有自尊心的、虽普通但在精神上新生的黑人男女和儿童送到监狱去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看到地位低微的人民不愿通过鸽笼式的小洞、在日晒雨淋下排着长蛇阵去买肉，而宁可去坐牢，这确实是十分感和令人难忘的。英国的监狱，从利文斯敦到阿伯康，从詹姆森堡到欣高拉，都关满了人。这种令人惊叹的运动，是在1953年到

1957年之间,为了实现某种社会改革措施而组织的。

在全国各地的会议上,我反复强调一个运转自如的党的政治机器的需要。每个党员都必须和党的总部保持经常的和密切的接触。党必须成为全体人民所信任的喉舌,这样,人人都会准备在必要时为自由而共同受难。这样的团结一致精神,在获得独立之后甚至是更为必要的。

任何类型的组织,无论是工业的、社会的或者政治的,没有纪律都是不能存在下去的。纪律带来自我管束,在一个政党里,它是最为重要的。领导人也好,一般党员也好,都必须遵守它,而领导人则格外要以身作则。他们受到群众的密切注视,所以他们怎样表现是至关重要的。在使用非暴力办法的运动中,纪律甚至更为紧要,尤其是当民族主义的浪潮不断高涨的时候。

1961年年终时,伊恩·麦克劳德先生敦促我的党去参加在伦敦召开的联邦工作检查会议。我勉强地去了,因为对于一个我和我的政党有使命去消灭的联邦,我感到没有什么必要作检查。正象我所预料的那样,这次会议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但是,它为召开一次检查北罗得西亚宪法的会议给了我继续施加压力的机会。这个终于在伦敦召开的会议,受到统一联邦党的抵制,但是现在有名的伊恩·麦克劳德“三个十五点”计划正是在那里第一次提出的。

我们去出席伦敦会议时带着这样的信念:约翰·莫法特爵士领导的北罗得西亚自由党是支持我们关于在下届立法会议中非洲人应占多数席位的要求的。就在会议结束时,麦克劳德先生好象瞒着我们同自由党达成了妥

协。我们感到万分失望,就在这个时候,我发表了那个终于被称为我的“茅茅”声明的声明。对于这个声明,我需要作一些说明,因为它现在还被引用来攻击我。

在1961年2月9日,我发表了一个以《我的人民不耐烦了》为标题的声明,我在这个声明里警告说:如果韦伦斯基和英国政府继续使赞比亚的非洲人民的正当热望落空,在北罗得西亚可能引起一次群众起义,使“茅茅”运动好象是一场儿戏。

就我个人来说,“茅茅”运动不仅意味着黑人对白人的屠杀,也是白人对黑人的屠杀。前几个月来,北罗得西亚的欧洲人,受到了韦伦斯基和他的在北罗得西亚的领导人约翰·罗伯茨的鼓励,一直在采取很可能引起紧张局势和危机的行动。军队在街道上公开携带着武器。铜带区的枪械铺向欧洲人居民做着非常兴隆的武器生意。如果我的人民在行动上不比白人庄重的话,一次个别事件,就可能引起恐慌的白人移民对非洲人的集体射击。那个时候,“茅茅”运动岂不是象一场儿戏了吗?所不同的只是,我们将要有的不是白人的千人坑,而是黑人的千人坑。

伦敦会议的决议公布后,韦伦斯基和他的能干的法律部长格林菲尔德立即开始工作,通过某种秘密外交手段,设法使计划变为有利于统一联邦党。6月,北罗得西亚总督宣布了一部宪法,它给我们大家一个沉重的打击。当我初次阅读这份白皮书时,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一直叫我的人民信任英国政府;我个人对伊恩·麦克劳德一向是很尊重的。现在我们又一次受到了欺骗,

我们感到十分气愤。6月，在新的提案宣布后，甚至在基特韦召开的北罗得西亚基督教协进会，也通过了一项决议，说：

“协进会认为目前关于北罗得西亚宪法的提案将加深种族对立，因此无法为基督教会所渴望建立的有秩序的非种族社会提供基础；因此，那些提议是基督徒良心的一种负担，因为事情很清楚，这些提议是不能为极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的。”

7月9日，在穆隆古希召开了联合民族独立党的年会。会议上我们抨击了这些新的提案，我知道开始积极行动的时间已到。英国政府利用了我的通情达理态度，它向来自联邦政府的压力屈服了。

出席会议的有三千人，每个人都对我们遭到的事情万分气愤。他们要立即行动，我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意识到过一个民族在愤激时产生的潜在力量。够奇怪的，我本人却感到极其平静。当我竭力向群众劝说我们的斗争必须绝对保持非暴力性质时，他们不要听我说。如果在那个时候我脱离了自己对非暴力的威力的信仰的话，我不敢设想在我们的土地上将发生怎样的流血事件。

我告诉出席会议的人们去对我们的酋长和人民说：我们的这些自称为“保护人”的人，为了维持他们丑恶的联邦，已经屈服于从索尔兹伯里的韦伦斯基那里来的压力，已经屈服于索尔兹伯里勋爵和保守党后座议员。“英国政府已经出卖了我们；他们象五十年前他们的前任对南非联邦的做法一样，已经将我们出卖给白人至上主义了。他们鄙视我们。我们还要信任他们吗？至少我对他们的信

任是完蛋了。在我自己的心里，我仍旧能看到麦克劳德先生的面孔。就我辨别面相和透视别人心思的能力说，他的面孔是值得信任的。许多殖民地的其他领袖们也曾告诉过我对他有同样看法。那么，什么原因使他在北罗得西亚问题上走错路的？他没有为满足我们对于一种明确的非洲人多数统治的要求出什么力。相反，他给了我们某些在殖民史上空前未有的东西。英国首相训谕我们要讲‘高尚的原则’、‘种族之间的亲善’和‘互让’精神的重要性。他的意思只是我们应当受原则的约束，而韦伦斯基却不需要；种族之间的亲善只是由我们实行，而韦伦斯基却不必要；对于互让精神只是全由我们来让，而全由韦伦斯基来得。看来我是一个最受打击和最感失望的人。我们正被当作外交权术的祭坛上的牺牲品。他们为了拯救怀特黑德的公民投票，向韦伦斯基让步，这意味着拯救韦伦斯基他自己，因此也是拯救联邦，而把我们的政治进步来作为牺牲；历届殖民大臣向我们保证的那些东西，将不会实现。这样的行为还会再受到信任吗？我已经说过，我的信任已丧失殆尽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从现在起我们向何处去？

“我知道，在南非联邦，在腐败的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全面的军事和警察行动的准备正在进行。我也知道，这三个外国强国间正在订立军事条约，试图保持他们建立在别人土地上的政府。他们可以自称从公元1400年起就已经在这里落户了。事实仍然是：这是非洲人的土地。我们生于斯，死于斯。同胞们，现在是个适当的时刻让我象莎士比亚那样说，‘我

们的军队是满员的，我们的事业是成熟的。’联合民族独立党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组织，因为它的每个党员诚实、正派和不倦地尽自己的力量；而且因为我们的政策是建立在人道主义的原则上的。战斗依旧是一样。这不是反对白人，而是反对罪恶。我们在各个种族的人士中间有许多朋友。我们不要在反抗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同时自己也沦为种族主义者。

“我们也不要丧失自己辨明方向的头脑。对于我们在斗争中的欧洲人朋友和战友们，我说，你们的工作也不是轻松的。你们将遇到许多困难。你们将在自己的社会中受到排斥；你们将受到你们所恰恰愿意联合的人的怀疑。但正如你们所了解的，你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你们将坚持自己的主张，继续向受错误原则迷惑的那些人指出：只有当非洲人多数统治的原则建立之后，和平才能到来。我丝毫不羡慕你们的地位，但祝你们幸运。

“对于我们在斗争中的亚洲人朋友和战友们，我说，你们知道我们想做的是什么。你们曾在你们自己的国家面对这种斗争。你们知道我们是在做正义的事情。你们大多数是有原则的人。你们一直是公开支持我们的。

“对于我们欧非混合种的人民，我们说，我们欢迎你们作为我们社会的成员。有一段时候，你们为现在的当权者所迷惑。你们发现了他们那种分而治之的诡计。你们回到了你们过去和现在所真正隶属的地方。现在他们又一次在开始设法离间你们，引诱你们成为他们宣传的俘虏。你们是了解实情的。你们将无疑忠实于你们的信仰。

“我已经再三要求北罗得西亚人民在思想、言语和行动上做到忍耐和非暴力。但是近来我把这些高尚的语词中的一个词从我的词汇中去掉了。这就是‘忍耐’。韦伦斯基拒绝忍耐，他得到了他所需要的。而我们这些忍耐的人却受到了忽视。”

“现在是我们在执行政策时要表现出更多纪律性的时候了。我们必须以一种积极的但又非暴力性的方法来行动。”

穆隆古希会议后的日子是令人担忧的。国内大部分地方保持和平，但是在北方省，长年的挫折爆发为暴力。北罗得西亚警察的机动部队和联邦军的白人部队开了进来。多少所学校被烧毁，多少村庄整个儿成为一片火海；大约有八名非洲人在各种事件中被韦伦斯基陆军的保安部队所杀害。我是对北方省的暴行最感到遗憾的人，但是，如果你把一头牲畜赶到角落里并且加以虐待，你可以料到它在惊吓和愤怒中也要向你猛冲直撞过来。

往往有那样一些人，他们说暴力是合算的，在北方省，就是发生了那些事，才使英国政府再一次改变了主意。我说不上白厅所发生的事情，我所知道的只是现在1962年他们给了我们一部宪法，我们决定按照宪法规定，在北罗得西亚为实现多数统治进行工作。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第一次用投票箱去解散这个丑恶的中非联邦了。

长时期来我曾领导我的人民为“克瓦沙”（黎明）呐喊。我们一直在黑暗中呼喊它；现在黎明的曙光已在地平线上出现，我知道赞比亚将获得自由。

附 录 一

历史的简述

一个人要理解、或甚至是开始理解我们今天的纠纷，他必须一直追溯历史，从称做非洲的瓜分，或者用比较通俗的话说，从非洲的争夺开始。下面的话叙述得很好：

十九世纪末年具有白种人向非洲大陆挺进的特色，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种入侵是政府无法控制的那些势力的产物，而分清那些势力是不容易的。有两个现象可以提到。一个现象是冒险的热情，这表现在不断流入和穿过非洲的一股世界性的潮流——在这股热流中，数以十计的人为了发现的热忱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最后牺牲了生命。

另一个现象是捕掳奴隶的恐怖，利文斯敦和他的同时代人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报告中最初向基督徒大众作了揭露。愤世嫉俗的评论家曾经怀疑良知反抗的真实性和它的范围，它是由于很大规模地揭露了原可防止的人类痛苦而引起的。但是它的真实性被它产生的决心的顽强性所证明。多样的个人动机，混杂了各式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结合起来终于引起了这股热潮；这些是贸易的欲望、福音传教的热忱、实利

的追求、帝国的自豪感、文明的自觉托管和爱国主义的嫉妒。从用进步的尺度去测量相差这么远的种族之间的接触完全建立的时候起，它就必然会继续下去^①。

上面这些话，引自索尔兹伯里第五侯爵（防止非洲的瓜分引起一场欧洲大战的主要功劳应该基本上归他的这个英国首相）的传记，足以解释被称为“今天世界上最麻烦但是重要的问题，在同一个政治实体里具有不同文化型式的两个或更多的社会紧密接触所引起的磨擦和冲突”^②。

事实上，现在是北罗得西亚的广阔内地区域，起初并未受到争夺的影响，不论是贸易的或传教的有组织行动起初都没有到达那里。但是“这是一个悲剧性的豁免。在赞比西河北方的这些土地，长时期来是阿拉伯奴隶贩子捕掳奴隶的好地方。整个整个的村庄被扫荡一空——一大片区域里人烟绝灭——要在可以居住的地球上去确定一个比这个独立庇护所的福利标准更差的地方，这将是困难的。”^③ 索尔兹伯里侯爵本人急于将南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变成一个属于外交部管辖的帝国保护地，“但是不欢喜由于进一步的冒险导致英帝国加重责任和年度开支的英国财政部的顽固态度”^④ 占到优势，于是，在 1891 年，现在是北罗得西亚的在赞比西河北面的土地被正式

① 格温多林·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生平》，第四卷第 222 页。

② E·克莱格：《种族和政治》，第 1 页。

③ 同上书，第 240 页。

④ 哈里·约翰斯顿爵士：《英属非洲史》，第 122 页。

交付给塞西尔·罗德斯的英国南非公司管理。

在这个时候，过去从西北方和南方侵入这个地区的四个主要的武士部族，全都已在现在他们的后代居住的地方很好地定居下来了。他们是班巴族、巴罗策族、隆达族和恩戈尼族；恩戈尼族是直到 1833 年才渡过赞比西河的。部族之间的战争经常发生，对周围弱小部族的捕袭似乎从未停止过。阿拉伯奴隶贩子扮演了吓人的角色，当他们不为自己进行捕掳奴隶的时候，他们就拿布匹和枪枝去交换战争中的俘虏。

四个部族全是班图族的血统，尽管彼此有许多不同，但相同的地方是不少的。譬如，班巴族和巴罗策族是母系的，而恩戈尼族则是父系的，但是这些部族对于解决土地问题都有相同的看法，认为全部族的人都有耕种土地的权利。大家有类似的宗教信仰，一种祖先崇拜。每个部族都没有文字，对魔法和巫术都有坚定的信仰。象全体人类一样，他们同时具有好的和坏的属性。他们生活的条件之所以极可能和他们接触的欧洲人发生冲突，在于他们对连续劳动的态度，连续劳动并没有或几乎没有成为他们部族的训练的要素。理查德博士在她的不朽著作《北罗得西亚的土地、劳动和食物》中计算，班巴族人在他们部族的条件下，维持社会需要的必要劳动，一年大约只占七个月。

再回过来讲北罗得西亚早期的历史。当这个区域在 1891 年归入南非公司的时候，它在名义上是由英国女王陛下驻尼亚萨兰专员哈里·约翰斯顿爵士管理的，但是实际上他太忙于镇压尼亚萨兰境内的奴隶贩卖活动，所

以无法匀出时间或人来；他的微小的武力最初只有七十名印度锡克教徒兵，八十名桑给巴尔土著兵，两艘向英国海军部借来的炮艇和一艘教会汽船。

但是，尼亚萨湖、坦噶尼喀湖和姆韦鲁湖之间的交通是保持畅通的，在阿伯康和罗斯伯里堡建筑了小型的要塞。到1896年，尧族奴隶贩子、阿拉伯人和在尼亚萨兰的恩戈尼族人都被打败，南非公司在北罗得西亚开始活动。和班巴族人直到那个时候还没有接触过，但是在尼亚萨兰的奴隶贩子失败后，班巴族人的武器和弹药供应断绝了，欧洲人带领的公司土著警察与之作了几次较小的交锋后，他们投降了。在詹姆森堡区的恩戈尼族人被尼亚萨兰部队打败以及卡曾贝的隆达族人也战败后，在东北罗得西亚的全部战事结束了。在西北罗得西亚，巴罗策王勒瓦尼卡急于订立同盟来对抗马塔贝莱，早在1890年6月就签订了“洛克纳条约”，没有发生任何战事^①。到十九世纪末，北罗得西亚实际上是平定了。

在本世纪，发生了两件大事，促使组成了我们今天知道的北罗得西亚。第一件事是1900年在东北罗得西亚和1904年在西北罗得西亚开征土著税。从个人身上征收的税额是不大的，但税收总额为数不小，1910—1911年度北罗得西亚的总收入中，这项收入达五万七千镑。从种族接触的观点来考虑就更为重要得多了，正是这种土著税的征收，使部族非洲人不得不离开他的村庄到外面去找工作，有时候远至南罗得西亚或南非。这件事的影响就毋

^① L·H·甘恩：《一个多元社会的诞生》，第65—79页。

需解释或强调了。另一件事发生在许多年之后，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铜带区的开发，它开始在 1928 年，在 1953 年这个区域的铜产量竟占世界第一位。现在占世界第三位。在 1958 年，所生产的铜的价值为七千零十四万一千二百八十七镑。付给非洲人的工资达到六百三十一万八千五百七十三镑。在 1958 年，矿业雇用欧洲人七千三百五十名和非洲人三万九千七百八十名^①。这些数字本身说明了问题。

最后，历来的政治背景究竟是什么？北罗得西亚平定后许多年来，这个国家的政府各个方面都完全掌握在欧洲人官员手中。即使在 1924 年帝国政府从南非公司接手过来，立法会议替代了移民的咨询委员会时，仍然保持着欧洲人官员占多数，总督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在各方面拥有无限权力。非洲人既无选举权，又无代表。确实，在 1929 年，部族地区曾采用了一种被当做间接统治的形式，据称是要加强过去南非公司所完全忽视的酋长的地位。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铜矿的发展从农业地区拉走了数以千计的非洲人，削弱了酋长的权力，破坏了政府所正想要保护的那些风俗习惯。

在同一个时期，欧洲人移民和商人保持着相当的平静状态，希望着不久他们能获得象南罗得西亚那样的自治。但是在 1930 年劳工大臣帕斯菲尔德勋爵根据 1922 年保守党发表的声明，发表了一个土著政策声明，声明里有这样的话：“英王陛下政府认为有必要明确地记载下

^① 《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手册》，第 64—65 页，466—467 页。

来：非洲土著人的利益必须是至高无上的，如果他们的利益和移居民族的利益发生冲突的话，前者应居优先地位。”

从那个时候起，和南罗得西亚合并就成为北罗得西亚大多数非官方欧洲人的真诚愿望，直到北罗得西亚非官方人士的领袖韦伦斯基先生在1946年认识到，接着他又使南罗得西亚总理戈弗雷·哈金斯爵士相信：合并将永远不会被英国两个主要政党的任何一个所许可。不久联邦成立，无论如何，在开头的时候，它是被很多人支持的，这些人认为而且希望：成立联邦可以避免合并的坏的方面，而还有相当多的经济上和行政管理上的好处。

非洲人实际上是普遍反对成立联邦的。对南罗得西亚的不信任，在这个时候已经变成几乎是病理性的，联邦产生的过程中，在任何方面都丝毫无助于减弱这种感情，而且倒是增强了这种感情。

然而在成立联邦前的那些年里，非洲人的政治进步未曾完全被忽视。只要记一记非洲人省会议和非洲人代表会议的建立，前者后来没有提出任何理由而被废除，后者现在也废除了（更不用提在联邦之议被认真考虑的时候，在立法会议里有非洲人委员这一事实），就可以体会到，在很多欧洲人方面，对非洲人的态度已经有显著的改变，完全加以忽视将是不公平的。

过去的事就写到这里。

展望未来，有一件事显得特别突出，那就是，事情非变化不可。也许当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它们已经变化了。

斯图尔特·戈尔-布朗

附 录 二

关于在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以及在 北罗得西亚选举非洲人和其他种族代表 的方法的备忘录(1952年)

非洲人民可以接受的选举法，必须有完全的成人选举权，不为少数种族集团设置保留席位或其他特殊的保护性措施，这是在中非联邦、在北罗得西亚选举具有最高权力的立法议会和立法会议的最根本方法。非洲人民同意在实际可行和根据制宪政治需要的范围内，分阶段达到这一目标，逐步改进非洲人的选举法。每一个阶段不应拖得太长，以致目前的成年人不能在他有生之年亲眼看到最后理想的实现。暂时可以同意的步骤是：

- (i) 采用社团选民登记簿，对每一种族集团分配固定名额的席位。
- (ii) 采用普通选民登记簿，对少数种族集团保留少量固定名额的席位。

在初期阶段，只要在政府官员中有非洲人，可以容许用有官职的代表名额来维持权力的平衡。

下面先讲将于 1958 年修订的北罗得西亚宪法。

北罗得西亚宪法

目前立法会议委员席位的分配方案是：非洲人四名

(由非洲人代表会议向总督推荐), 代表非洲人利益的欧洲人两名(由总督指定), 选举产生的委员十二名(由一万二千名欧洲人选民和大约三名非洲人选民选出), 有官职的委员八名(依据职权的当然委员或由总督指定, 全部是欧洲人), 以上共计二十六名。议长是指定的。

关于 1958 年的重新分配委员席位方案的建议

非洲人十二名(由分别编制的非洲人成年选民登记簿上的选民选出), 由英国臣民选出的委员十二名, 有官职的委员四名(由总督指定), 以上共计二十八名。议长由委员从非立法会议委员的人中选举产生。

过渡时期的选民登记簿

第一次非洲人选民登记簿, 可利用土著纳税人登记簿。在编有成年的女性非洲人纳税人登记簿之前, 每一个男性纳税人可以得到一票由女性选民行使的投票权。任何英国臣民或英国保护的人, 都可以做非洲人选民的候选人。可以想象, 委员们的舞弊行为或无能会使他们的名誉扫地, 因此非洲人会希望选举另一种族的人为委员。这一点应在宪法中加以认可。由英国臣民选出的委员, 应根据现在的选民登记簿选举。成为英国臣民的非洲人不得投票选举被指定为非洲人候选人的人。

北罗得西亚行政会议

行政会议除总督外, 已有四名有官职的委员, 他们都保证不歧视非洲人, 因此不必再指定一个欧洲人委员来代表非洲人利益, 因为这种委员没有得到非洲人民的信任, 不过把一个彻头彻尾不民主的委员会伪装为代表非洲人。非洲人唯一可以接受的是: 由立法会议的全体非

洲人委员选出若干名立法会议非洲人委员参加行政会议。行政会议中的非洲人委员人数，应与英国臣民选出的无官职委员相等。应考虑指派非洲人的有官职委员参加行政会议。

英国保护的人

非洲人坚决反对，在他们成为自己国家有充分权力的公民以前，必须成为英国臣民。非洲人认为，在他们取得完全的选举权以前，应有义务取得这种外加的公民权，这是可笑的。他们理解，取得英联邦公民权对他们的国家是有利的，但是他们认为，北罗得西亚的公民权应具有英联邦公民权的资格，象在英国各自治领、尼日利亚和黄金海岸的情况一样。政府必须接受这一公民权的概念，然后实行根据成人都有选举权的原则，编制一本普通选民登记簿。

普通选民登记簿和少数种族集团保留席位

非洲人可以同意，在根据普通选民登记簿进行选举的最初几年，立法会议中应为少数种族集团保留一定名额的席位。这将使少数种族集团感到放心。大家预见到，人民在政治上分成派别，将不会始终按种族划分。随着非洲人有产阶级和高薪非洲人工人的发展，他们将发现，他们的利益与欧洲人和亚洲人富裕阶级的利益将更加接近；同时，欧洲人工人和亚洲人工人将觉得，他们的利益和非洲人工人相一致。当没有一个种族再要担心为另一种族所控制时，为少数种族集团保留席位的政策可以取消，立法会议将成为一个代表大多数公民意志的真正的民主机构。

立法会议中的保留席位

在向完全民主的选举法过渡的时期内，可以接受根据W·J·M·麦肯齐作为适用于只有两个具有政治上重要性的种族区分的社会而向坦噶尼喀推荐的总原则，为少数种族集团保留席位的制度。

从社团选民登记簿改变为普通选民登记簿

非洲人可以接受的是：按照社团选民登记簿选举社团代表的制度，在每一种族选民的数量相等，而社团选民登记簿并入普通选民登记簿后，将使非洲人选民的人数和欧洲人选民(或英国臣民选民)人数相等时，应该改变为按照普通选民登记簿选举普通代表的制度。如这一改变迅速实现，本规定可不作为为少数种族集团提供充分的保护性措施，下文另行规定少数种族集团保留席位的制度以减少他们的疑惧。

有限选举权的普通选民登记簿

某些深切关怀非洲人民利益的人一直强烈地宣传：社团选民登记簿和选举社团代表的方法，很可能会阻碍向真正的民主制度前进。他们主张编制一种把有若干收入、财产或教育条件的非洲人也包括在内的普通选民登记簿。

如果有选举权的人扩大到英国保护的人，则在下述条件下，非洲人也可以接受，即：如果选举人资格的规定，可使立即具有选举权资格的非洲人人数，等于欧洲人选民的人数，或者对选举可有显著的影响，而选举考查的管理权又掌握在公正人士的手中。

教育考查

目前对选举的教育考查是：愿意登记的选民应在一份英文表格中正确地填写（北罗得西亚法律第二章立法会议条例第一表格式A和第十二条）。如果这一表格使用北罗得西亚说得最广泛的土语，那么，非洲人可同意在一个过渡时期内采用这种考查。

财产考查

占有房屋的价值为二百五十英镑或以上的非洲人人人数正在迅速增加。如上述考查由公正的人管理，那么，非洲人可同意在一个过渡时期采用之（北罗得西亚法律第二章第十一条a项）。具有选举权资格所需要的收入数，一直规定在只有很少非洲人能达到的数目。但是，由于有五十英镑的配给品或住房津贴，使必需的收入数减少到每年一百五十英镑或每月十二英镑十先令，有这样数目收入的非洲人人人数正在增加。非洲人担心欧洲人雇主会将得到这样数目工资的非洲人在工作未满一年之前将他们解雇，从而可以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如果只要足以证明一个非洲人在任何一年正式受雇三个月每月获得十二英镑十先令的收入，而且各种形式的奖金或附加津贴都考虑在内；那么，由公正的人管理的上述考查，作为过渡时期之用，将不会是非洲人所不能接受的（北罗得西亚法律第二章第十一条c项）。

考查的鉴定和管理

如决定按照上述选民诸条件编制普通选民登记簿，则应成立一个局处理考查的鉴定和管理，局中人员，由立法会议非洲人委员选举产生的非洲人人人数，应和欧洲人相同。其职责应是编制并随时按照实际情况修订北罗得

西亚普通选民登记簿。对该局提出的申诉，应采用对选民登记办公室提出的申诉同样的方法进行审理（北罗得西亚法律第二章第六条第一表）。

立法会议中的非洲人代表

由欧洲人代表非洲人利益的选举方法，根据过去所任命的欧洲人的记录，是非洲人所不能接受的。他们一直没有和他们所应该代表的人民打成一片。由于他们并不是对非洲人民负责，而且又不是依靠非洲人民来继续当选的，因此，这种情况就不足为奇了。如非洲人的利益须由欧洲人来代表，那么，他们应该是由非洲人选出的欧洲人。这同样适用于选举行政会议的委员。

联邦议会

联邦是不顾非洲人民的一致反对而强加于他们身上的，非洲人民希望看到联邦尽快解散。在联邦解散以前，他们希望看到联邦的宪法逐步向真正民主的方向发展。

联邦议会议员的选举

现在的情况是：

	北罗得 西 亚	尼亚萨兰	南罗得 西 亚
由非洲人选出的非洲人	2	2	—
由欧洲人选出的非洲人	—	—	2
代表非洲人的欧洲人	1	1	1
由英国臣民选出的	<u>8</u>	<u>4</u>	<u>14</u>
共 计	<u>11</u>	<u>7</u>	<u>17</u>
总 计	<u>35</u>		

有资格作为英国臣民投票选举的非洲人其总数在五

百以下。欧洲人选民超过五万人。

分配给尼亚萨兰和南罗得西亚的议员席数是推荐的，因为包含的原则三个地区都是共同的。它们不需要取得这三个地区非洲人的同意。

对重新分配联邦议会议员席位的建议

1953年宪法对联邦议员的席位，是根据这三个地区欧洲人人口的重要地位和这些欧洲人的经济势力来分配的。

这是非洲人所不能接受的，非洲人看不出任何理由，使这三个地区不应该有相等数目的议员席位。在南罗得西亚有大批欧洲人并占有一半土地面积，这一影响已被北罗得西亚巨大铜矿工业的影响，以及尼亚萨兰非洲人人口较多这一影响所抵消。这些因素是无法用数字来正确估量的。选举相等议员名额是唯一公平的制度。建议每一地区向联邦议会派出十二名议员。

联邦议会中非洲人议员的选举

南罗得西亚的普通选民登记簿是无效的，它没有提供适当的非洲人议员名额。在南罗得西亚普通选民登记簿、以及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普通选民登记簿成为政治现实以前，应采用选举非洲人社团代表的方法，来选举他们自己的议员。

相等议员名额的选举

作为一个过渡办法，非洲人同意联邦议会由每一地区的六名非洲人和六名欧洲人（或由英国臣民选出的人）组成。

建议

	北罗得西 亚	尼亚萨兰	南罗得西 亚
由非洲人选民选举	6	6	6
由欧洲人或英国臣民选举	6	6	6
合 计	<u>12</u>	<u>12</u>	<u>12</u>
总 计	<u>36</u>		

南罗得西亚的保留席位

如果认为不宜把南罗得西亚普通选民登记簿按非洲人选民和欧洲人选民分别编制,那么,可以根据非洲人候选人中得票最多者当选设置的六个保留席位这一原则进行选举,据认为,这一方法将使现在采用的对非洲人来说是无保障的方法继续存在下去,现在采用的方法是:非洲人的代表由欧洲人选民占压倒多数的选民登记簿选举,而非洲人候选人如要有获胜的希望,又必须得到一个欧洲人政党的承认。这里提出可在两种方法中选择一种,因为南罗得西亚的许多政治组织可能宁愿争取采用一种较公正的普通选民登记簿,而不愿在过渡时期采用社团选民登记簿。这绝不是建议采用南罗得西亚目前并不存在的一种单独的社团选民登记簿。

非洲人事务局

非洲人事务局一直不是有效地审查联邦的种族歧视立法的机关。所得税法使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非洲人第一次负有缴纳所得税的义务,而又没有免除他们缴纳各该地区的土著税;军官训练队法含有把非洲人排除在外的意思;这两个法案都未遭反对通过了。鉴于非洲人事务局中非洲人和欧洲人数目相等,而它的主席过去是、现

在仍然是由总督指定而不是由非洲人选举产生的一名欧洲人担任，因此发生上述情况并非意外。非洲人事务局应该改组，仅把代表非洲人利益的非洲人留在局里，并使非洲人选出（而不是象在南罗得西亚那样由欧洲人选民选出）的成员占多数。应指示总督指派一名事务局的秘书，他的职责是向成员们指出，建议中的法规的任何条款，是可能属于宪法赋予事务局的职权范围之内的。建议这一秘书应该是一名不是事务局成员的非洲人。

民主政府为最后目标

任何步骤接近于自治领地位或脱离联合王国而独立的政府，都是全体非洲人无保留地反对的。在提出这一备忘录作为北罗得西亚非洲人民同意的政策声明时，必须再度指出：所建议的每一步骤必须导致北罗得西亚作为一个地区的民主政府，在现在的联邦宪法有效期内，必须导致北罗得西亚作为联邦一部分的民主政府，才能为非洲人所接受。非洲人没有权力运用宪法手段来实现他们所要求的宪法修改，因为他们没有选举权，在立法会议和立法议会中没有足够的代表。应提醒国务大臣，他能够运用他在北罗得西亚行政会议和立法会议中的官员投票权来实现非洲人所要求的修改。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么，迫使非洲人在疑惧和失望中采取不合宪法的步骤来修改宪法，这一责任要由他承担。

按照联邦的情况，一个保守党政府非常坚决支持的宪法，要由英国政府直接采取行动进行修改，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联邦宪法第九十九条，联合王国政府将作为一方参加 1960—1962 年间召开的考虑修改宪法的会议。

联合王国可通过对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两个地区代表团的控制,对这次会议施加极大的压力。要求国务大臣现在就明白表示,他准备在这次会议上运用他的影响,使宪法修改得对非洲人比较公平。这样办,他可能会减轻非洲人民的巨大忧虑和疾苦,并使超出宪法范围的不必要行动不致发生,如果非洲人民获得再度保证的希望全部破灭,是可能会被迫采取这种行动的。

欧洲人移民关于成立联合政府、获得自治领地位和实行种族隔离的要求,是非洲人完全不能同意的;联合王国政府对于其中任何一种要求有所让步的任何趋势,都将遭到反对,这种反对可能爆发成为不愉快的事件。

附录三

对修改北罗得西亚宪法建议的评论(1958年)

历史情况

1. 我们希望提醒英国政府,我国的土地和人民,是根据和我们祖先签订的协定,委托给联合王国女王陛下政府保护的。

2. 北罗得西亚是在1924年被英王宣布为它的一块保护地而开始归英国政府统治的。虽然正式的政策是非洲人利益至高无上的政策,但是,被保护的人民在立法会议里于二十一年中完全没有代表,而那时住在这个国家的极少数欧洲人却立即享有足够的代表权。

3. 1938年总督指定一名欧洲人委员代表非洲人,非洲人才第一次有间接的代表。那时,立法会议有十六名委员,组成情况如下:

有官职的委员 (包括担任立法会议主席的总督在内)	8
只代表欧洲人的无官职的委员	7
被指派代表非洲人利益的欧洲人	<u>1</u>
	<u>16</u>

4. 一直到1948年,在立法会议里,除了指派两名代表非洲人利益的欧洲人以外,还指派了两名非洲人委员,

这时非洲人才有某种“直接”代表权。

5. 另一方面,相应地增加了一名有官职的代表和两名选举产生的欧洲人委员。结果是:选举产生的欧洲人委员人数第一次和有官职的委员人数相等,使立法会议的组成情况成为:

有官职的委员(全部是白种人)	10
无官职的委员(代表白种人移民成分)	10
被指派代表非洲人的白种人	2
被指派的非洲人委员	<u>2</u>
	<u>24</u>

6. 历史发展的下一阶段开始于 1954 年,当时被指派的非洲人代表人数增加到四名,相应地增加了欧洲人代表,也减少了有官职的代表,这样使立法会议中白种人移民成分的代表占多数,组成情况如下:

有官职的委员(全部是白种人)	8
无官职的委员(代表白种人移民成分)	12
被指派代表非洲人的白种人	2
被指派的非洲人委员	<u>4</u>
	<u>26</u>

7. 不应忘记上面所讲的这一事实:从 1924 年起北罗得西亚的正式政策是非洲人利益至高无上。这一政策的含义是:如果非洲人的利益和移入种族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非洲人利益应居优先地位。这是使白种人移民坐立不安的东西,因为在大部分重大问题上,殖民部倾向于听非洲人的意见要比听移民的多。一个恰当的例子是:白人移民坚决要求将两个罗得西亚合并,在非洲人利益

至高无上这一政策被改变以前，这一要求曾被几次驳回。

8. 必须记录在案：用模糊不清的“伙伴关系”政策来代替非洲人利益至高无上的政策，完全是背信弃义。当这一变动发生时，甚至没有征求酋长们和他们的人民的同意。代替这一做法，在1948年，两个被精心挑选的非洲人在政府高级官员的陪同下飞到伦敦，并被选为欧洲人代表，从而抛弃了非洲人利益至高无上的政策。

9. 直到1954年立法会议上通过莫法特决议以前，这个所谓“伙伴关系”的政策一直没有得到解释。关于欧洲人代表心目中的“伙伴关系”的含义，第一次的暗示是1952年由白种人移民代表的领袖罗伊·韦伦斯基先生在立法会议上辩论联邦计划时作出的，他说，并不是所有的伙伴关系都是五十对五十，这样就把过去的非洲人至高无上的政策，用欧洲人至高无上的政策来代替了。

10. 直到现在，组成被非常小心地保护着的行政会议，一直是政府官员和欧洲人代表的特权。从1948年起，在行政会议里，一直有一名代表非洲人利益的白种人委员，但是在1954年以前，这个委员一直没有担任什么工作。这里必须指出，这些所谓非洲人的代表从来没有取得非洲人的信任。

修改宪法的原则

11. 我们尊重白皮书第十六节提出的原则：“政党应根据非种族路线组织，政治必须超越种族问题”。政府声称，他们一直是遵循这一政策的，他们相信这一政策总是为北罗得西亚人民所普遍接受的。政府引证莫法特决议

来说明它一直支持这一政策。莫法特决议中有关这一政策的是(1)、(2)两项,其内容如下:

- (1) 北罗得西亚的政策,其目的必须是:消除每一种族被另一种族的本身种族利益所统治的恐惧心理;并从北罗得西亚立法机构中按种族设代表的现行制度,向不按种族分别选举代表的制度前进。
- (2) 在上述目的得以完全达到以前,可有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在立法会议和行政会议里必须继续保持特殊的安排,以便保证没有一个种族得以运用其人数上的优势或发展上比较先进的地位,为了其本身种族的利益而统治另一种族。

12. 从莫法特决议中摘引的下面一段话,需要特别注意:“没有一个种族得以运用其人数上的优势或发展上比较先进的地位,为了其本身种族的利益而统治另一种族。”从这一点看,我们现在宪法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似乎是:在立法会议中,应有相等的非洲人和欧洲人代表。然而,负责执行莫法特决议的政府,却在白皮书中主张:选举相等的种族代表的方法,只能使种族观点更加巩固并永远存在。

13. 政府运用上述论点,进一步提出了一些和统一联邦党提议的几乎完全相同的建议,使这个国家里的少数种族欧洲人具有压倒非洲人的巨大优势。从这一点看来,可以有充分理由认为:政府反对选举相等数目种族代表的理由是虚伪的,目的在于支持政府的下列立场:即建议制订一种宪法,使欧洲人由于“在发展上比较先进的地位,可以为了其本身种族的利益而统治非洲人”,而控制

政府。

14. 必须注意，1957年初总督阁下就开始和立法会议的一些委员个人和一些委员集团以及其他人士讨论过宪法问题，但是直到1958年2月，他才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会见。十分明显，当总督阁下会见国民大会的领导人时，他已经不可改变地决心接受白人移民的几乎全部建议。

15. 我们注意到，政府希望“宪法上的规定应能保证这个国家的政府继续掌握在可靠的人们手中，这些人要善于判断，受过足够的教育，有处理工作的经验，有能力在方向不同的行动中运用理智并作出判断”。重要的是要看“可靠的”这个词的定义如何！从白皮书中可以举出例子来证明，“可靠的”人不过是一个具有高深英语知识的有钱人而已！

16. 政府希望，“选举制度必须促使这样一些男人或女人当选，这些人准备并确实愿意考虑并平衡所有种族团体的利益，这些人首先必须出于为整个社会公众服务的精神”。要选出这样一些人，白皮书建议把选举权的资格规定得这样高，以致非洲人群众都不能合格，这样，就使政府自己提出的“没有一个种族得以运用其人数上的优势或发展上比较先进的地位”的目的归于失败。

17. 政府有意防止极端分子当选，它断言，这些人将追求局部利益。在政府圈子里，极端分子是指自治领党的追随者或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党员，这并不是秘密的事情。没有定出什么办法阻止自治领党的追随者取得选民资格或候选人资格。另一方面，他们将使大多数非洲人

没有选举权，因为政府担心，如果数量巨大的非洲人取得选举权，他们将被所谓极端分子所错误利用。

18. 政府喜欢将非洲人国民大会贴上极端分子的标记。不言自明的是：国民大会代表着百分之九十九非洲人的政治主张，所以，这就是说，国民大会全体党员都是极端分子，因此大部分非洲人都是极端分子。如果“极端”变成一种共同的性质时，就不成其为“极端”了。所以，不管非洲人欢喜与否，政府必须给非洲人以选举权，因为在立法会议和行政会议里，他们必须有具有自己政治思想的人代表他们提出政治主张。

19. 政府建议“将选举权给予为这个国家贡献财富和繁荣，并且具有判断力和为公众服务的精神来运用选举权的人”。从上面讲过的政府对“可靠的”人所下的定义来判断，自然可以理解：他们建议只将选举权给予对国家和其他人贡献出财富和繁荣的人，他们指的是这个国家中的欧洲人移民。

20. 我们坚决认为，非洲人的贡献比他们的白种人雇主要大得多。非洲人为了保卫大英帝国，在战场上献出了鲜血，非洲人由于提供廉价劳动力，并缴纳人头税和其他直接或间接的各种形式的税款，现在还包括所得税在内，为这个国家贡献出财富。而且更重要的是，非洲人还提供了土地。

21. 鉴于这一切，我们相信，非洲人处于坚强的地位要求取得比所建议的要充分得多的选举权。按照我们的主张并凭民主的名义，选举权必须是一人一票的成人普选权。

22. 政府拒绝接受成人普选权的概念，认为它不适合北罗得西亚，仅仅是因为特雷戈尔德选举权委员会拒绝接受这一概念，认为它不适合南罗得西亚。

23. 政府由于拒绝大会党提出的一人一票的成人普选权，采用特雷戈尔德委员会对南罗得西亚的建议，而确实泄露了诡计背后的主意。现在看来很清楚的是：国务大臣希望看到两个罗得西亚之间用宪法完全连结起来，目的在于使两个罗得西亚大概在 1960 年审查联邦宪法时实行合并。

24. 联邦宪法规定，将来任何时候，都不应合并，但是现在可以看到，这一保护性条款事实上正在受到蔑视。

25. 这正说明：英国的保证和诺言是多么没有意义，无论这些话讲得多么好听。如果这是殖民部反对北罗得西亚非洲人的阴谋，那么我们只能说，我们在向灾祸前进。

26. 白皮书中说，立法会议中的席位是分别分配给黑种人和白种人的，绝不会发生非洲人吞没欧洲人的问题。

27. 我们不同意：在议会中给非洲人适当代表席位的最好办法，是采用一种规定资格的选举权。相反，我们相信，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除了采用一人一票的成人普选权以外，就是在议会中给非洲人和欧洲人相等的代表席位。

28. 在我们完全反对任何形式的规定资格的选举权时，我们必须顺便提出下列意见：政府已提出建议，将选举权给予受过教育的应有这种权利的酋长，同时也给予受过教育的头人、世袭的议员、领年金的人和牧师。

29. 在北罗得西亚，酋长和重要的头人有八百五十三个。根据我们自己对他们大部分人情况的了解，我们估计，其中可能符合选举权资格的不超过一百人。其余不具备必要的文化条件的人，则不符合资格。

30. 政府应注意的另外一点是：使人成为一个可靠的人，并不是靠金钱。政府在给予酋长选举权时，已经同意，酋长尽管贫穷，但做着负责可靠的工作。所以，仅仅由于没有财产资格，而不给选举权，这是不公正的。

大会党的建议

31. 我们同意政府所说：北罗得西亚还没有进步到他们人民的肤色与选民毫无关系的阶段，不管多数的选民是黑种人还是白种人。我们也注意到，政府确实认为，不管他们多么希望有一个非种族的选举制度，但这种选举制度恰恰是行不通的，在象我们这样的社会里，在现在的结构下，是决不能存在的。的确，不管他们多么希望有一个非种族的选举制度，但这种选举制度恰恰是行不通的，在象我们这样的社会里，在现在的结构下，是决不能存在的。的确，不管我们怎样经常用非种族主义的词句来欺骗自己，我们谁也不会忘记自己皮肤的颜色。

32. 然而，在过渡时期内，即从现在到 1964 年，我们向殖民大臣提出这一计划供他考虑：

在立法会议里，有一名由总督任命的议长，三十五名选举产生的委员，其中二十一名是选举产生的非洲人，十四名是选举产生的欧洲人，再加七名指定的有官职委员，总数是二十一名非洲人委员和二十一名欧洲人委员。

33. 关于行政委员会,非洲人国民大会建议:总督担任主席,有三名选举产生的非洲人委员,三名选举产生的欧洲人委员,和三名欧洲人有官职委员。这使在行政会议中欧洲人占七名的多数。

34. 虽然也许确实有大量的非洲人人口住在六个特别选区的农村地区,但是实际情况是:根据白皮书附录B引用的数字,在这些地区只有七千三百五十三名选民,而住在铁路沿线的非洲人,约有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五名选民,却只给两个代表的席位。

35. 所以,给七千三百五十三名选民六个代表席位,而给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五名选民只有两个代表席位,仅仅因为这些人碰巧居住在欧洲人的利益占优势的十二个“普通”选区内,这是完全不合理的。

36. 然而,确实有大量的欧洲人居住在铁路沿线,这是白皮书引用的数字所证明的。

37. 按规定,每一个“特别”选区的候选人参加选举,必须获得他所在选区总督承认的酋长中三分之二的人签字的一张证书,证明这些酋长不反对他作为候选人。据建议,这张证书应该在总督正式指定的几个证人在场的情况下签字。

38. 政府相信,因为城镇的地方政府已经和北罗得西亚的中央政府和立法会议相密切联系,所以立法会议和农村地区的土著当局之间,也应建立起相似的联系。他们提出非常古怪的建议,认为做到这一点的最好途径,是采用上述可笑的方法。

39. 事实上,这一方法同各城镇和中央政府具有的

联系毫无相似之处。要建立相似的联系,就建议:普通选区的每一个欧洲人候选人,应该得到他所在选区三分之二的市议员在总督正式指定的若干证人在场的情况下签字的证书,证明这些议员不反对他作为候选人——所有这些议员想必都担任英国的有薪给的职务。

40. 有三个主要的理由反对这一建议。第一个理由是:这一建议,如果采用的话,会十分容易地被酋长和总督指定的证人所滥用。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哪一种人将被指定为证人,很可能这些酋长和证人属于某些政党。对党派的忠诚会轻易地使这些人不能没有偏见地执行他们的工作。

41. 反对这一建议的第二个理由是:它歧视特别选区的非洲人候选人,使他们开初的工作就很困难。

42. 反对这一建议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这一建议,如果通过的话,将使总督对提名谁参加立法会议委员选举具有支配之权。

43. 这是一种最恶意的规定,任何已知的民主国家都没有相似的规定。接受这一建议,等于接受直接的独裁政治和专制政体。

44. 最后,非洲人国民大会希望殖民大臣注意这一事实:非洲人国民大会关于选举相等数量代表的计划,也是为政府自己在白皮书附录B中提供的数字所支持的。

45. 要注意的是:在铁路沿线十二个选区的一万八千八百八十六名普通选民,有十二名欧洲人代表。根据这一原则,铁路沿线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五名特别选民,按理应要求选举十一名代表。

46. 另一方面，本保护地农村地区的一千一百二十六名普通选民给予了二名代表。再根据同样的代表比例，主要是非洲人的七千三百五十三名选民，应给予十三名代表，而不是政府建议的六名代表。

47. 根据以上原则，在立法会议里要有二十四名非洲人委员，而不是非洲人大会党要求的二十一名。

全国主席

全国书记

H·M·恩坎布拉

K·D·卡翁达

代表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

附 录 四

关于格温贝山谷骚乱的报告，1953年12月
14日送交非洲人国民大会

(未经整理,保持真实)

多少年来，格温贝山谷和格温贝区的人民一直遭受政府暴虐法律的痛苦。这些骚乱不宁随着非洲人国民大会进入这一地区而更为加剧了。

1953年3月，赛曼巴酋长的村子里来了几个陌生人。这些人是西蒙·曼博先生（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区组织书记）和另一个我们不知道姓名的人。酋长派他的通讯员告诉全体人民，第二天要开一个会。在酋长管辖的地区里所有的人都在指定的那天去开会，我们也去了。当通讯员们在传达这个集会的消息时，他们在锡亚昆贝尼村遇见格温贝土著管理当局的一个人来找他们。当这个人看到那里的人们兴高采烈时，他问他们希望国民大会为他们做什么事。人们回答说：他们所以高兴，就是因为国民大会的党员已经来到他们这一地区亲眼看看，并可以从他们嘴里听听他们所处的悲惨情况。这被认为是一种对长官的侮慢言行，于是一个男人和他的母亲马上被逮捕并铐上手铐。

在会上，西蒙·曼博先生开始说：“欧洲人向来告诉我们，在这个国家有自由；然而，并没有自由。有一个人和他的母亲昨天被逮捕，因为他们说他们高兴听到有国民大会的党员到了国家的这个地区——可见没有言论自由。我们非洲人正在使另一些非洲人遭受不幸。但是如果我们在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名义下团结起来，不幸的事件一定会少些，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知道，对待他的同胞，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正确的。”

曼博先生问赛曼巴酋长，最使他们烦恼的是什么。酋长说：(1) 强制人民种植木薯，而在政府没有允许他们吃木薯之前就不能吃；(2) 集中贮藏高粱使一部分人家挨饿；(3) 强制人民挖废物或垃圾坑；(4) 强迫征召劳动。接着，曼博先生问酋长(赛曼巴)，国民大会是不是可以接受的。酋长问什么是国民大会。曼博先生说，国民大会是全体人民的政治联合体，联合起来以后，如果可能，他们可以找到一条摆脱某些不合法的和不必要的苦难的道路，一条摆脱奴役的道路，一条走向和平的道路。“现在，无论哪一天，只要区专员高兴，他就可以废除酋长生来就有的部落酋长职权。”赛曼巴酋长说，那末，国民大会是可以接受的。曼博先生于是说：“我的同胞，我们的组织需要钱。如果要实现这样大的任务，你们中接受国民大会的人，可以站出来捐钱。”赛曼巴酋长首先捐了两镑十先令。接着酋长告诉(我们)他的人民也捐钱，因为他自己已经捐了。跟着，村里的头人们开始捐钱。每一个人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分别捐两先令到五先令。然后我们也开始捐钱，每人一先令。我们全体捐款人都取得了收据。

以后，我们都坐下来，继续开会。西蒙·曼博先生问我们当中是否有谁会写字，可以当文书，登记新党员，并收受大家的捐款。于是选出了几个人担任这个工作，他们的名字是：赛曼巴酋长、酋长顾问锡亚昆比拉、克瓦帕、马提约。所有这四位都当选为南部地区的职员，其他当选的人是坦布鲁和另一个当选为西南地区职员的人。这些人把钱收集起来，这笔款子送交给5月份在昌果举行的一次国民大会会议。

参加昌果会议的人回来时把会议的讨论情况告诉我们，但听说赛曼巴酋长参加会议一天以后，就去参加在马扎布卡举行的政府的一个会议，都感到遗憾。要求我们再捐钱。全体人民或大部分人都捐了钱，这笔钱交给在赛纳丹布威酋长地区的香高举行的一次会议。哈里·恩坎布拉先生在那里。

我们把我们的不幸遭遇告诉恩坎布拉先生，特别是强迫征召廉价劳动，强制种植“不准我们吃”的木薯。他（恩坎布拉先生）说，他不知道这个国家的法律竟然允许那种对人类的虐待，他回到城里时，要去会见政府中几个大官，问他们是否知道格温贝区正在发生这种事情。会后，我们回到我们的村庄。我们仅仅平静地呆了一个月，那以后，来了公署的两个通讯员，一个土著管理当局的通讯员。他们开始逮捕人民去参加强迫廉价劳动，但是，在我们各个村庄，我们抵制了，那时一个人也没有被带走。随后通讯员们谈到集中贮藏粮食，但人民拒绝了，因为一家人把粮食送去集中贮藏以后，就得挨饿。他们送粮去贮藏是因为如果任何人不送粮去就要被逮捕，在酋长法

庭上被罚款。赛曼巴酋长说：“是哈里·恩坎布拉阻止你们服从这个命令的。”

以后，这伙人到锡亚昆贝尼的村庄去，在那里住宿。在那里，我们听说，他们讲了同样的事情，但是头人和他的人民不受通讯员的恫吓，再没有人被逮捕去作强迫劳动，因为前几天他们大部分人已经被逮捕了。因此第二天，通讯员们到恰富克瓦的村庄。通讯员们要恰富克瓦头人和他们一起到赛曼巴酋长的村庄去，因为他的少数剩下的人拒绝去参加强迫劳动，也不服从土著管理当局通过的集中贮藏粮食的命令或规定。头人拒绝了。接着他们告诉头人，他们所要的不是他。他们说，他们是专门来逮捕“这个国民大会党员”——指的是西蒙。

西蒙说：“他们向我要身份证。但是我拒绝把身份证交给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告诉我犯了什么罪。赛曼巴也在，另外三个同村人和我当场被铐上手铐，他们告诉我们，要把我们带去强迫劳动。我们首先被带到赛曼巴酋长的村庄，我们铐上手铐，跟着这伙人走遍各个村庄，他们在这些村庄里，还在寻找其他的人。我们各个村庄的头人们，第二天也跟着我们。我们到集中营去时，在路上遇到这些头人。头人们问通讯员们，我们是犯了什么罪，所以被铐上手铐。头人们问他们，是不是我们没有付人头税。通讯员们没有回答，却把钥匙交给头人们，让他们打开手铐，把身份证还我们，并对头人们说：‘你们的人在这里。’没有发生什么麻烦。一切都友善地说了，做了，没有暴力。我们回到我们各自的村庄，至少平静地过了一个月，没有麻烦。以后，区专员带了他的四个通讯员来

了,并问恰富克瓦头人在哪里。他们命令我坐下,要我鼓掌欢迎他们。他们命令我做的,我都做了,又命令我带他们到切利曼齐的村庄去。”

切利曼齐头人陈述:“他们来到时,命令我们六个人坐下,把腿伸直,然后命令我们鼓掌。我们照命令做了,因为他们告诉我们,那是对待一个白人应有的礼貌。以后,我们被带到我们的木薯园,当我们走到园子的篱笆门口时,他们又叫我们象我们在村里做的一样,坐下来,把腿伸直,并鼓掌欢迎区专员。我们照命令和指示做了。园里有些木薯已经吃掉了。他们问我们是谁吃了木薯。我们回答说:是猴子吃的,猴子天天侵入园里。翻译人是赛曼巴酋长自己和通讯班长钦普图。他们说,是哈里·恩坎布拉叫猴子吃木薯的。但我说,在我从别人那里听到哈里·恩坎布拉这个名字以前好久,猴子就一直侵入我们的园子,拿我来说,就常从别人那儿买木薯,来种植或补种那些被猴子吃掉的木薯。赛曼巴酋长讲我说谎,是我吃掉了木薯。但是我说我当然不是猴子。然后,我们都被带到恰富克瓦的村庄,他们叫我们和该村的人民一道坐下来鼓掌欢迎白人,我们这样做了。当时区专员通过翻译讲话,并问西蒙,是谁吃了木薯。”

西蒙陈述:“我说是猴子吃了木薯。当时区专员问我说:‘猴子也有锹吗?’我说锹是我们种木薯时用的。接着赛曼巴酋长说:‘你已经参加了哈里·恩坎布拉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你不该再吃木薯了。’然后,他们叫我们站起来,回村庄去。他们不准我们进村庄。他们用手指向公路那边停着一辆等候我们的政府卡车的地方,叫我们到

那边去。”

切利曼齐头人陈述：“我问要卡车来干什么，因为假如你们是来看木薯的，你们就应当到所有的村庄去走一趟，看一下猴子对木薯究竟干了些什么。于是我被抓着头，猛推向卡车。他们包围了我们，把我们推向卡车。因为我的右胫骨受过伤，所以我忍受不了；我问，我们犯了什么罪，他们要那样猛推我们。他们向我侮辱地吆喝：‘你今天要挨打。’看到要打我们的人带着四枝步枪，我们不晓得那将是怎么一种打法，因此我们散开逃跑了。然后他们回到恰富克瓦的村庄去。赛曼巴酋长警告村庄里的妇女说：‘你们的丈夫加入了国民大会，应该小心，因为政府决定要拷打他们，直到他们退出国民大会为止。’后来村庄里的妇女听到，区专员和酋长通过一名通讯员翻译谈到有可能召来警察当局和士兵来‘处理这些人’。他们离开恰富克瓦的村庄，向东到赛曼吉利勒的村庄；在路上他们遇到一个牧羊人。他的名字叫钦森加，是赛曼吉利勒头人的助理。他们叫他，当他来了时，他们命令他坐下，他坐下以后，他们围着他。赛曼巴酋长对他说：‘这是新的区专员，你要鼓掌欢迎他。’他鼓掌以后，他们命令他登上卡车。他问，叫他登上卡车干什么。他们牢牢地抓住他，送进卡车，把卡车向赛曼巴酋长的村庄开去。在路上，他们遇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钦森加叫他带信到赛曼吉利勒的村庄，去告诉他的人民，说他们让一个白人把他劫走了。当村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们到赛曼巴的村庄去打听。他们发现另外一个人也被捕了，他名叫钦温约卡头人。赛曼巴酋长看守他们，因为区专员到

奇伦杜公路去了。人们等候区专员，直到他们肚子很饿才离开这里回到各自的村庄去：同他们一道回去的是两个嫌疑犯。当第二天区专员从奇伦杜公路回来时，他问酋长，两个被捕的人在哪里。酋长告诉他，他们回家去了。接着，区专员回格温贝公署去。

“一个星期以后，跟区专员一道来了四辆卡车，车上载满非洲人警察，只有三个欧洲人。当他们到达赛曼吉利勒的村庄时，他们开始追赶妇女。他们发现六个妇女，头上顶着盛有高粱的篮子，当她们试图从自己过去从未见过的警察的突然袭击中夺身而逃时，篮子里的高粱倒出来了。但她们被捕或抓住了。牧羊的儿童们看见这种情况，就向河边奔跑；男人们动身回家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在路上他们遇到这一伙手持步枪的警察追赶他们。男人们拔脚就跑。特别是钦森加继续跑到河边，这时他们告诉他，如果他要游过河去，他们就要向他开枪。因此他回头走向他们，他被捕了，并铐上手铐，他们把他带到赛曼巴酋长那里去。

“当我们听到这件事情时，村里所有在我们一边的人都集合在一起，所以‘武装土著’警察就能发现我们都在村里。第二天，大约九点钟，通讯员们和警察们带着步枪和棍棒；当他们大声发出警告时，我们觉察到什么事情要落到我们身上了，我们都逃跑了。他们在后面追。那个在后面追赶我们的通讯员，问我们为什么要逃跑。我们告诉他，我们害怕，‘因为你们全副武装而来，向我们开火，而我们是没有任何武器的。你们带了很多拿步枪的警察来，这决不会不是一场战争。’区专员派通讯员告诉我们，

说他带一群警察和很多步枪来，向我们表明：政府有力量杀死你们，如果你们不遵守政府法律的话。我们说，我们不要区专员和警察们靠近我们，因为他是来打我们的。于是，他第二次派通讯员来告诉我们，说他准备把警察隐藏在什么地方，他要同我们谈话。我们同意这样办，但是我们疑心要落入圈套，当我们同区专员谈话时，隐藏的警察们会打死我们。但是，当我们看到他怎样花了相当时间向我们恳求和说服我们时，我们决定同他会面。我们同他见面时，他通过通讯员钦普古的翻译告诉我们说，他带武装警察来向我们表明：‘政府有权力强迫任何人服从政府的法律，不管法律是好是坏。现在不准许国民大会的党员在格温贝地区活动，因为他们使人民讲道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禁止他们在这个地区出现。发现任何人是国民大会的党员，就要逮捕。’

“我们回答说：‘虽然你们取缔国民大会，但这些法律长期以来对我们不公正——尽管有如此长的时期，我们却不准备遵守这些法律——强迫廉价劳动，强制集中贮藏粮食和种植木薯。’接着，区专员和警察们回格温贝公署去了。

“四天以后，开来八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满载着手持步枪的警察们。派人叫了我们去，赛曼巴酋长地区的全体人民也都到那里去。区专员讲话，对我们说：他带这支队伍到我们这里来，证明和表示政府多么有权力；不管政府的规定如何坏，谁反对，在谁的身上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们拒绝服从，你们就要被枪毙。’他接着说：‘政府知道有诸如强迫劳动、强制集中贮藏粮食、强制种

植木薯及其附属规定等等法律。如果你们认为我对你们说谎，来自卢萨卡的区专员在这里，他会证实我的声明。’接着这个所谓来自卢萨卡的区专员说，我们都是知道这些法律的。

“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反对种植木薯，因为如果猴子吃了木薯，我们要罚六镑。如果任何人拒绝去参加强迫廉价劳动，他就要被送去坐牢。’

“区专员说：‘国民大会无权告诉你们，什么是坏法律，什么是好法律，因此你们必须服从所有的法律。’我们告诉他，我们已经接受国民大会，‘在其他地区，不管有国民大会或者没有国民大会，都不再有强迫劳动，所以我们决定仍然做国民大会的党员。’

“开会以后，他告诉我们，第二天他要到我们乡里去。在指定的日期，我们聚集在切利曼齐的村庄，区专员同那个来自卢萨卡的区专员、通讯班长和一个为他翻译的公署文书一道来了，他问我们对这些事情有什么想法。我们告诉他，我们希望政府向我们购买粮食，以便在饥荒季节，挨饿的人们可以向政府购买粮食；还告诉他说，我们不准备被强迫做廉价劳动。但是他仅仅问我们：是谁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我们告诉他，由于我们多少年受的苦痛，才使我们自己明白的。于是他要查出谁是国民大会的党员，但是没有人站出来。接着，他说他要找他们，因为这就是他带警察来的目的。他说他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讲那些话，因为我们同恩坎布拉先生在香高开过会。

“由于这个原因，他说，今年他肯定我们不会耕种我们的园地，因为他要搜查我们的村庄，逮捕人民强迫劳

动。不管我们如何竭力躲藏，他要带足够的警察到我们的园地里来寻找我们，做强迫劳动或抓进监狱。

“第二天，区专员带了酋长又来，酋长对我们说：‘我告诉你们，区专员叫我对你们讲，国民大会是蠢人们的组织，我不要它。’我们告诉区专员说，酋长认为国民大会不好，是因为没有人强迫他去做廉价劳动，但是我们说，我们喜欢非洲人国民大会。区专员和赛曼巴酋长说，国民大会的党员要坐监牢。

“此后，仅仅过了一个星期，警察来了，逮捕了赛曼吉利勒村庄的二十一个人。他们是晚上被捕的。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人们不在自己的屋子里睡觉。他们不耕种，因为害怕突然逮捕。

“由于这个原因，虽然天下雨了，我们还是不能耕种我们的园地，因为害怕被逮捕。我们听说国民大会的党员们不能来，因为政府禁止他们进入格温贝山谷，我们让你们知道我们地区的苦痛，这也许是你们不知道的。我们还想询问我们是否可能会见几个政府大官，他们只听说格温贝的人民坏，如果他们从我们口中听到真实情况，他们也许会被说服改变想法，试图改正本地这些状况。由于上述已经提到过的理由，政府已经阻止我们在格温贝耕种，明年有发生饥荒的危险。

“当我们向酋长诉说这些坏的情况时，他恐吓我们，警告我们说要坐牢，所以我们害怕。

“这就是我们所要说的一切。

“陈述人：

切利曼齐头人，切图格瓦头人，曼曼吉拉，西蒙·

萨阿维姆，爱德华·赛芒亚马，萨姆森·赛曼巴，马基森·赛巴克威，塞缪尔·麦加耶·恰富克瓦。”

12月18日，报告送至国民大会后第四天，我写信给卢萨卡土著事务秘书：

关于：在格温贝的骚扰

先生：

关于今天早上我们的谈话，我必须说，你拒绝就上述问题同我们会见，我们感到多么遗憾。

你知道，正如我向你指出过的，关于格温贝事件，政府提出了对国民大会的某些指责，我有责任把情况谈清楚。

我告诉你，在卢萨卡我的办公室这里，有八个人是从你的一些官员领导下的坏的土著政府那儿逃出来的，这种坏政府在那边是很多的。这些人想亲自来见你，向你这个负责土著事务的人诉诉苦衷。极为遗憾，你不给予这些人会见你的机会。

正如你会从附上叙述他们问题的报告中看到的那样，要他们去见他们的区专员是办不到的。他们根本不愿去接近他。由于他们对他们所干过的事情，他们害怕他。让我们看在上帝的份上希望：这些可怜的人们，当他们回到家里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致因为想望国民大会而遭受更多的苦痛。

我在这里必须用最坚定的措辞断言：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格温贝骚乱是毫无关系的。你的部门对他们事情的措置不当，导致了纠纷。我们，作为国民大会，不能接受政府由于自己管理不善而加于我们头上的任何非难。我

们保证要对损害非洲人利益的事情采取不合作的政策，不使用暴力。我们这样说的意思是，我们要始终遵循这一原则，即它将证明对有关的人民是有好处的。

K·D·卡翁达

封面
前言
目录
正文